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玉溪诗谜



原序

我对于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祠》、《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竟积成了一本七万余字的小册子。

最初时和几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张君鹤群便赞成了我的话，加以他自己的考证，做了一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发表在东吴大学廿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对于义山和宫嫔恋爱说，仍然怀疑，别人也觉得我的假设是太荒唐了。

但我愈研究义山的诗，愈觉他有和宫嫔恋爱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被他故意埋藏了，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标识，教人自去辨认。竟如一座矿山，那些《锦瑟》、《拟意》等诗，便像透露在山面上的矿苗。

我无意中拾着一块矿苗，已掘着些东西出来了。对于第二块拾着的矿苗，当然不忍抛弃，于是我想动手来做一番大发掘的工作。

不过我的功课很忙，虽然预定了工作的计划，竟无暇实行。直到今年寒假里，才偷空写了一篇万余字的稿子。

那篇稿子本想发表出去，但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还有许多疏漏的地方。于是又搜罗了许多书，课余之暇，便钻在故纸堆中研究。果然又发现了许多新的证据，还有些我自己认为大胆的假设，也证实了一部分。

譬如我最初读到义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诗，便假设唐代大部分的女冠带点娼妓性质，后果于鱼玄机诗集及唐人赠女冠诗中寻出这样的证据。但最后读《北梦琐言》和谢无量《妇女文学史》也有像我所说的话。我虽自愧读书太少，几乎于无意中拾了他人的牙慧，然而因此也知道我考证时所走的道路，还没有十分错，又颇以自慰。

我又曾假定庄恪太子之死，有自杀的嫌疑。不多时翻阅《通鉴》，果然有些古人也以此为疑。

新旧唐书都没有提王德妃的下落。他们于开成三年议废太子时，犹有太子以母宠衰，杨贤妃日夜诬谮，亦不能辨别等语，好像德妃那时还在。但我在义山和宫嫔恋爱的时间来考证，武断王德妃死在开成元年秋间。后阅《通鉴》果有“德妃已谮死……”之说，虽然仍未证明王妃死时年月，但她总算死于议废太子之前，与我假设相合。

我这编文字，大半是由义山诗中考证出来的，旁证还苦太少，错误自然不免。即说全篇种种假设，都是错误的，也说不定。不过千余年来对于义山无题诗已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

我这种解释算聊备一格罢了。

我希望读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自己去研究义山的诗，自己去寻新的证据，创造新的假设，使千余年来号称隐僻晦涩的李义山诗，有一种明白精确的注解。

一九二七、四、五于苏州

引 论

李义山的诗素被人视为隐僻，而无题诸作，更为难解。中国文学界对于义山无题诗的见解，向来可分为三派：第一派 以为义山诗的隐僻，可以不解解之。而且义山诗的优美，便藏在这暧昧隐僻之中，如果说穿，反成嚼蜡。高奎《唐诗品汇》说：“晚唐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丽，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对偶，晚唐变态之极也。”这是俨然将“隐僻”当了义山诗的特色。近人梁任公于其《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也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抹煞。”这也主张以“隐僻”为赏鉴义山诗的标准。因其隐僻，便觉他的诗寄托遥深，因其隐僻，便觉得他的诗含有一种神秘性，读了才能发生我们的美感。

第二派 直率地断定义山诗的隐僻，是他才力不足的表现。《蔡宽夫诗话》说“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者，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体之弊，适重其失……”毛西河也曾说义山特庸下之才，以可解不可解之辞，文其浅陋。

第三派 以为义山无题诸作，晦涩难解之词，正如《楚辞》中的美人香草，古诗的托夫妇以喻君臣。于是后来笺注义山诗集的人，刻意推求，务求深解，使那些绝好的恋爱纪事诗，都变成了寄托。《四库全书提要》所谓“……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穿凿愈甚，真意愈晦。”冯浩注义山诗便犯了这个毛病。又以为义山的艳诗，都是巴望令狐**提挈的寓言，最可笑的《圣女祠》五排一首，冯氏说为追悼令狐楚而作。诗中“行骑裁寒竹，”将“寒竹”解作“哭丧棒”已经够滑稽了；“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冯氏便说是义山属望令狐**提拔的铁证，因为《西王母传》，王母曾呼东方朔为窥牖小儿，令狐**是楚的儿子。义山所云方朔即窥牖小儿，而小儿即影射“子”字云云，岂不更是可笑；胡适先生曾骂“无边落木萧萧下”为大笨谜，我说冯氏这种转弯抹角的解释，也可说是一种大笨谜。

千余年来义山的诗，被上述三派的人，闹得乌烟瘴气，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认。今年我读义山的诗，读到《圣女词》、《无题》等作，因为历来旧观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说义山的诗天生是晦涩的，不必求什么深解，所有香艳之词，也无非是他在寄托自己的身世遇合之感罢了。但后来我读了《碧城》、《玉山》等诗，便有些疑惑起来。因为这些诗里都充满了女道士的故事；若义山与女道士没有深切的关系，为什么一咏之不已，而再咏之，再咏之不已，而三咏四咏之呢？于是我根据了这一点怀疑的念头，用心将义山诗集细读一遍，才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原来义山的《无题》和那些《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不是寄托自己的身世，不是讽刺他人，也非因为缺乏做诗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词和典故，来炫惑读者的眼光，以文其浅陋；他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

我说到这里，知道必有人要问：恋爱之事，虽为旧礼教之所讳言，但

严厉的教条，究竟束缚不了文人的思想。像和义山同时的温飞卿、韩偓，后来的王次回，不都喜为风流侧艳之词吗？不都公然赞美恋爱吗？为什么义山偏就扭扭捏捏说些若明若晦的话头，教人捉摸不定呢？这个问题似乎很有理了。但我可以回答：义山用这样隐晦涩僻的笔法，来写他的恋爱，非惧见讥于清议，实因他别有苦衷，不得不如此。

他的苦衷是什么呢，就是他恋爱的对象，非寻常女子可比，如果彰明昭著地写将出来，不但对方名誉将为之破坏，连生命都很危险的。我想义山本想将他的恋爱史，明告天下后世，无奈有了这种妨碍，他提笔的勇气，也就沮丧了。

但朱竹*“宁可不吃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诗人爱惜他的情感的结晶，逾于名誉，义山如何肯因危险而牺牲他富有趣味的情史呢。

不过，再说一句，他恋爱的对象，不比寻常，关系究竟太大了，他到底不敢说，而又不忍不说，于是他只得呕心挖脑，制造一大批巧妙的诗谜，教后人自己去猜。他如此办法。不啻将他的爱情窖藏了，窖上却安设了一定的标识，教后来认得这标识的人，自己去发掘。所以义山的无题诗，可以算得千古言情诗中别开生面的作品。

义山诗中有些什么恋爱事迹？他的恋爱对象，究竟是些什么样人物？依我的观察可以分为下列的四种：一、女道士

二、宫人

三、妻

四、娼妓

关于妻与娼妓的文字，着墨不多，而且也无神秘可言，所以不在本书讨论之列。现在我所要讨论的仅为、二两项。

一 与女道士恋爱的关系

未解说此题之前，须将唐朝道风之发达，略为叙述，始能使读者对本文加倍明了。

唐朝道教最为发达，自从高宗尊老聃为玄元皇帝以来，历代帝王群相尊崇，并著老子的《道德经》为圣经，以道教开科取士。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对于道家学说，这样奖励提倡，社会上自然相习而成风气了。当时名人无不带有道家的色彩：如李太白受道箓于齐，平生所为诗歌，差不多篇篇说到神仙出世的话；贺知章黄冠还故乡；李泌入衡山学道；白居易不相信烧炼，但老来却和炼师郭虚舟烧丹。唐诗人与道流往还之诗不可胜数，不但帝王卿相，学者文人，迷信神仙，一时风会所趋，连女子也被道家思潮所鼓动，唐公主每每修道不嫁，杨贵妃亦曾丐为女道士，宫人亦有自请出家的，当于后节细论。

（一）唐时女冠之娼妓性质唐时女道士固不乏刻苦清修的人，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际之自由的，却也不在少数。因此唐朝便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妇女阶级，替它杜撰一个名目：便是“半娼式的女道士。”这种半娼式的女道士

有住在家里的，（像韩愈所咏的《华山女》诗，说一个女郎登坛说法，吸引听众，借谈道之名，遂情欲之实。虽然讥讽得过火一点，而当时所谓女道士的一辈，确有这种情形。）也有住在寺观中的。

第一，唐女冠鱼玄机有诗集一卷。虽仅寥寥三十余篇，而半为艳情之作。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子安、温飞卿均与她相识。鱼玄机集中寄子安情诗凡五首。

《情书寄子安》云：

“秦镜欲分愁坠鹊，舜琴将弄怨飞鸿。”

《春情寄子安》云：

“……冰销远涧怜清韵，雪远寒峰想玉姿。……如松匪石盟长在，比翼连襟会有期……”

寄飞卿诗集中凡五首。

《冬夜寄温飞卿》云：“……疏散未闲终遂愿，盛衰空见本来心！……”

《寄飞卿》云：

“……冰簟凉风着，瑶琴寄恨生。嵇君书札懒，底物慰秋情？”

这样多方面的恋爱，居然著之篇章，如说玄机不是娼妓式的人物，谁则信之。然而她居然住在寺观里，往来多炼师羽士之流（集中有《寄题炼师》及《访赵炼师不遇》等诗），仍然像个出家清修的女冠。——按《北梦琐言》说：玄机乃李亿补阙之妾，爱衰下山。有《怨李公》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云云。是自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所杀。有集行于世。

第二，《东观奏记》有这样一段纪事：“上微行至德观，女道士有盛服浓妆者。赫怒，亟归宫，立宣左卫功德使宋叔康令尽数逐去，别选男道士七人住持。”《东观奏记》为唐裴庭裕所撰，专纪宣宗一朝之事，所称“上”系指宣宗。道教自历敬文武三朝之后，风气大坏，宣宗虽欲整顿，怕也不可得了。

第三，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义山在令狐楚幕中有《天平军》公（旧注“公字疑为衍文”）座中呈《令狐公》一诗，诗云：“罢执霓旌上醮坛，慢妆娇树水晶盘。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仔细看。”

这首诗是为到令狐府设醮女冠而作。“更深”一联，形容女冠之娇艳动人，“白足”一联戏言女冠之美，见者皆为之发狂，全诗措词极为慢褻，决非对清修女冠之言。前人读此诗亦觉其可疑，所以只好曲为解说。像徐德明便道：“唐时女冠常出入豪门，与士大夫相接者甚多。此或令狐家妓曾为之，此诗似公命赋。”照徐说是令狐家妓学女道士设醮。家妓怎会设醮，徐亦未有说明。又像朱长孺便道：“座中必有官妓故云。”照朱说则义山这首诗是一首“女道士家妓合咏。”上四句咏女道士，下四句咏家妓了。明明一首诗，偏要将它斩腰，未免太没道理。照我看来，天平座上招来的一些女冠，即“半娼”之流，她们一面替人做法事，一面也供人狎玩。女冠出入豪门，与士大夫相接，徐说尚不错。像鱼玄机集中即有《寄刘尚书》诗，《闻李端公垂约回寄赠》诗。又《续文献通考》：“李裕字季兰，女冠能诗者也。尝与诸贤会。河间刘长卿曾与戏谑论者美之。盖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奔则有余。”又李白有《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二首，及《赠施仙姑》一首，都可为女冠与仕宦及文士交游之证。

唐时一部分的女冠为什么带点娼妓性质呢？管见测之，约有数因，述之如下：

（1）女道士通晓文墨，故士大夫喜与交游中国人对于女子教育自古不知注重，故具有高深教育的男子，其妻往往目不识丁，漫无知识，两性间自乏调和的兴味。狎妓呢？则妓之风雅者，亦不多觐。是以每闻有一个具有翰墨才的女子，则视之为威凤祥麟，珍重不已，甚至求与倡和，设法与之亲近。历史上有才的女子往往多少有点风流故事。迂儒遂发“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愤言，其实有才的女子，不见得便不德，不过男子方面，觉以物稀为贵，引诱得太利害罢了。普通家庭妇女之少读书机会，无非为不需要，及家务牵累；女道士则为诵习经文，必须识字，摆脱俗缘，又得专精于其所学，一旦磨炼出一点才学出来，士大夫们自愿和她们往来了。罗马古时妇女亦多不识字，惟妓女多娴文墨，解词章，吐属风雅，应酬圆熟，一时名士豪杰皆从之游，可以为证。（2）与女冠交游有时可借以阶进唐时女冠多为贵族，如公主之类，每自请出家。而唐公主握有政治上的大权，有官迷的人，走公主门路，倒是一条终南捷径。《太平广记》载王维早年曾饰为优伶，献郁轮袍之曲，邀宠安乐公主。如谓小说不可信，则历史也曾供给我们以许多证据。《唐书》称“太平公主推进天下士，谓儒者多褻狎，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向之……”又《安乐公主传》“赵履新谄事主，尝褰朝服，以项挽车……”或谓既已出家的公主，不执政权，走她们的门路何用？不知公主虽出家，而父母手足的情感，仍然未断，借其一言，往往重于九鼎。像方士史崇玄本金仙玉真两公主之师，因她们之介绍，得事那声势赫奕，炙手可热的太平公主，竟得拜官鸿胪卿，难道这不是一个好例吗？

那些夤缘的人，巴结不上公主，就先交欢于她们手底下的徒子徒孙，这也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的意思。两性间交际得密切了，发生恋爱也就可能了。而且这种风气传播开来，就不是一定想做官的人，也要交结一二个女道士，当作唱和的伴侣了。

（3）生计问题女道士皆为出家人，别无财产，靠讽经设醮以为生。唐时道风既盛。每喜招羽士设坛建醮，以为功德，所谓“霓轩入洞齐初月，羽节升坛拜七星。”（陆龟蒙诗）权门贵家是时常要举行的。设醮有时亦招女冠，义山诗即可为证。这些弱质纤纤的女儿，为了生计问题的压迫，不得不时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轻薄几句，又敢怎样呢？看刘禹锡《赠张炼师》诗“……金缕机中抛锦字，玉清坛上着霓衣，云衢不用吹箫伴，只拟乘鸾独自归。”意虽不庄，词还得体。而刘长史的“大罗过却三千岁，更向人间魅阮郎。”（《赠成炼师》）白居易的“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遇两徘徊？”（《赠韦炼师》）便不像话了。

说过唐时普通女道士的性质，我要来叙述义山所恋爱的女道士了。大约义山所恋爱的女道士乃由宫女出身，其身份较普通者为高贵，其一切服装居处亦极富丽，虽其行动亦不甚谨严，但比较普通女道流好得多了。所以和她们恋爱的男子如李义山一辈的人，对于记录这种爱情的诗歌，常取秘密态度。

（二）宫人之入道

开成三年（公元八三八）义山有《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诗一首：

“星命追还不自由，双童捧上绿琼舟。九枝灯下朝金殿，三素云中侍玉楼；凤女颠狂成久别，月娥孀独好同游。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按《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出宫人四百八十人，送两街寺观安置。”关于宫人入道事实非一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戴叔伦、王建、项斯、于鹄都有诗，散见各人集中，不具引。义山所恋之女冠，非此次出家之宫人。大约在开成元年之前。

谈到宫人入道的问题，我们可以费点笔墨，将唐时诸帝公主出家修道的情形，略述一二。读者如明白了唐时女贵族，对于出家运动怎样热烈，对于宫人之入道，自然不觉其奇怪了。

《唐书·诸帝公主列传》里出家的公主，列表如下：睿宗女金仙、玉真、万安三公主代宗女华阳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顺宗女浚阳、平恩、邵阳三公主宪宗女永嘉公主

穆宗女安康、义昌公主又《太平公主传》，武后时荣国夫人死，后丐太平公主为道士，以资冥福。仪凤中（高宗年号）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中，乃置宫如方士，薰戒以拒亲事。后公主自示意欲嫁，始为择薛绍尚之。可见太平公主也做过了一时女道士。王士禛《居易录》引胡震亨云：“唐公主多自请出家，与二教人媾近。商隐同时如文安、浚阳、平恩、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皆丐为女道士。筑观于外，史即不言他丑，颇著微词。”

我们但看这些玉叶金枝的公主，尚要出家，区区宫人，又何必论。大约宫人入道，有几种原因：一种为帝王所强迫，是被动的；一种借出家而得自由，是自动的。帝王之强迫宫人入道，无非如武后之迷信“冥福”，观《唐书》出宫人若干人，送某处安置字样，及义山诗“星使追还不自由”之语，强迫痕迹，显然可见。至于自动方面，则也有几种不同的原因：（1）年老宫人之最大希望，承帝王之恩宠而已，而要求恩宠，以颜色为最要条件。年老色衰，自问此身更无见天日之前，只好逃之空门，在药炉经卷间了此寂寞残生了。王建《送宫人入道》诗云：“萧萧白发出宫门”；于鹄云：“自伤白发辞金屋。”其事出于不得已，其情实可哀怜。（2）消极的思想长门岁月，孤寂难堪，久闭此中，精神上安能不感受烦恼？厌世观念，既渐养成，自然不能不向宗教中，别寻安身立命之地。张萧远诗：“金丹拟驻千年貌。”殷尧藩诗：“清宵有梦步瑶池。”王建诗：“发愿蓬莱见王母。”如果宫人们心理上不感受痛苦，则她们都是生机活泼的青年，前途希望，非常远大，何致作这种成仙的幻想呢？（3）借入道而得自由此节当于后文详论。

（三）入道宫人生活之豪奢《圣女祠》：

“松篁台殿蕙兰帏，龙护瑶窗凤掩扉。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着五铢衣；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宁无刘武威？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

在这首诗中，于入道宫人生活之奢华，及其身份都可看出：

（1）居处之壮丽入道宫人，大约与入道公主合居，唐时道观多为皇家之建筑物。《唐书》称“金仙、玉真两公主筑观京师，以方士史崇玄监工筑观，作者日万人。”司空曙有《题玉真观公主山池院》诗云：“香殿留遗影，春朝玉户开。……石自蓬山得，泉经太液来……”证以义山诗中之“松篁台殿”“龙护瑶窗凤掩扉”若相符合。义山其他诗涉及道观，亦无不庄严炳焕，俨然带有宫殿色彩，可以互相发明。（2）服饰之奢华《圣女祠》次联是形容女道士服饰之轻华。按吾人理想中之仙家，其服饰辄为“皇冠”“玉佩”

“羽衣”、“霞裳”之类，所以道士之服装，每以绮罗等轻薄之质料为之，穿着起来，始飘飘然有凌云御风的状态。张籍诗：“名初出宫籍，身未称霞衣。”又义山诗：“衣薄临醒玉艳寒”“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皆可与此诗中之“五铢衣”参看。

“钗头燕”典见《洞冥记》：“元鼎元年，起招灵阁，有神女留玉钗与帝，帝以赐赵婕妤。至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谋欲碎之，明旦发匣，惟见白燕飞天上。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义山用此典，正暗指女道士之由宫人出身。至“每朝珠馆几时归？”系女道士有事他去，义山来访未见，故戏问钗燕以归期。至于《碧城》诸诗，女道士生活之豪侈，更可想见。

（四）义山所爱女道士之姓名义山所爱之女道士系姓宋名华阳，义山有《赠宋华阳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诗云：“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识蕊珠人。但惊茅许同仙籍，不记刘卢是世亲。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不因杖履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重过圣女祠》云“上清沦谪得归迟。”此云“沦谪千年别帝宸。”上清、帝宸，本指天上及仙人所居之所，但在此诗中则为帝王居处之代名词。可见宋华阳乃是由宫女出身。

“茅许同仙籍”言宋与刘同出道门。“刘卢世亲”则刘宋系亲眷，冯氏引《唐文粹·冯宿撰刘先生碑铭》，及《唐书·敬宗纪》，谓刘清都先生即道士刘从政，号升元先生，初栖王屋山，其后迁居都下。可见刘清都乃年高有道之士。或者即系义山之师，亦未可知。义山虽与宋华阳有情，而对于刘清都，却非常恭敬，但观其以徐甲自比，以周史比刘，（徐甲事见《神仙传》），可见他们有师生的关系。

《赠宋华阳诗》因兼寄刘先生，故语意甚庄，看不出什么恋爱痕迹。至于《月夜重寄》的一首便不是这样了。“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

“偷桃”乃义山最惯用的典故，诗中引用不止一处，如“瑶地归梦碧桃闲”，“王母不来方朔去”，“玉桃偷得怜方朔”，“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按中国文人好将两性间恋爱关系，用极香艳，极漂亮的文词来描写，什么采兰呀，赠菊呀，窃玉呀，偷香呀，都成了幽期密约的代名词。但是义山所恋爱的，并非平常女子，却是一个出家的人。他既然能用仙女的典故，来影射她的身份；难道于偷情方面，寻不出一个巧妙而恰当的仙家故事吗？所以他便采用东方朔典故，用“偷桃”来代表仙家的窃玉偷香，这真可谓聪明绝顶了。“窃药”亦义山惯用的文词。《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窃以奔月，是为S 稽 源撒髀 朗恐 龟倚薛饕K 健 筇履鸭姁闭撸 磁 朗坑 *清规，就不能和男子往来，和男子往来，便不能守清规，两者居于反对地位，自然兼并不得。但绮年玉貌，消磨于凄凉寺院之中，每遇美景良辰，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所以义山又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

宋华阳观中规则大约有时较严，晚间不许出外，故有“十二城中锁彩蟾”之语。又有《昨日》有“未容言语还分散”之句。均足见女道士之不自由。又《无题》诗一绝云：“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辉夜，更在瑶台第一层？”

此诗与寄宋姊妹诗情境相类，想是同时所作。还有些小诗，都像在一时期内，为宋氏姊妹做的，试录几首如下：《袜》：

“尝闻宓妃袜，渡水欲生尘，好借嫦娥著，清秋踏月轮。”《房君珊瑚散》：

“不见 S 鹤埃 迹锤卦侣郑辉轮邢需凭剩 驩拥烦沙荆”

因宋华阳为观中规则所拘，不敢于晚间出门，十二玉楼不啻为水晶帘所隔。义山于极寂寞无聊中，只好想象她们在观中赏月的光景，恨不借宓妃之袜，使她们可以踏月而来。至于“桂子捣成尘”可为她们单调厌倦的生活写照。（五）义山与女道士之失和义山与所恋爱的女道士曾有失和之事。《碧城》七律三首很可以教我们看出一点痕迹来。录其诗如下：“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已田田。不逢箫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紫凤放娇衔楚珥，赤鳞狂舞拨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这三首诗，古人因其难解，附会穿凿，更加离奇。朱竹*研究这几首诗废寝忘食，用了全副精神，而研究出来的结果，却非常可笑。他说此第一首指杨妃入道。第二首言妃未归寿邸之事。第三首言明皇与妃定情之事。“箫史”一联，竹*谓系明皇对贵妃的嘱咐，“盖喜其芳年稚齿，又嘱其白头一心，即传言定情之夕，授钿合金钗以固之之意也。”朱氏自以为善于比附，我则以为这话说得太无道理，要知专制时代的帝皇对于其妃嫔，稍赐以颜色，便算天恩浩荡，而妃嫔能得竹叶羊车，常常临幸，也便像是几世修来的造化。两方面的关系既系如此，那做帝皇的便到了钟漏垂歇，行将就木之年，也不怕“芳年稚齿”的妃嫔，敢对他宣布离婚——其暗中有外遇者又当别论——哪值得这样叮咛？而且“不逢箫史休回首”云云，也不像帝皇对妃嫔关照的口气。

其实，这三首诗还是义山与女道士恋爱的哑谜儿，与明皇贵妃，毫不相干。不过细察诗意，双方爱情已有破裂的痕迹。女道士此时已厌弃义山，不愿仍和他继续来往，或者别有所恋，为义山所察觉，故有“不逢箫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微含醋意的要求。但女道士并不理会他，自觉无聊，于是又有鄂君怅望，绣被孤眠之句。第三首则义山咏自己与女道士约期相会之事，“七夕”借用银河鹊桥的故事，不必呆指什么日期，女道士既厌弃义山，所以失约不来，害他空等了一场，正如铁网空张，珊瑚竟失，满腔懊恼，只好借“凤纸”细描了。又《银河吹笙》一首也是爱情断绝的表现。诗云：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月树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女道士既与义山决裂，而义山余情不断，尚不胜其眷恋之意。“楼寒院冷”犹言共衾无人，觉楼院更为清冷。当辗转反侧之际，回忆从前好梦，今已难寻，庭树之上，偏有惊飞的鸟，恍然是情人舍我的象征，月榭余香，风帘残月，景物依然，而人则不知何处，更使多情诗人，为之惆怅不已。女道士之厌弃义山，必饰词将专心修道，不更牵于儿女之情，其实她却和另一个羽士在闹恋爱。义山也知道她说的是一派假话，所以最后二句，用一种如恨如嘲的口吻劝她道：你何必假惺惺拿修道来骗我呢？恐怕你们湘瑟和秦箫早在那里倡和了！

女道士之厌弃义山不知何故，或即因他言语不慎吧？所以义山有“《武

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的辩护。李义山固不能以汉武帝自比，但借《汉武内传》里上元夫人与西王母故事，以影射出家的公主及女道士等，故不妨如是云云。

义山的情敌名永道士。义山少年时会学道于河南的王屋山（《通典》开元二十九年京师置崇元馆，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与明经同。其《题李肱所遗画松》诗“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可证。又《寄永道士》一绝：“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

按王屋山有阳台，可见永道士是王屋山的道士，也就是义山的老同学。义山之认识宋华阳，想是永道士所介绍的。宋华阳姊妹共有三人，所以义山有“应共三英同夜赏”之诗，从前时候宋华阳和义山恋爱，她的两位姊妹则和永道士恋爱。后来宋华阳和义山失和，也归到永道士那边去了。故义山又有“君今并倚三珠树”的调谑。

“三珠树”见《山海经》，郭璞亦有《三珠树赞》，科举时代用以代表榜前三名的人，冯浩以为此系咏永道士登第而自己失意之事，似乎不大对。义山只说你现在独拥三美，自然得意，但我被人所弃，如秋风中的落叶，漫无所归，你恐怕就不管了。

（六）再上王屋不见女道士之惆怅按义山于太和九年来往京师，开成元年至三年常留京。二年自兴元归，路过所爱女道士所居，则女道士已迁往他处。故他集中有一首五排的《圣女祠》写不见女道士之惆怅。“杳霭逢仙迹，苍茫滞客途；何年归碧落？此路向皇都。

消息期青雀，逢迎异紫姑。肠回楚国梦，心断汉宫巫。从骑裁寒竹，行车荫白榆。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寡鹄迷苍壑，羇凰怨翠梧。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这首诗冯浩以为是追悼令狐楚之作，故将它编入开成二年《行次西郊一百韵》之前。固不错，但冯氏误信朱长孺所引《水经注》谓武都秦冈山有圣女神，便疑惑圣女祠即建于该处。但义山诗里，从来没有到过武都秦冈山的事迹。只有兴元回京时所走的路程，与武都相近，于是冯氏不惜抹却良知，硬将好好走在由兴元归途上的李义山，拉往数百里外的秦冈山打了一个大弯儿。但弯儿虽然打成了，圣女祠的诗，也可以勉强说是在秦冈山做的了，只是全诗艳丽芬芳，似写儿女情怀，义山既特绕数百里的道路，专诚叩谒圣女神，不应这样轻佻，况于吊令狐之丧归来，也不该有这样的闲情别致，冯氏左想右想，觉得不可通，索性再横一横心，将这首诗认为一派的寓言，诗中所有的艳情，只算是追悼令狐的话。

在冯氏这种办法，方便总算方便，但他的大错便在这时候铸成了。因为他将这首五排当作“追悼令狐楚的寓言”，以后各种关于女道士的诗，也就不能不解作“希冀令狐**提挈的寓言”了。

我以为圣女祠并非真有其地，不过是义山情人所居寺观之代名词。义山由兴元还，过此祠，所爱之女道士已他去，故有“何年归碧落”的疑问。“青雀”一联与“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昨日》）相同，不过此处是说女道士现在究归何处，无从探听，只有待青鸟携将消息来罢。“楚国梦”兼指所爱宫嫔而言，“汉宫巫”则指女道士，因为女道士系由宫女出身，可以时常入宫醮祭，故以此呼之。“从骑”一联，是想象女道士临走的景况。“月姊”一联是希望她更回来。“寡鹄”、“羇凰”指宫嫔，义山所认识

的宫嫔，乃敬宗所遗下的后宫人，所以说她们是寡鹄。这诗后段几句的大意：是女道士虽已经迁去，我不能同她们更恋爱了，但宫中还有不自由的宫嫔，还要我们偷桃的方朔，去安慰她们呢。又有《重过圣女祠》一首：“白石岩扉碧鲜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七）华阳观

我前回已说过《圣女祠》，并无其地，不过义山情人所居祠宇之代名祠。又曾说义山情人是姓宋而住华阳观中的女道士，那末，圣女祠就是华阳观了。

（圣女祠在王屋山，并非在京师之华阳馆，请看《再序》）

但华阳观究竟是什么寺观呢？

《唐书》：“代宗女华阳公主，性聪颖，上奇爱之。大历七年（公元七七二）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白居易《春题华阳观》：“帝子吹箫逐凤凰，空留仙洞号华阳。落花何处堪惆怅，头白宫人扫影堂！”自注：“观即华阳公主故宅，有旧内人存焉。”

因此我们知道华阳观是华阳公主的旧观。

但是这华阳观又在什么地方呢？唐欧阳詹有《玩月永崇里华阳观》诗和序（见《全唐诗》和《唐文粹》）白居易有《永崇里观居》诗，中有“……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等句。我们又可以知道华阳观是在永崇里。但永崇里在什么地方，这也不可不知。

白居易《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性情懒慢好相亲，门巷萧条称作邻。背烛共怜深夜月，蹋花同惜少年春。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文行如君尚憔悴，不知霄汉待何人？”白居易时为校书郎，所以有芸阁之句，他的《早春独游曲江》有“朝从直城出，春傍曲江行……回看芸阁笑，不似有浮名……”我们可以知道校书阁虽在城里，离曲江不远，可以互相望见。居易之僦居华阳观，大约因其离阁甚近，早夕入阁校书便利。因此又知华阳观与秘书省相邻，离曲江也不远。

居易应举时，曾僦居华阳观以习举业，故后有重过华阳观诗。

华阳观中虽有旧宫人女道士等，但僦居举子仍极多，因为它的位置和曲江相近，曲江有题名的慈恩寺塔，有杏园，都和举子有密切关系。

钱希白《南部新书》：“长安举子，六月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净坊庙院作文章，曰夏课。时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李肇《国史补》：“既捷，例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敕下后，人置皮袋，例以图章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闾阎为之半空。公卿家以是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李肇《秦中岁时记》：“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一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便被罚。”《旧唐书·宣宗纪》：“敕自今进士放榜，杏园仍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游，故曲江亭禁人宴聚也。”因此白居易的“杏坛住僻虽宜病”，“蹋花同惜少年春”，可以算做即景即事的诗。居易又有《自城东至，以诗代书，戏招李拾遗，崔二十六先辈》一诗，曲江在长安城东，居易之所谓自城东至，即自华阳观中至之谓。

于是我们知道：华阳观是在城的东边，和曲江相近。（八）义山之住处

华阳观在贞元之间景况很冷落，白居易诗可证。到义山时，有四五个公主同时出家，天宝大乱之后，物力维艰，建不起金仙、玉真那样的寺观。

只好住在她们的旧寺观中，华阳观这时候大约也住了一个公主，所以顿然热闹起来。义山于开成元年住在京里攻举业。他是否僦居华阳观，我们无法证明。但我可以知道他所居离华阳观不远。他和王茂元女儿结婚，婚后同来京师即假馆于李十将军。因李十将军是王茂元夫人的兄弟：为义山妻王氏的娘舅。李十将军住在招国里。《长安志》：“昭国坊在朱雀街东第三街……”所云街东，想即近城东的街坊。

义山《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有“家住红蕖曲水滨”之句，可见李十将军住在离曲江不远的地方。义山病中犹能访李将军，则居必与之邻。而且后来之假馆与王氏同住，想都为就近方便起见。

况义山后因事离京《寄李十将军》诗有“同听汉苑莺”，《思归》有“旧居邻上苑，时节正迁莺”，等句，所谓上苑，即指曲江离宫。

义山所居和华阳观相近，又和曲江离宫相近，无怪乎有和宫嫔发生恋爱的可能了，何况入宫还有永道士第男女道众的介绍。

二与宫嫔恋爱的关系

普通见解以为义山与女道士恋爱关系，勉强可说有成立的理由，因为唐代女冠的大多数，行为本来很是浪漫。至于说义山与宫中妃嫔也有恋爱的关系，我想定要招读者许多疑怪了。一则呢，禁禦森严，外人似无擅入之理。二则呢，专制时代对于保护宫禁尊严，非常注意，平民偷窥宫禁，误入掖庭，查出尚当大辟。何况与宫嫔发生秘密勾当？则发这种议论的人，似乎太荒唐了吧。

但我们要知道，专制时代，各朝的法律虽大略相同，而各朝的风气，却大相径庭。风气已成，法律自失其效力了。唐代宫闱不肃，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更证以义山之诗和当时史迹，我敢判断义山和宫嫔恋爱一案，有成立之可能。中国帝王，本抱多妻主义，所谓三宫六院，宫女三千，俨然成为定制。以一人之身，而置如许多的妃妾，防范稍有不严，难免闹出笑柄，所以对于宫禁不得不取闭关政策，宫中使唤，不得不用阍人。但防范无论如何严厉，历代宫闱，仍然少不了风流秘史，如秦襄王后、汉吕后、晋贾后等的恋爱史，都是历史上显明的事迹。以椒房之贵，母后之尊，尚不能自制，何况那些妃嫔和宫人呢。

唐代宫禁最宽，宫人可与外人互通声气，恋爱自由，几成常事。构成这种现象之原因，极为复杂，举其大端如下：（1）女权的发达重男轻女，本是中国传统的观念，女子止为男子的附属品，在律法上几无人格可言。男子又将家分为“阍外”、“阍内”两部分，阍外的事，由男子自管，女子活动的范围，只限于区区内室。至于说到女子在政治上的位置，那真不啻说梦话了！

然而唐朝却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居然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开了新纪元，也在中国历史上放射一个异样鲜明的色彩！

看吧，她以纤纤弱女子之身，竟能垂制临朝，改元易服，轰轰烈烈的

干了十六年。她在位时屡伐突厥，用郭元振为凉州都督，拓境一千五百余里，伟略及得汉武帝。延揽人才，搜罗豪杰，如狄仁杰、张柬之等皆一代名臣，英明足比唐太宗。称帝之后，降皇帝（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打破女姓附属男姓的奴隶习惯。立武氏七庙于神都，俨然要创立女宗，不希罕什么附祀和配飨。以上官婉儿衡量人才，“明月夜珠”，流传为千古佳话；她自己扇奖风雅，亦复不遗余力，表现女子在文学上的天才。上帘以见张嘉贞，又在紫宫七宝帐中，与诸文臣分韵赋诗，一切有才之士，不问官阶，无不接见；杜甫诗所谓“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真写出雄主的气概。她那礼贤下士的态度，励精图治的精神，不必细叙，单就她提倡男女交际一端而论，也实在值得我们赞扬和钦服的了。总之武则天的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她的伟大的气魄，和深远的眼光，后代史官，无论怎样讥嘲辱骂，都掩不了她真正的价值！

当时女界竟诞生了武则天这样一位奇杰，女权的发达，自大有可观了。而且数千年来死气沉沉的女界，对于政治活动，向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自则天称帝以后，也渐渐觉悟了。

史称陈硕贞女子于则天朝举兵，自号文佳皇帝，则天闻之叹道：“世间又有此奇女子耶！”则天死后，女权仍极发达，女子对于参加政治权的要求，也极热烈；于是就有许多女子，在政治舞台大展其手腕了。《唐书·诸帝公主列传》，称太平公主，以预诛二张之功，及助睿宗登位，势倾天下，与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七公主，皆开府置官属，朝廷大政，非太平公主关决，则不敢行；闻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中宗的韦后，权术不及则天，而擅握大权则相等，也为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开府置官。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爵，每自草敕，掩其文请帝（中宗）书，帝笑从之，竟不省视。事皆见于史传——唐朝既有一个女子做皇帝，又有许多公主做官，男女不分界限，宫闱不肃，就是受这个影响。

（2）帝王的放纵武后在位时，宠张易之、张昌宗等，听他们自由出入宫禁。中宗与韦后屡次微服出外观灯。又常放宫女数千人，夜游纵观，与外人交通。多逃逸不还，帝亦不问（《唐书》）。当时宫禁之不严，不能不说是帝王自己之过。

明皇是个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君王。洞晓音律，又喜提倡音乐，《唐书》称其立梨园，选子弟亲教以音乐，号为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号梨园弟子，居之于宜春院北。按明皇于开元二年于宜春院置左右教坊，梨园子弟居于教坊之中，而习音乐之宫女即居院北，相离不远，接触机会自多，即与外间通声气亦复不难。元稹《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垂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万众喧溢，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之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开元天宝遗事》：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执板当筵，声出朝霞之上。”就算念奴是个宫伎，非宫人可比，但与诸郎双飞双宿，视同固然，时人亦恬不为怪，足见当时男女恋爱的自由。又杨贵妃于朝元阁演《霓裳曲》，长安书生李 于宫墙外“L 笛偷翻，外间遂传此曲。当时宫禁与外间仅隔一

墙，还保得春光之不泄漏吗？何况还有宫伎之勾引呢？

明皇在宫中行乐，常与诸王共。与梅妃斗草，顾谓诸王曰：“此梅精也。”帝与宁王弈，将不胜，贵妃纵玉笋乱其局。帝制《紫云回》及《凌波曲》成，试演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妃子弹琵琶，上击羯鼓，马仙期方响，贺怀智拍，张野狐箜篌，李龟年箴角篥，自旦至午，欢洽异常。时惟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瞞乐部，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均见《杨太真外传》）。看当时觴筹纵横，履舄有交错，握手无罚，目眙不禁的光景，以及君王有趣的戏谑，贵夫人轻倩可爱的言词，俨然是一幅路易十四的宫廷行乐图。那些古板可嫌的男女“避面而行”、“不同席”的陋规，在唐代交际场中，简直视同无物。

（3）公主外戚的表率唐代公主对于政治既有特权，又幸生于宋儒之前。那什么“名节”、“贞操”种种鬼话，也没有濡染过，所以对于恋爱自由，大为提倡。唐公主的驸马，不死便罢，死则公主无不再嫁（参看《唐公主列传》）。也有公然当着驸马之面，而行不端的：安乐公主于武崇训在时，即与武延秀乱；顺宗女襄阳公主嫁张克礼，常微行市里，与青年子弟薛枢、薛浑、李元本等发生恋爱关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有司莫敢谁何（《唐书·公主列传》及《旧唐书·李宝臣传》）。

浚阳、邵阳、平恩乃襄阳公主之姊妹，于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出家为女道士。正胡震亨所谓“与商隐同时”者。但胡氏又说“史虽不言他丑，颇著微词。”其实我翻遍新旧《唐书》，“微词”并没有看见一句，胡氏之所云云，主观色彩太浓，不足教我们心服。但是浚阳等三公主果然是真心修道者吗？不、不，她们也不过借此得到恋爱上更自由的机会罢了。史书上虽寻不着什么“微词”，唐人诗集却供给我们以显明的证据了。唐沈亚之元和十年进士为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太和初为德州行营使（《御制全唐诗·沈亚之传略》）他的诗集中有《梦挽秦弄玉》一首，又有《自记》一文，颇告诉我们此中消息。略抄如下：太和初，沈亚之将之*，自长安城出，客橐有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家。廖举亚之拜见庶长，尚公主弄玉。其日有黄衣中贵骑疾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鬢发，著偏袖衣，芳姝明媚。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曰沈郎院。居一年，公主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公读其词善之。时宫中有失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亚之送葬咸阳还，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居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敝秦不足辱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不能从死公主，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时日将晚，公追酒高会，执爵亚之前曰：“愿沈郎歌以塞别。”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授舞者杂其声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物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亦泣，良久，因题宫门，竟别去。公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中。

其《梦挽秦弄玉》词云：“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梦游秦宫》（一作《题宫门》）云：“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似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

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实在觉得离奇，世上真有人一梦竟至年余之久吗？梦中情节，能这样曲折尽致吗？唐人每有奇遇，辄托之于梦，我看沈亚之必与当时出家修道的公主曾有爱情，所以托之弄玉。至于秦穆公的一段周旋，却是假造出来，以炫惑时人眼光的，不足注意。（《唐书》称文安公主丐为道士，薨太和时。）

外戚则如杨贵妃的姊妹——三国夫人——也有诱致贵族子弟之事，不记得出于何书，只好暂缺。当时公主外戚等做下许多好榜样，宫中妃嫔等怎能不想效尤呢。

（4）女子对于恋爱自由的觉悟宫人们或由良家选入，或由有罪没入掖庭，春风寂寂，研守宫而自怜，秋雨潇潇，赋长门而魂断。她们生活的苦楚，白居易《上阳人》颇能描写一二。其诗云：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首诗写得极其深刻，宫人之苦可觐一斑。但是当时却有些先觉的宫人，受不住这样无人道的压制，她们居然起了要求恋爱自由的念头。《唐诗纪事》有这样几段记载：开元中，颁赐边军纁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夜若为眠？战袍经手制，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愿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顾况在洛乘春，与三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一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诗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鹦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乘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这两件事传闻亦稍异。纁袍寄诗亦作为僖宗时事，御沟红叶《通典》作于祐，后来祐与写诗宫人韩夫人成婚。《云溪友议》则作为韩偓，时代则仍在明皇时。

两事虽出于小说，我敢断其为真，何以故呢？凡伪造的故事，定要具二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本有其事，而过甚其词。一个条件是：有相类之事迹，可以比附。前者如黄帝周公本有发明学术，制作制度的事实，然后来一切学术制度，无不托为此二人之所创造，就将二人当作箭垛了。后者如汉武帝本有求仙之事，后人竟造出许多《汉武内传》、《上元夫人传》，所记一切情节，曲折离奇，像煞有介事，其实皆子虚乌有之谈。现在“纁袍寄诗”、“御沟红叶”等事，为从前所未有，亦无相类之事，可以比附；且不发生于别朝，偏发生于宫禁自由的唐代，更可决其非伪。——至于时代及人名，颇有舛异者，则因这两件事，颇有风趣，为当时文士所乐道，辗转传流，遂有讹错，我们不但不能因这个缘故，将此案推翻，而观其传流之盛，更足信其为真实。——时代我证明在僖宗前，因元和时徐凝已有《上阳红叶》诗，咏其事。（5）文人对于性解放的呼号诗至唐代而极盛，不但艺术方面臻于完美，即内容也有许多不可磨灭的价值。我曾在唐人诗中发现了一种最宝贵的“人道主义”，为从来所没有，与后世欧美诸哲之议论，亦若合符节。

“人道主义”下产生两种特别作品，一是描写“征戍之苦”，反对帝王穷兵黩武的举动，主张“非战论”。一是描写“宫怨”，为可怜被压迫的宫人，呼号性的解放。

前一项与本文没有关系，且述后一项。从前梁简文帝好为“宫体”诗文，陈后主、隋炀帝也喜描写宫人生活，但他们除叙述，或描写宫庭乐事之外，却不注意于宫人内蕴的情绪，唐时便不然了。他们一面写宫人美丽的形态，一面就写她们幽怨的心理。白居易的《上阳人》，写一个良家女子从红颜皓齿的时代，选入宫庭，直到白发盈颠，还没见过君王一面。

他写宫人的凄楚，前文已征引了一段，我们读之，能不为她们表深切的同情吗？杜牧之的《阿房宫赋》虽叙秦宫事，实则暗指本朝而言，王昌龄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凄怨已极，至于李贺的“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是更进一步而要求解放了。

唐因武氏称帝，女权发达，公主等因政治上之胜利，而又谋恋爱上之自由，风会所趋，宫人觉悟于内，文人呼号于外，对于君主所施无理的“性的压迫”，渐有反动的酝酿。谨愿的只敢题诗写怨，狡黠一点儿的，便真的做出来了。

以上所述五项，实为唐代宫闱不肃之大原因，现在容我来研究义山与宫嫔的恋爱史罢。

（一）宫中之醮祭

义山之与宫嫔有情，乃由相识之男女道士介绍而来，所以两件恋爱事，实在可以归并到一件。

唐公主虽学道出家，与宫中仍相来往。玉真公主于父睿宗朝为道士，但仍时常入宫与阿哥等游戏。相传明皇于皎月之下，恒与玉真、贵妃等，以锦帕蒙目，为捉迷藏之戏。玉真于裤服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上屡捉屡失（见《致虚阁杂俎》）。代宗女华阳公主，性聪颖，上奇爱之。大历七年，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病亟，帝亲临视，啗帝伤指（《唐书》）。其他则唐人应制从驾道观之诗，非常之多。帝王既幸男道观，亦必幸女道观。（如《幸白鹿观应制》一题，沈佺期诗云：“唯应问王母，桃作几时华？”崔旆诗云：“捧药芝童下，焚香桂女留。”皆女道观之证。）宫中与道观既有时常来往的机会，则外人混入宫中，自非难事。

再者唐代帝王迷信道教，祭醮之风甚盛，到设坛时，羽士可以随时出入宫庭。唐人《步虚词》每咏其事，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诗云：“……天门九重高崔嵬，清空凿出黄金堆。夜叉守门昼不启，夜半醮祭夜半开！……太上道君莲花台，九门隔阔安在哉！……”

苏郁（贞元、元和间人）《步虚词》云：“十二楼藏玉堦中，凤凰双宿碧芙蓉（一作梧桐）。流霞浅酌同谁醉，今夜笙歌第几重！”

卢仝诗或以为寓言，我则以为写实。不过诗虽痛恨宫禁为醮祭所破坏，对于君主宫嫔尚无“微词”。至于苏郁的诗，我们就不能说他毫无所指了。

义山初次入宫，必因宫中有醮祭事，而为羽流所携入。那么彼时宫中死了什么人，而有建醮之事呢？这却不能不考。

按文宗后妃，新旧《唐书》都无列传。今据安王溶、庄恪太子、杨嗣复等传考之：则文宗有二妃，一为王德妃，生鲁王永，即庄恪太子。一为杨贤妃，最得宠幸，无子，常思拥立安王溶（穆宗子，文宗弟）以自固。

鲁王永于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被立为皇太子。开成三年以宴游败

度，不可教导，文宗震怒将黜之。群臣极力谏止，上意稍解，命太子入少阳院。为诛嬖昵者十余人。（见新旧《唐书》）开成三年十月，暴薨。

太子之薨，新旧《唐书》都说为其母恩宠渐衰，杨贤妃屡次在文宗前谗构其短，中心忧惧，所以郁出病来，而致于死。但我颇疑太子之死，是自尽的。郑覃、杨嗣复等哀词，所谓“忧竟损寿，沉疴始遘……”忧竟是真，沉疴却是假话。太子因为杨妃之构陷，不能辨白，忧愤之余，对品行爽性不加修饰，为文宗之所切责。想非一次，神经刺激过甚。结果只好自杀了。不然，“暴薨”一语何来？而《旧唐书·武宗本记》：“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之一语又何来呢？

不过庄恪太子如何死法，与本文没有关系，可以存而不论。我现在所要讨论的，是他母亲王德妃究竟死在何年？

文宗崩后，杨贤妃为武宗所杀，史有明文，但王德妃不知下落。据我推测，德妃当死于开成元年秋间。何以知其然呢？德妃恩宠已衰，心已悒悒，更加眼见其子为杨妃所谗，东宫之位，岌岌可危，而又无力援救，必更十分忧闷。忧能伤人，安能无死？太子之母已死，失所倚恃，杨妃之构陷愈急，始有开成三年议废立之事。新旧《唐书》既未书明王德妃薨于何年，则我之假定，可以成立。而且义山诗中颇有涉及德妃秋季病笃之事。其混入宫庭，亦由于德妃之祭醮。义山有《李夫人》三首，前二首为五绝。

“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剩结茱萸枝，多擘秋莲的。独自看波光，彩囊盛不得。”后一首为七古：

“蜜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眸割！清澄有余幽素香，鰾鱼渴凤真珠房，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土花漠漠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苍！”

三诗旧解多以义山悼亡，我则以为悼王德妃而作。梁武帝诗“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此言夫妻必两下情投，方能和合，现在文宗对于王德妃已无爱情，则德妃无论怎样思慕他，也不过落一个单相思而已，如一条带儿，便不能结为同心结了。“白茅人”乃指汉方士栾大，武帝使其立白茅上受五利将军印，同时方士齐人少翁，为武帝招致李夫人的魂魄，盖李义山用以指宫中之建醮。“惭愧”者，说文宗待王德妃，生前既然无恩，死后又设虚文的醮祭，替他想想，未免可愧也。“月”乃后象，“星”为妃妾之象，德妃曾否册为皇后，不可得而知，但所生之子，既为东宫，则亦俨然皇后了。德妃没，杨贤妃更得擅宠，如代其位，故用“替”字字样。《尔雅》注：“的，莲中子也。”莲子之心甚苦，“多擘秋莲的”言德妃失宠之悲也。《招魂》：“嬉光眇视，目曾波些。”《续齐谐记》：“弘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采囊承柏叶上露。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杨妃之得宠，似与其媚眼有关，似诗中特为指出。与“柔肠早被秋眸割”及《河阳》诗“可惜秋眸一睂光”皆可互通。

“寿宫不惜铸南人”言文宗宠幸杨贤妃，几欲以金铸之。或用北魏立后，辄以金铸后容之典，或即暗用越王黄金铸范蠡的故事，无非言其爱宠听从之极罢了。“柔肠早被秋眸割”言杨妃善于狐媚，德妃柔肠，早被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割碎。此句写妇人嫉妒的心理，可谓入神！“鰾鱼渴凤”等句，言德妃宠衰，与《河阳》诗“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相同。“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似说德妃病入膏肓，还让杨妃给闲气她受；也可以说病室萧条，至于帘破风侵，

都没人来过问，又与《河阳》诗“晓帘串断蜻蜓翼”相通，似乎是当时一桩实事。

二首五绝，一首七古合在一处，已有些不伦不类，而题为《李夫人》，又与李夫人故事完全不合，故知其必系借用。《河阳》诗“黄河摇溶天上来，玉楼影近中天台。龙头泻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可惜秋眸一陂光，汉陵走马黄尘起！……”也是咏的王德妃之事。德妃或是河南人，故诗名《河阳》，又屡标黄河字样，以醒人耳目。“梓泽”似指杨妃，杨妃不知何处人，但史言其与杨嗣复同宗，嗣复宏农人，则杨妃亦河南人。《通典》说金谷、梓泽并在河南县东北。黄河、梓泽是河南的二条水，故借以影射二妃。起先德妃得宠，如黄河之影近中天，不意后来竟被杨妃占了胜利。“长沟复堑”似言杨妃城府之深，计划之密，“埋云子”或即指谗毁太子一案，借用浮云蔽白日的意思。“汉陵走马”则言德妃果为杨妃谗死，葬于陵中。又有《烧香曲》全篇咏宫嫔烧香的情景，末数句云：“……玉佩呵光铜照昏，帘波日暮冲斜门。西来欲上茂陵树，柏梁已失栽桃魂！……蜀殿琼人伴夜深，金銮不问残灯事……”这首诗或以为叹杜秋娘之流落，或以为指“甘露”之变，我觉得都说不通，恐怕还是咏王德妃死后醮祭等事。“铜照”镜也，乃至明之物，今为人所呵，则朦胧了。此乃映射文宗听杨妃之蛊惑，气死王妃之事。“帘波”二字难解，但《西京杂记》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为水文及龙凤象，合下“茂陵”二句，明言德妃葬事。“蜀殿琼人”则言文宗方拥杨妃而寝，对王妃之烧香，本是虚应故事而已，本来不问一声，故有“金銮不问”之句。

还有《海上谣》一首，似亦同时所作。中有“……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全诗过于晦涩，故不具录，我们现在单来看义山在醮祭时所做的诗罢。《汉宫》云：“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罍甲帐春。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醮祭时宫门彻夜开放的景况，则如《齐宫词》之所写：“永寿兵来夜不户向，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复风摇九子铃！”

（二）宫庭与道观之交通义山由道观之径路，而达宫庭，以《玉山》一首为紧要关键。

诗云：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玉山”指道观，“阆风”指宫禁，当时道观皆为皇家之建筑物，而居其中者，又多为天潢贵胄，其品级之尊崇，足与宫禁相并，故云“相齐。”

次联隐指道观与宫禁通声气。“回日驭”是指当时公主皆握政治权，有回天返日的力量而言，《唐书·太平公主传》，浮屠慧范奸贪不法，为薛谦光所劾，将被惩治，贷公主为申理，谦光反得罪。即其一例。“上天梯”之“天”代表君王所居之所，言由道观而达宫禁，如登天之有梯。

“龙”乃君之象征。庄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骊龙颌下，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人到骊龙颌下去摘其珠，本极危极险，但在龙渴睡之时，便可以行所无事；正如一个人跑进宫禁和宫嫔恋爱，原有性命之忧的，然而沉湎酒色的君王，正有做着钧天好梦，纵然出了“中篝之丑”，他又何尝得知呢？义山诗“非关宋玉有微词，只是襄王梦觉迟！”可与他此诗互相发明。“凤要栖”犹言这样如花如玉的美人，你竟捐同秋扇，我不免要据而有之了。

三字扬扬得意，不啻恋爱胜利者之凯歌。而且这二句话对于君王似警告而实嘲侮，刻毒之极。

末二句是托道士相携入宫之意。此道士或即永道士，乃宋华阳姊妹之情人，与义山有“姨夫之谊”，也是义山王屋修道时的老同学，因入宫建醮，携义山入宫，乃情理中事。

（三）宫中景象

入宫之后，所描写的宫中气象，有《一片》之诗可证。“一片非烟隔九枝，蓬莱仙仗俨云旗。天泉日暖龙吟细，露晞春多凤舞迟。榆荚散来星斗转，桂花寻去月轮移。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

《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初醒龙宫宝焰然，瑞霞明丽满晴天。

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非烟。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极，龙伯擎将华岳莲。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

这一首梦作的诗是义山出宫后，追忆宫中情形与知己朋友闲话，不敢明言，只好托之于梦。不过唐时宫闱虽不肃，宫禁不能说不严，义山入宫，似仅此一二次，其与宫嫔相识即在此时，以后幽会，则另有处所。

（四）曲江

义山与宫嫔之欢会，既不在宫中，则必在行宫别馆。细察义山与宫嫔相会之诗，处处有“板桥”、“溪”、“柳”、“荷”等字样，则离宫必建筑于水边了。唐时避暑离宫除曲江外，更无别处，于是我在曲江一方面，用心考查，果然寻出许多证据，证明义山与宫嫔相会之地点，是在曲江离宫中。（1）曲江所在之地点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云：“临曲江之嵚州”，注曰：“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杜臆曰：“长安城东有霸陵，文帝所葬霸陵南五里，即乐游原，宣帝筑以为陵，曰杜陵。”——据此则曲江离长安城十里，在长安城东南。

《剧谈录》（康骕著）“曲江在府东南十里，秦曰嵚州，汉为乐游苑，皆下杜之宜春也，基地最高。”更足证明曲江所在之地点，果在长安东南十里。

（2）曲江之胜景《剧谈录》：“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元上巳二节。锡宴群臣，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南即芙蓉园，西即杏园、慈恩寺……曲江池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

杜甫《曲江三章》之一，“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九日曲江》：“浮舟菡萏衰。”《哀江头》：“细柳新蒲为谁绿！”皆天宝乱后作。又《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见曲江景物之胜，与都人士及贵族等游赏之盛。

（3）文宗建造之楼台《西安府志古迹考》，太和元年，文宗发左右神策军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云楼、采霞亭。司马光《迂叟诗话》：“唐曲江开元天宝间，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其地尽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采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置亭馆焉。”

据此则紫云楼、采霞亭，乃文宗所增建，《西安府志》以为修理，颇谬。

又义山《无题》（一作《阳城》）诗云：“白道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此乃与宫嫔恋爱后，追念文宗建造楼台事而作。“枉破阳城十万家”，可见文宗虽用兵工，糜费财力也不少。

文宗在曲江建造楼台，半为保存古迹起见，半亦为便于自己游赏起见。文宗有妃杨氏，最为宠幸，建楼或即所以居杨妃。杨妃既居此，则义山所爱之宫人，亦随侍右左。行宫关防，万不及宫禁之严紧，义山便学武陵渔父，时来问津了。（五）与宫嫔之幽会

“碧瓦衔株树，红轮结绮寮。无双汉殿鬓，第一楚宫腰。雾唾香难尽，珠啼冷易销。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柳暗将翻巷，荷欹正抱桥。钿毂开道入，金管隔邻调。梦到魂飞急，书成即席遥。河流冲柱转，海沫近槎飘。吴市蚩^{**}甲，巴 翡翠翘。他时未知意，重叠赠娇娆。”（《碧瓦》）又有一首诗和这一首意境相象：“怅望西溪水，潺^{oe} 味 巍² 疾⁴ 何鹄^倪 疾^跚 ρ 触^哨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西溪》）

两诗皆咏曲江离宫景物，“河流冲柱”旧注以为“中流砥柱”，大谬。乃暗用尾生抱桥柱的故事，言与情人幽会之不失约而已，又切合水畔风光。“海沫槎飘”见《荆楚岁时记》，此喻身入离宫与宫嫔相会，如张骞乘槎上天而见织女。义山有《海客》一绝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憖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寓怀》云：“星机抛密绪，月杵散灵氛。”《壬申七夕》云：“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皆相类。牵牛指织女之夫，即唐文宗。

西溪即指曲江。何以谓之西溪呢？《通志》：“下杜城西有第五桥丈八沟。”《西安府志》云：“丈八沟在京兆西南一十五里，乃漕河岸最后处。长杨高柳，莲塘花圃，竹径稻塍，为游览胜地。”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纳凉》诗注云：“丈八沟天宝元年韦坚所通漕渠。”《西安府志》又云：“曲江之水，会合城外南来之黄渠水，可穿城而入长安……”我疑黄渠即丈八沟，因其在曲江之西南面流来，故义山谓之西溪，又谓之南塘。

曲江既可流入城中，交通自然便利。宫中人有时偷由水路，而达曲江离宫，与外人相会的必也不在少数。义山《吴宫》诗云：“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凤女”是所恋宫嫔之名——后详——“弹瑶瑟”乃以弹瑟之声，作幽会之暗号。《夜半》云：“三更三点万家眠，露欲为霜月堕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时动倚窗弦。”斗鼠蝙蝠皆于夜时出来，赴欢会之人，亦必于夜间动身，故以相比。“瑟”字后详。“龙孙”义山自比。义山本唐宗室，故诗云“我系本王孙。”忆其子《袭师》云：“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哀。”“撼玉珂”者，窗上微拨瑟弦，下则撼玉珂而应之，乃幽会之暗号。“玉珂”即是身上所御环佩之类，当时仕宦之男子亦佩之。谓之“朝珂”。

《无题》：

“含情春日晚，暂见夜阑干。楼响将登怯，帘烘欲过难！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归去横塘晚，华星送宝鞍。”《明日》：

“天上参旗过，人间烛焰销。谁言整双履，便已隔三桥！知处黄金玦，曾来碧绮寮。凭栏明日意，池阔雨萧萧。”《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张盖欲判江滟滟，回头更望柳丝丝。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

《如有》：

“如有瑶台客，相离复索归。芭蕉开绿扇，菡萏荐红衣；浦外传光远，烟中结响微。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帏！”

这几首诗写在曲江与宫嫔之幽会，事迹显然，不必逐首注解。还有《镜槛》五排一首。

太长，不全录，只抄它要紧的几句。“斜门穿戏蝶，小阁锁飞蛾……待乌燕太子，驻马魏东阿……岂能抛断梦，听鼓事朝珂？”这首诗与前几首合看。与宫嫔聚首以至分手的情形，层次井井：（1）夜间至窗下用瑟弦玉珂为暗号。

（2）因隔院尚有文宗杨妃等，不敢惊动，故上下时蹑足屏声。

（3）进由斜门，幽会则在小阁中。为防人冲进起见，有时下锁。

（4）天微明则潜出。

（5）义山尚有公事待办（开成四年释褐为秘书省校郎），故晨即赴省。

（六）相识宫嫔之返宫曲江离宫建于城外，春夏之际，文宗率领杨贤妃及宫人等到此居住，秋冬或须返宫，所以义山与宫嫔恋爱时所描写的，不是细柳新蒲的春景，便是荷花蕉叶的夏景。如《促漏》一诗乃宫嫔入宫后，春时相寄之诗，“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都足证明宫人非常年住在曲江。

现在再转过来，看义山怎样写宫人返宫的情景：《无题二首》：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秋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情狂！”这两首诗是宫嫔返内苑后，义山又至幽会之地徘徊而作。“扇裁月魄”见斑婕妤好诗“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车走雷声”见《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文宗与杨贤妃返宫，宫嫔一概随归。义山于道路间见其所识之宫嫔，见其羞而以扇自障之态，又以车骑杂沓，虽有语而亦不能通故云云。（其实这也不过做诗罢了，义山未必有这样大胆，敢邀于路而与宫嫔通辞。）“斑骓”乃幽会时所骑之马，义山入曲江离宫，有水陆两路：水路用船，所谓“海客乘槎”便是，陆路用马，所谓“归去横塘晚，华星送宝鞍”（《无题》）便是。今系马之地，垂柳依然，但人则不见，能不爽然若失！

第二首写归后之怅惘。似言“侯门一入深如海”，何况宫门？相思亦知其何益，不过不能不悵悵于衷者，此乃爱情作祟的缘故耳。

《深宫》：

“金殿销香闭绮栊，玉壶传点咽铜龙。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斑竹岭边无限泪，景阳宫里及时钟。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

《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腊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言只有曲江离宫可为幽会之地，返宫后则没有机会了。但义山常在宫墙外巡视、徘徊。虽身无羽翼飞入宫庭中，但两个情人心心相印，未尝不有如灵犀文理之可通。又《无题》云：“幸会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梁家宅里秦宫人，赵后楼中赤凤来。冰簟

且眠金缕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

这首诗所用故事，最足表明义山自己与宫嫔的关系。“秦宫”见《后汉书·梁冀传》：“冀爱监奴秦宫得出入妻孙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赤凤”见《飞燕外传》：“后所通宫奴燕赤凤，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是日连臂蹋地，歌赤凤来曲。”“宓妃”即甄后，曹子建爱之。后被谗死，后帝以后遗玉镂金带枕示植，植不觉泣下，乃以枕赐之。渡洛水，见一女子，来与通款曲，植乃作《感甄赋》，明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见《文选》注。义山与宫嫔返宫后不更相见，故一则芝田愁坐，一则冰簟且眠，写出无聊之极的心绪。

《无题二首》：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蜡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金翡翠”是被，《楚辞·招魂》篇“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绣芙蓉”是帐，鲍照诗“七采芙蓉之羽帐。”此言宫中衾褥帐幔之华美。“刘郎已恨蓬山远”，用汉武帝求仙故事。言在曲江尚恨不得时常相见。今在深宫，更不能一通款曲了。第二首“金蟾”、“玉虎”之句，千古无人能解，于今让我来臆测一下罢。按蟾善闭气，古人用以饰饼，此言宫禁极严，但昔日为烧香事，我曾混进一次也。“玉虎”是井上辘轳，“丝”为井索，言入宫与宫嫔恋爱极难，等于汲井底之水，但有辘轳，又有井索，我居然汲水而回了。

再者，所爱宫人之居处，本有一井，则此诗所言乃双关语。“窥帘”见《世说新语》，“宓妃”解见前。（七）卢氏姊妹

讲了半天义山与宫人的恋爱，他所恋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也不可不弄清楚的。这一节就专为讨论这个问题。

义山所恋爱的宫嫔，乃卢氏姊妹名飞鸾轻凤者二人，——义山所偏爱的，乃系轻凤——二人本敬宗舞女，敬宗崩后，文宗纳之后宫，生子宗佖。

这段事迹颇长，分节细论，以免混淆。

（1）飞鸾轻凤

按义山集中有《富平少侯》一诗云：“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徐德泓谓此诗为敬宗作。帝好奢侈，宴游无度。赐与不节，尤爱纂组雕镂之物，视朝每晏。《汉书》：成帝始为微行，从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称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为比。

冯浩极赞成徐氏之说。不过末句徐氏引郭妃，冯氏斥为误，别引苏鹗的《杜阳杂编》以正之。《杜阳杂编》说：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浙东贡舞女二人曰飞鸾轻凤。帝琢玉芙蓉为歌舞台，每歌舞一曲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歌舞罢，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宫中语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冯氏谓义山诗指此。此说在冯氏固见考证之精切，而在我们主张“义山与宫嫔恋爱”论者，也得了绝大的帮助。但考《杜阳杂编》，则“浙东”二字，作为“oeJ 东国”，宋金*凤二人，系由外国贡来。而翻《唐书·外国传》，没有“oeJ 东国”之名，《诸帝本纪》，*参藿 敝 怠O付烈迳绞ǎ亦

未尝说明二人乃系外国人。我们虽然可以说二人来华已久，已经与华人同化，但义山是个极细心的人，他既然能拿许多典故，叙述他千变万化的爱史，叙得洪纤毕悉，巨细无遗；他定然也能用一个相当的典故，点明二人之身出异国。更考《四库全书提要》之论《杜阳杂编》云：“……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记》，郭子横之《洞冥记》，虽必举所闻之人以实之，殆亦俗语之为丹青也。所称某物为某年某国所贡，如：日林、大林、文单、吴明、拘弭、大轸、南昌、*oeJ* 东、条文、鬼谷、河浚、兜离，《唐书》*上* 贡 *ā* 方晕藪嗣 吨畹鄆炯汀罚 轡查浣拢*即如夫馀国久并于渤海大氏，而云武宗会昌元年，夫馀国来贡。 宾地接葱岭，《汉书》、《唐书》，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显然者矣。……”

读了《提要》这一段批评，我几乎将《杜阳杂编》所说的话，完全当做荒渺不经之谈，不去征引它了。但它所记载的飞鸾轻凤二人，在义山诗中确有其人，确为敬宗舞女，无论如何，我没法否认它，那末，又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杜阳杂编》中国名，虽然杜撰，却也有些是真的：如女蛮国、新罗国、于阗国……都是史乘上所载的。也有些是根据小说而来的：如吴明见《洞冥记》“吴明之垆”；其述大轸国，则引《山海经》的合邱，禺橐两山；“*oeJ* 东国”必就是中国的斩 *ā* 0 础阜 *eJ* 字本音制，但《正韵》作之列切，*粽邾 “浙”同；所以浙江又可以唤做 *oeJ* 江。义山诗中既有鸾凤等度要 谖悖 *ū* 闹^ㄜ荅*我们正不妨揭穿苏鹞的狡狴，将他的“*oeJ* 东国”改正为“浙东。”——他杜撰国名中的南* 必就是江西省的南昌，其余国名，亦必另有根据。如果读者嫌苏鹞的《杜阳杂编》，皆不经之谈，不愿意借重于它，那也不要紧，总之我们知道敬宗时浙东曾进贡舞女二人，一名鸾，而一名凤，那就够了。

不过为便利起见，我此文的借证，仍写作《杜阳杂编》，因为它所说的和义山诗太相吻合了，我不能不承认它是事实。

但何以要说敬宗崩后，飞鸾轻凤为文宗所纳呢？则以蒋王宗俭乃卢氏姊妹之一——轻凤——所生之故。按唐穆宗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做了皇帝——敬宗、文宗、武宗。——敬宗崩时，寿仅十八，后宫佳丽，当然归阿弟享受，所以鸾凤二人成为文宗后宫中人了。如说这种乱伦之行，非帝王所宜有，文宗尚称贤君，似不如此。则不知名教之说，宋儒后始严，唐时尚不注重。唐太宗一代英主，杀其弟元吉，尚纳其妃，何况鸾凤二人，仅为敬宗舞女，纳之后宫，何伤于名分呢？

（2）何以知义山所恋爱之宫嫔即飞鸾轻凤二人？义山诗中屡用“鸾”、“凤”字样，这不能说他无所用意。例如《鸾凤》：

“旧镜鸾何在，衰桐凤不栖。金钱饶孔雀，锦段落山鸡。王子调清管，天人降紫泥。岂无云路分，相望不应迷。”“鸾”指轻鸾。“衰桐凤不栖”谓文宗方宠幸杨贤妃，对于旧日宫嫔，恩泽大不如前，不常临幸。此句与“桐拂千寻凤要栖”可相呼应，不过此处“凤”指文宗，而那首诗之“凤”字则义山自指罢了。“天人降紫泥”谓飞鸾轻凤以宫嫔之贵，而肯纡其身分，垂青寒士，岂非如天上神仙，下降尘世。末两句言我等身分悬殊，岂无贵贱之别，不过相爱既挚，也顾不得许多。“孔雀”或以比入宫的富有金钱之勋贵子弟（此语稍误续编已更正）。“山鸡”则义山自比。山鸡文彩，虽亦辉煌，究差鸾凤几等。而鸾凤不以为嫌，引为同类，岂能无感于中？《凤》诗“未判容彩借山鸡”与“锦段落山鸡”，是同样感激涕零的笔法。

如果说义山此诗乃咏真鸾真凤，则诗之后四句，说的是什么呢？

当时曲江离宫大讲开放政策，梦游天宫的倒很不少，流品亦颇杂，义山更有《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一诗：“韩蝶翻罗幕，曹蝇拂绮窗。斗鸡回玉勒，融麝暖金缸。玳瑁明书阁，琉璃冰酒缸。画楼多有主，鸾凤各双双。”诗中“鸡”自指。“韩蝶”“曹蝇”指韩曹二姓，“麝”指谢姓。

离京后，回念宫中事及鸾凤二人，有《当句有对》一诗：“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平阳”乃公主之宅，见《汉书》。“上兰”见《西征赋》。颜师古注曰：“上兰，观名，在上林中。”这一句诗正说明当时得入宫庭与宫嫔发生恋爱，乃由女道士等之携带，而女道士即系出家修道公主观中的人。“密迩”、“接”等字，可见离宫道观之相近。

“秦楼汉宫”明指宫殿。“鸳瓦”见《邺中记》：“邺中铜雀台，皆鸳鸯瓦”。白居易亦有“鸳鸯瓦薄霜华重”之句，乃指帝王家瓦而言。

《丹丘》一绝，也是义山西游时忆念轻凤之作。诗云：“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

《凤》：

“万里峰峦归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鸡。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栖。”

据此二诗，义山与飞鸾轻凤二人虽都认识，而偏爱者实为轻凤。“将雏”等语可见义山作此诗时，轻凤已有娠，但非蒋王宗俭，因为宗俭于开成二年封王，此时早已出世了。《唐书》称文宗有二子四女，或者后来生了一个女孩子（更正见后《药转》诗解）。

（3）何以知飞鸾轻凤之姓为卢？

按敬宗纳飞鸾轻凤，史无明文，《杜阳杂编》亦未著二人之姓氏。但我于义山诗曾寻出许多凭证，敢断定她二人姓卢。

义山《富平少侯》确系刺敬宗，结句“新得佳人字莫愁”亦确系指飞鸾轻凤二人。按莫愁乃洛阳女子，姓卢。必鸾凤二人亦姓卢，故义山始以莫愁相比。

现在为容易明白起见，将梁武帝《河之水》全诗录存于下：

“洛阳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

义山《代应》一绝云：“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

《楚宫》（一作《曲水闲话旧事》）：“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王昌且在东墙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春日》：

“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衔红蕊蜂衔粉，共助青楼一夜忙！”

《细雨》：

“帷飘白玉堂，簾卷碧牙床。楚女当时意，萧萧发影凉！”还有《马嵬》：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对雪》：“又入卢家妒玉堂！”《谑柳》：“玳梁谁道好，偏拟映卢家！”但看义山诗中用卢家故事，形容他和宫嫔恋爱，如此之多，则谓轻凤姊妹非姓卢竟不可了。

“王昌”乃义山自比，王昌与卢家的关系，唐人诗中常用，后来便不可考，想系有许多书籍和典故，今已不传的缘故。王灼《碧鸡漫志》为这事很用了一番考据的功夫，结果说“东家王”即王昌。我以为很有道理。又义山诗“三十六鸳鸯”，王灼以为即古乐府“鸳鸯七十二。”三十六者，三十六双，即七十二只也。古乐府《相逢狭路间》篇“……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就诗中“白玉为君堂”一语观之，可知此诗亦为卢家作。这段话，我也认为有理，不过王灼虽考出“王昌”、“三十六鸳鸯”与卢家莫愁的关系，却不知道义山诗是说的什么，以为有慕于有夫之妇，又以为有慕于娼妓，那就错了。

如说“卢”乃莫愁夫家之姓，非本身之姓，不可如此用者，那就未免太拘泥，“一声卢女十三弦，早嫁城西好少年”

（徐凝诗），古人早将“卢莫愁”三字打成一片了。（4）何以知宗俭为卢氏所生：《唐书·诸皇子列传》，言文宗仅有二子。旧书言王德妃生永，宗俭为何人所生，竟未说起。新书始言其为后宫所生。今义山之写所恋爱的宫嫔，处处表示她有一个儿子。《无题》云：“近知名阿侯，住在小江流。腰细不胜舞，眉长惟是愁。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

《拟意》云：“怅望逢张女，迟回送阿侯”，“夫向羊车觅，儿从凤穴求。”梁武帝《河之水》歌有“十六生儿字阿侯”之说。义山既以卢氏比莫愁，自然要将他生的儿子，比为阿侯。文宗除太子永及蒋王宗俭外，更无男儿，所以知道宗俭是卢氏所生。《无题》“近知名阿侯”之“名”字疑有误：一则文理不通，二则阿侯乃男性，而腰细眉长云云，则为女性之形容词，或是“召”之讹乎？

但庄恪太子薨后，文宗尚有一子宗俭，为什么开成四年立侄陈王为太子，自己亲生的儿子，反不使其继承大宝呢？我想这中间有几个原因：一者，文宗立太子以贤为主，鲁王永未立时，他再三想立敬宗子晋王，晋王早夭，才立永；可见文宗之立太子，并非以亲生与否为判断的。二者，杨妃擅宠，自己虽无儿子，却屡想扶立那母事她的安王溶，文宗几为所动，后为宰相李珣所反对，方作罢论，东宫虽立，卒为杨妃所谮死，哪里还论到一个不相干的宗俭！三者，飞鸾轻凤貌既艳丽，又生子，而到底沉沦后宫，做个三等妃子，不能与杨妃相抗，想为的出身微贱——乐伎之类——又为了曾侍敬宗，文宗为避嫌起见，不敢立她们为妃。母既不贵，子自然没有被立的希望了。

但鸾凤等虽为杨妃所嫉妒，而为了自己儿子宗俭之故，倒很替杨妃帮了一番谮陷庄恪太子的忙。不过杨妃并没有感激她们，而她们反因此害了自己。此事后当详论一番（此说误，更正见《王德妃》篇）。

（5）何以知飞鸾轻凤乃是姊妹？

《杜阳杂编》亦未言她们是姊妹，但义山《燕台四首》都为她们而作，有“当年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姊妹”之句。《景阳宫井双桐》亦指她们而言。喻她们为双桐，有同气连根的意思。又《河内》诗“八桂林边九芝草，短襟小鬟相逢道。”“九芝”乃汉武帝甘泉宫中之物，借言宫庭。“短襟小鬟”似系借用赵昭仪事。《飞燕外传》谓昭仪初入宫为秃襟小袖的妆束。昭仪乃飞燕之妹，影射轻凤乃飞鸾之妹。又代应“昨夜双钩败，今朝百草输”，古

人有藏钩之戏。李白诗“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又作“藏弓区”“藏阍。”其戏分为二曹，以校胜负，无俱败之理。义山言双钩败者，追悼卢氏姊妹甚为明显。

（6）义山何故与卢氏姊妹相识？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时道观与宫禁既有往来的机会，则在道观中互相认识，亦未可定；或者飞鸾轻凤二人和其他不得宠幸的妃嫔们，不甘岑寂，使人在外边招寻少年。如沈亚之《梦挽秦弄玉自记》中的秦王内史廖家，就是这类的纤头，又或者是出家公主所荐。

不过我可以断定义山之认识卢氏姊妹，是在混入宫中做醮祭的时候。

《玉山》“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此神仙才子系指永道士，上文已说过。但永道士虽神通广大，无故亦不能挈带平民入宫，则义山之入宫，必假充羽士。（义山曾在玉阳山学过道，一切关于道教的知识及羽士的身分，必甚纯熟。假充羽士，万无被人看破之理。）进去的动机，不过为看热闹，兼瞻望宫禁风光，别无其他分外的冀望。但进去之后，卢氏姊妹偶与攀谈，卢氏等是浙东人，义山少时也曾跟他父亲到过浙东——义山父名嗣，在浙东浙西镇上当幕府。义山在浙约六年。父卒，始奉丧侍母而归。见义山祭姊文及冯氏年谱——一提到乡土，两人自然越谈越相投，话也多了，情感便也慢慢生出来了。以后发生种种恋爱史，自然不算稀奇。

但在数十或数百羽士之中，卢氏何以独与义山攀谈呢？这或者是偶然的，天下偶然事正多，何足以此为怪。又或者因义山年青貌俊，有动卢氏等顾盼之处，也未可知。（假定建醮事是在开成元年，则义山彼时仅廿四岁，义山未尝以貌闻，但其诗颇足证明其容貌为俊秀，如“玉郎会此通仙籍”，《重过圣女祠》“娇郎痴苦云”，《房中曲》“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又《骄儿》诗“衮师我骄儿，秀美乃无匹，”以遗传律言，子如此秀美，父貌亦必不劣。总之义山即无叔宝之风神，潘安之美色，想也不至于像温飞卿、罗隐等那样的有才无貌。但义山入宫前经过道众的介绍为合理。

（八）杨贵妃

杨贵妃在我这篇文章里，本来没甚地位，不过义山诗中颇有涉及杨妃之处，而且后来的“清宫案”与杨妃亦有关系，不得不略为一论。

《唐书》不著文宗后妃传，前面已说过了。我在各皇子传及和杨妃有关的各人传里，零星的寻出一点材料，才知道杨妃的事迹，前面也说过了。今且言义山关于杨妃各诗。《唐书》言杨妃得宠谮死太子，可见杨妃在文宗前，的确是个红人儿。义山诗中所有咏柳各篇，都指杨妃，柳和杨本可通用。

《柳》诗说：“为有桥边拂面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后庭玉树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这是明明指杨妃得文宗之宠幸，如杨柳之占尽春光。

杨妃虽擅专房之宠，对于后宫妃嫔，仍然嫉妒。飞鸾轻凤二人，恐怕也是她的眼中钉，时时以拔去为快。义山既与鸾凤等交好，对于杨妃这种态度，颇不以为然。所以《赠柳》有“莫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对雪》有“莫入卢家妒玉堂”等句。《谑柳》之“玳梁谁道好，偏拟映卢家。”似指杨妃已得宠幸，还要挑剔鸾凤等的不是而言。

义山将“柳”影射“杨”字，那是很明显的。有时还将“雪”喻杨妃，想由谢道韞雪诗“莫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蜕化而来。

义山对于自己这种曲折的譬喻，也很赞自己的聪明。《漫成》云“不妨

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按何逊在《范广州宅》联句有“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等语——所指即是杨花。

杨妃虽然得宠，然而像也有个情人，《柳》诗云：“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解有相思否，应无不舞时。絮飞藏皓蝶，带弱露黄鹂。倾国宜通伴，谁来独赏眉？”

我们记得《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一诗中，当时入宫少年，有一个姓韩的，现在来看义山咏蝶的诗：《青陵台》：

“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蛺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干宝《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怨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蝴蝶”。此即韩蝶之出典也。但现在这个化蝶的韩凭，已不忠于故妻，却飞上别枝，和其他的女子恋爱了。

《蝶》：

“飞来绣户阴，穿过画楼深。重傅秦台粉，轻涂汉殿金。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为子夜吟。”《蝶》：

“孤蝶小徘徊，翩翩粉翅开，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

雪中还有蝴蝶吗？这个雪字恐怕是指杨妃。又《蝶》诗“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

《蜂》：

“小苑华池烂熳通，后门前槛思无穷。宓妃腰细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红壁寂寥崖蜜尽，碧檐迢递雾巢空。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

此处又好像拿蜂来比杨贤妃了。不然寻常咏一蜂，定要拉扯上“小苑华池”、“后门前槛”、“宓妃赵后”做什么呢？以杨贤妃为蜂，这也是要讨论的一个小问题。《长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杨封妃。毕沅抚陕时校《长安志》，疑志文有误，改封妃为贤妃。但我想杨妃在世时恐怕有“封”、“贤”两名号。“封”与“蜂”音同，或者封乃杨妃的名字，所以义山戏作此诗。

还有将“燕”比杨妃的诗：“卢家文杏好，试近莫愁飞。”“去应逢阿母，来莫害王孙。记取丹山凤，今为百鸟尊”等句，似猜杨妃害了庄恪太子之后，不要更害蒋王宗俭之意。“试近莫愁飞”则有劝她和鸾凤等联络的意思了。以燕比杨妃当由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而来，又过渡到“燕啄王孙”赵飞燕故事。

文宗崩后，仇士良立武宗，以杨贤妃曾请立安王溶，谮于武宗，赐妃与王死（见《唐书》安王溶杨嗣复等传）。这件事杨妃本是无辜的，所以义山忘从来之私憾，而一转为悲悼之情，《垂柳》诗：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朝佩皆垂地，仙衣尽带风。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肠断灵和殿，先皇玉座空！”（九）离别

义山于开成二年登第，旋举博学鸿词落第。三年赴泾原王茂元幕，旋婚于王氏。王茂元乃李党，义山以婿于王之故，为令狐党人所摈（？）《安定城楼》诗所谓“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即指此时事。

义山开成三年春，义山将赴泾原与宫嫔离别，有一首极重要的诗：

《拟意》：

“怅望逢张女，迟回送阿侯。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妙选茱萸帐，平居翡翠楼。云屏不取暖，月扇未遮羞。上掌真何有，倾城岂自由。楚妃交

荐枕，汉后共藏钩。夫向羊车觅，儿从凤穴求。书成祓禊帖，唱杀畔牢愁。夜杵鸣江练，春刀解若榴（一作石榴）。象床穿靶网，犀帖订窗油。仁寿遗明镜，陈仓拂彩毳。真防舞如意，佯盖卧箜篌。濯锦桃花水，溅裙杜若洲。鱼儿悬宝剑，燕子合金瓯。银箭催摇落，华筵惨去留。几时销薄怒，从此抱离忧。帆落啼猿峡，樽开画舸舟。急弦肠对断，剪蜡泪争流。璧马谁能带，金虫不复收。银河扑醉眼，珠串咽歌喉。去梦随川后，来风贮石邮。兰丛衔露重，榆荚点星稠。解珮无遗迹，凌波有旧游。曾来十九首，私谥咏牵牛。”

这首诗从“怅望”起，到“燕子合金瓯”句止，都是形容两人恋爱关系以及宫嫔的容貌、形态、儿子、起居……等项。到“银箭催摇落”以下，便是叙离别的情事，以及别后的相思。

“银箭耿寒漏，金缸凝夜光。彩鸾空自舞，别雁不相将。寄恨一尺素，含情双玉珰。会前犹月在，去后始宵长。往事经春物，前期托报章。永令虚粲枕，长不掩兰房。觉动迎猜影，疑来浪认香。鹤应闻露惊，蜂变为花忙。古有阳台梦，今多下蔡倡。何为薄冰雪，消瘦滞非乡。”（《夜思》）

还有《寓怀》五言排律一首，是想念女道士的诗。那首“新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栖”及《丹丘》二诗，也在这时候做的。

义山在泾原住了几个月，到三年冬，又回京。四年，释褐为秘书校书郎，和宫嫔更续前欢，那些《无题》“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的诗，都是这个时期做的。（十）清宫案

《唐书》本无所谓清宫案，这三个字是我根据义山诗意，杜撰出来的名词。

《旧唐书·庄恪太子传》：“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四海，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才宫人张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新唐书·庄恪太子传》“……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诏以陈王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儿缘橦，父畏其颠，环走橦下。帝感动，谓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儿乎？’因泣下。即取坊工刘楚才等数人，付京兆榜杀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毙永巷，皆短毁太子者……”

但是谗毁太子，杨贤妃之力居多。文宗感悟之后，不斥杨妃，只拿宫人们出气，我觉得有点奇怪。

照我的意思，文宗之杀乐官宫倡，一小半是为的他们会谮陷太子，一大半还是为了要正她们引诱外间少年，破坏宫庭法纪之罪，所以此案我名之为“清宫案”。

宫倡与乐官行动自由，互相恋爱，只算常事，像前面说的永新念奴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过他们自己恋爱也罢了，又代那班深居宫庭的宫人，介绍外人，一被发觉就不能说无罪了。义山也知道她们这样混闹下来，终有一天要得灾祸的，所以《宫妓》一诗曾说：“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这诗杨亿和他的朋友曾击节叹赏过，以为寓意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见杨文公《说苑》）。我初读义山这首诗，实不知道他的寓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读了令人感慨不已？杨亿的称赞，真有些令我莫名其妙。但近来我懂得义山诗中的恋爱事迹，再来读这首诗，“感慨”虽然未必，“击节”确乎要来一两下。因为他所用偃师的故事，寓意果然十分深妙。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献工人名偃师。偃师所造倡者，趣步俯仰，颔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伎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杀偃师。偃师大惧，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

义山的意思，即是说宫倡们私狎外间少年，“纸老虎”终有一天的戳破。《拟意》云：“真防舞如意。”《拾遗记》：“孙和悦邓夫人，尝着膝上。和月上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流污裤，娇姹弥苦。”义山用此典，盖亦畏惮唐文宗一朝发觉宫嫔罪状，“真防”二字，实有不胜其危惧之意。《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东有青龙西白虎，中含福星包世度。”

玉壶渭水笑清潭，凿天不到牵牛处。骐麟踢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秋娥点滴不成泪，十二玉楼无故钉。推烟唾月抛千里，十番红桐一行死。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

日暮向风牵短丝，血凝血散今谁是！”

冯浩以为这首诗乃悼刘从谏，其说太穿凿。谓为咏北齐事，又完全和史实不合。我以为这实是纪宫倡遭祸的一首诗。“十番红桐一行死”说得何等明白！

“青龙白虎”，言宫廷守护之人。“福星”、“包世度”似言有宫倡等之包庇，可以进去。“玉壶”二句言帝王虽自命明察秋毫，但无论怎样，总察不出宫人的秘密。“牵牛”前面已解释过好几回，“牵牛处”即宫中宫人幽会之处。“骐麟踢云天马狞”四句，指搜检时的情形。

“推烟唾月”，即推勘之谓。“蚕纸”似即宫人与外间通信时用的“密码。”

“日暮向风牵短丝”，言此十人都有赐缢之惨。

这一出王熙凤搜检大观园的悲剧表演之后，飞鸾轻凤两人也就卷入漩涡，因畏罪之故，双双投井而死。花残玉碎，煞是可怜！（二人所居处有井，屡见诗中。）

《景阳宫井双桐》：

“秋港菱花干，玉盘明月蚀。血渗两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经白门伴，不见丹山客。未待刻作人，愁多有魂魄。谁将玉盘与，不死翻相误。天更阔于江，孙枝觅郎主。昔妒邻宫槐，道类双眉敛。今日繁红樱，抛人占长簷。翠襦不禁绽，留泪啼天眼。寒灰劫尽问方知，石羊不去谁相绊！”当这件案子发作时，义山或者恰巧回到京里，（本传谓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谕使还官。当发愤辞官时，或曾回京一行。）听见清宫案甚急，知鸾凤等必将与难，所以勾留而不忍去。即所谓“血渗两枯心，情多去未得。”“白门”即金陵，亦即石头城之讹转，解见后。“徒经白门伴”一语文理未顺，疑“伴”字是“畔”之误。“丹山客”借言凤，所谓“记取丹山凤，今为百鸟尊。”也。此二句含卢轻凤三字。

“玉盘”是义山赠鸾凤等之纪念物，二人之及于祸，与这个“玉盘”大有关系，故有“谁将玉盘与，不死翻相误！”之句。后来《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也有“玉盘迸泪伤心数”的话，故我说这个玉盘不是随便做在诗中的。

“昔妒邻宫槐”四句，言昔日妒邻宫之美人，而今自己死了，让杨妃之独占春光，要妒也无从妒了。集中有《百果嘲樱桃》、《樱桃答》等诗，我疑其指杨妃，杨妃在义山诗本为“柳”，今喻之为“繁红樱”者，因为郑樱桃是古妃之名，见《十六国春秋》。《景阳井》：

“景阳宫井剧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流。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此言“西施”犹得埋于浊泥之中，而鸾凤二人乃以宫井为瘞骨之所，岂不可怜。

“五胜”见《秦始皇本纪》，推始终五德之传。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以为水德之始。又《汉书·律历志》：秦兼并天下，亦颇推五胜，自以获水德。“五胜”是水的代名词，言五胜埋香骨，则鸾凤二人死于水中无疑了。

当狱急时，义山爱莫能助，痛苦万分。那一首千古爱诵的《无题》，当即此时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一首真是在心颤魂飞，肠回气荡时，做出来的好诗，如说中国没有好哀情诗，便请他读义山这一首。还有“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无由见颜色，还是托微波！”也同时之作。（十一）追悼

鸾凤二人死后，义山悲悼异常，追悼之诗极多，逐一录之如《燕台四首》：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偏相识。暖蕙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愁将铁网 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魂。夹罗委篋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珎。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右春》）

这首诗可以分为五段；第一和第二两段，言鸾凤等死后欲觅其魂竟不可得。第三段言醒时残阳在地，睡眼惺忪，误以为初曙时之日光，而且此时精神亦恍惚未定，帘前犹若映有梦中人之影，而且闻其残语，但转瞬间神志清醒了，幻想也消灭了，才想到这一别是永久的离别，你如想再去寻她，即海阔天翻，还不能相遇呀！“衣带”句言相思之极，瘦尽腰围。我之穷冤酷恨，祈天而天不知，但能否借我天牢，将这不可寻觅的冤魂锁住，使我一见呢。这几句和铁网珊瑚句意同。“前阁雨帘愁不卷，后堂芳树阴阴见。石城景物类黄泉，夜半行郎空柘弹。绡扇唤风闾阖天，轻帏翠幕波渊旋。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化开木棉。桂宫留影光难取，嫣薰兰破轻轻语。直教银汉堕怀中，未遣星妃镇来去。浊水清波何异源？济河水清黄河浑。安得薄雾起湘裙，手接云车并呼太君！”（《右夏》）

这诗第一段说现在到曲江离宫去走走，珠帘不卷，芳树阴阴，前此风光，何等明媚，此时竟像黄泉一般的惨戚。“柘弹”，见文廷注《古史考》，柘树枝长而劲，鸟集之。将飞，柘起弹鸟……此言从前私会时在树枝下穿过来，曾使宿鸟惊飞。现在树枝依然，而夜半之行，已不可再得。《池边》：“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这也是一首回忆的诗，所写情景相类。第四段言文宗杀宫人，那知道杨贤妃也

是不干净的。你只说济河水清，黄河水浊，其实来源是一样的。杨妃无罪，则宫人亦不当杀，今宫人枉死，安得呼天而诉其冤呢！

“月浪冲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云屏不动掩孤*梗 髀*灰狗珞菁薄 S 晦*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但闻北斗声回环，不见长河水清浅。金鱼锁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堪悲小苑作长道，玉树未怜亡国人。瑶琴爸爸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双珣丁丁联尺素，内记湘川相识处。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右秋》）

第一段长夜相思，辗转不寐，而西楼偏风送箏声，箏乃所爱宫嫔善弹之乐器，今闻此声，能不惆怅？第二段言昔日相思之切，而相会极难。第三段言宫禁虽严，但外人可以从小苑进去，《药转》“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可证。“亡国人”指张孔两贵妃，陈后主曾作《玉树后庭花》之曲。此言昔由小苑达离宫，和飞鸾轻凤等相会，二人可爱之处比张孔两妃还要过之。第四段言空房寂寞，二嫔只有玩弄“锦瑟”以解相思，但霜华夜重，越罗单薄，鹦鹉闻瑟声惊啼，不免要回想从前与情人相晤时的快乐。“云梦”用宋玉《高唐赋序》，也就是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第五段记两人通信之事，鸾凤二人善于唱歌，将一世爱惜这美妙的歌唇，谁知两朵名花竟在我手中萎谢了呢！

“天东日出天西下，雌凤孤飞女龙寡。青溪白石不相望，堂中远甚苍梧野。冻壁霜华交隐起，芙蕖中断香心死。浪乘画舫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楚管蛮弦愁一概，空城舞罢腰支在。当时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姊妹。破鬟委堕凌朝烟，白玉燕钗黄金蝉。风车雨马不持去，蜡烛啼红怨天曙。”（《右冬》）

“天东日出天西下”，言敬宗驾崩，如太阳之西坠，文宗接著做皇帝，又像一颗新太阳从东方升起。但飞鸾轻凤竟成寡妇（与《圣女祠》“寡鹄”、“羈凰”句参看）。后虽为文宗收入后宫，可是不甚加以宠幸，如青溪神女与白石先生（见《列仙传》）之不相聚合，名义上虽然有夫，实在还是和守寡时候一样。“堂中远甚苍梧野”，用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不能从的典故。言鸾凤虽侍文宗同居一堂，而漠不相关，其生活比之守寡时更为无聊，更为寂寞。何况又有杨贵妃像冷酷无情的冻壁霜华，从中作梗，使得卢氏姊妹对于文宗心灰意冷，不得不爱他人了。“浪乘画舫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指那些入道而不安寂寞的宫人，就是宋华阳。她原与鸾凤交好故常连带及之。“楚管”二句，言卢等歌舞之佳。“桃叶桃根”，表明卢氏等乃系姊妹。末一段言二嫔投井后，义髻委地，所佩玉钗金蝉皆未持去，徒留红烛，泪滴清宵。《楚宫》：

“湘波如泪色娥娥，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屈原投汨罗而死，卢氏姊妹亦死于水中，所以有彩丝长蛟的联想。

《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代应》：

“清水分流西复东，九秋霜月五更风。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

《相思》：

“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共羽仪。肠断秦台吹管客，日西春尽到来迟。”

这几首都是在曲江离宫外面所作。“鸾”、“凤”屡次点明。做皇帝的人三宫六苑，坐拥无数佳丽，但又不能一一加以爱宠，致使后宫多怨旷之声，不免有在外间招寻面首之事，一被发觉，立加诛杀，不但有违人道，而且焚煮鹤，也不免有杀风景之讥。义山痛愤极了，所以又有一首《蜀桐》：“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

（十二）义山之身世与恋爱的关系新旧《唐书》本传对于义山的身世，大略都作这样的话：李德裕和牛僧孺互相讎怨，令狐楚、李宗闵、杨嗣复等属牛党。义山初见赏于令狐楚，后又藉其子**之力，登进士第，但义山竟做了属于李党的王茂元的女婿，所以牛党的人，从此瞧不起义山。令狐**说他背恩，更加嫌恶他。

后来义山的丈人峰死了，到京候调，竟没个人肯照应他一下，义山只得跟随郑亚、卢宏正等混了几年。及令狐**登相位，义山屡以诗文干请，才补他一个太学博士。柳仲郢镇东蜀，义山跟了他去。郢废罢。义山归郑州，不久便患病死了。

本传在时间和地点的种种错误，冯氏已加以修正，不必更述。单就义山身世来说，千古以来，没有一个不承认义山就婚王氏，为他一生运命通塞之大关键的。

但是《唐书》的话这样可信吗？我以为未必。

（一）我们要知道唐朝牛李两党，倾轧虽然激烈，但都不出权利问题，并没有什么深讎宿憾。权利冲突了，便攻击起来，权利平均了，便可以妥协起来。看战国时的诸侯，今日干戈，明日玉帛，现在的军阀朝换兰谱，暮成寇仇，战场上尚且如此翻覆，何况朝庭之上呢？就说大首领有点私怨，那手下的羽党也拚著命互相寻仇，就不免远于事实了。让我们在《唐书》里寻出几个例来证实这话罢。

（a）令狐楚属牛党，但曾进用李党皇甫镈、萧俛等。（b）李德裕曾使柳仲郢为京兆尹，柳仲郢是牛僧孺的朋友。

（c）卢宏正属牛党，但曾受李德裕之推荐。

柳仲郢、卢宏正都是大人物，尚且跨党。义山那时的名位，够得上李宗闵、杨嗣复等的注意吗？

（二）本传说义山就婚王氏后，令狐**便恶他背恩了。但考义山就婚王氏系在开成三年（大约系在夏间，《漫成》“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可证），但以后文字涉及令狐家者颇多。义山既以就婚王氏为**所薄，这些笔墨的事，又借重他做什么呢？请看下面各文。

开成三年（公元八三八）有《奠相国令狐公》文开成五年（公元八四〇）有《酬别令狐补阙》诗（**于二年为左补阙）

会昌元年（公元八四一）有《赠子直花下》诗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有《寄令狐郎中》诗（**是年为右司郎中）

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有《酬令狐郎中见寄》诗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有《梦令狐学士》及《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于大中二年知诰制翰林学士，三年为中书舍人）。

此外又有《子直晋昌李花》、《宿晋昌亭闻惊禽》、《晋昌晚归马上赠》

(晋昌乃令狐**之府第)。

根据这些诗，我们知道义山结婚王茂元家后，和令狐**常相酬唱，义山还常住在令狐家里，两人交情并没有决裂。那一首“郎君官贵行施马，东阁无由得再窥”的诗，虽被《北梦琐言》造了一个故事，却不十分可信。

令狐**做了宰相之后，虽没有提拔义山，但义山在令狐之门不过是一个文士，并无生死交情。宰相堂前，依草附木之人，何可限量，义山也不过其中的一个罢了。偶然忘记提拔他，算得什么大事，义山也不见得从此便怨令狐。照《唐书》的意思，令狐**做了宰相，非提拔义山至节度使不可，然则严武和杜子美也是两代交情，为什么也没有大好处给他呢。

我看义山之就婚王氏，令狐**或者有点不高兴，但不会永远怀恨的——因为义山实无使他永远怀恨的资格。

义山之不遇，一半乃他命运使然，一半也和他的恋爱有点关系。

当时宫闱不肃，朝野都知，不过事关皇家名誉，没有人敢来多话罢了，义山和女道士宫嫔等恋爱，每忍不住栩栩自得，形之篇章，虽然用的隐语，别人岂有猜不着的，这件事传到秉政者的耳朵里，便不免真的要恶他“诡薄无行”了。义山试博学鸿词之落第，我怕就是因恋爱事被人排斥的结果。义山《有感》：“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东阿王》：“国事分明属灌均，西陵魂断夜来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还有《漫成》：“沈约怜何逊，延年毁谢庄。”《寄温飞卿》：“昔叹谗销骨”等句。就婚王氏非暧昧之事，何谗毁之可言？《东阿王》以曹植自比，而且自己也已承认博学鸿词之落第，是和他的恋爱有关系。“为天子”三字故实系活用，不可拘泥。

但他有时也爽性作快意语道：我和宫嫔恋爱，极人间之奇遇，“岂能抛断梦，听鼓事朝珂”吗？

有时候恼恨不过，只得骂那些排斥他的人为妒忌，“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这俨然和现代人骂提倡礼教的老先生为犯色情狂一样的口气了。

义山和宫嫔的一场恋爱，不但影响他的前途，而且还影响他的年寿。

大约自二人惨死之后，义山无时无刻不悲悼，逢著美景良辰，则怅触当时欢爱，见一花一草也要寓意兴悲，竟因此郁郁成病而死，可谓为千古情种了。

义山与宫嫔相会之时期，都在春秋佳日，所以在这两季中节期，也教他的回忆特为深切。“二月二日”是一种节期（《文昌杂录》：唐时节物，二月二日，迎富贵果子），宫嫔都到曲江，后来义山随柳仲郢在蜀，有《二月二日》一首。所谓“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虽写本地风光，却有他自己的寓意。

七夕拜月乞巧，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创造出来的节期，故唐时极盛行。义山想曾于七夕之夜，到曲江离宫一次，《曼倩辞》：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间。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

义山每以东方朔自比，此回或者由隔苑偷看杨贵妃。“阿环”是杨贵妃小字，借此影射。自此以后每逢七夕必有一诗。在甘肃时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帷。章台街里芳菲伴，且问宫腰

损几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作今朝粉态新。”

“下苑”即曲江。“水亭”指离宫，即采霞亭之类。《汉武内传》帝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章台伴”乃是杨柳，指杨贤妃。飞鸾轻凤二人死于开成四年冬间，《旧唐书》文宗召宫倡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此太子指陈王成美。陈王立于四年十月。故知清宫案发于十月之后。）次年正月文宗驾崩，杨贤妃等亦遇害。所以义山连带说起她来。

《独居有怀》：

“麝重愁风逼，罗疏畏月侵。怨魂迷恐断，娇喘细应沉。数急芙蓉带，频抽翡翠簪。柔情原不远，遥妒已先深。”“浦冷鸳鸯去，园空蛱蝶寻。蜡花长递泪，筝柱镇移心。觅使嵩云暮，回头灞岸阴。只闻凉叶院，露井近寒砧。”

诗中又提“麝”、“罗”、“蛱蝶”、“井”等字。

荷花是曲江重要景物之一。故义山一见荷花，便引他无穷的悲怆。

《赠荷花》：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过伊仆射旧宅》：“……幽泪欲干残菊露，余香犹入败荷风。”

何能更涉泂江去，独立寒沙吊楚宫”。《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一是开成五年，重游江乡时作，一是会昌元年江乡还京时作。

又《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在四川时义山已悼亡，兼痛惜宫嫔，心绪更为不顺，只好纵酒自遣。《春深脱衣》：“日烈忧花甚，风长奈柳何。陈遵容易学，身世醉时多。”

拚酒太甚，身体渐渐虚弱，竟为病魔所侵了。有《属疾》及《有怀在蒙飞卿》，“薄宦频移疾”等句。《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因忧武昌柳，遂忆洛阳花……”《梓州罢吟寄同舍》：“……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聊。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暗说病由悼念宫嫔而起。

回到郑州，不久病卒，年仅四十有五。（根据《冯谱》）（十三）锦瑟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义山集中《锦瑟》一诗，历来无人能解，所以聚讼纷纷，莫衷一是。有些人说锦瑟是当时贵人爱姬之名。（刘贡文《中山诗话》）因此便有人疑锦瑟为令狐家青衣。有些人说是赋瑟。（靖康《湘素杂志》借黄山谷与苏东坡的问答。）有人说是悼亡。正是这种解释，总难教人满意，故元遗山《论诗绝句》，还在那里喊著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王渔洋也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叹。

近人孟心史先生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李义山锦瑟诗的考证》证明这诗是义山为悼亡而作。我在未读义山诗之前，颇震惊孟先生征引之博，和考证之精，不过近来于义山诗集下过一番研究的功夫，对于孟先生的说法，就不能不怀疑了。

孟先生考证有这样一点：《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为二十五弦。瑟为二十五弦，但古传为五十弦所破，合两二十五，成古瑟弦数。

义山婚王氏时年二十五，意其妇年正同，夫妇各二十五，适合古瑟弦之数。因恒以锦瑟为嘉偶之纪念。

孟先生引了许多书籍，证明义山结婚时为二十五岁，就算对吧（义山开成三年婚于王氏时年二十六），但其妇婚时是否确系二十五岁，竟无可证，对于“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一句诗，算只解释出了半句。

这样洋洋万言的考证，只考出《锦瑟》诗的半句，能教我们相信他说的悼亡是对的吗？

何况义山诗集中关于五十弦瑟，不仅《锦瑟》诗，像那“雨打湘灵五十弦”；“遂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及“锦瑟长于人”、“锦瑟惊弦破梦频”，如说“五十弦”及《锦瑟》诗是悼亡，那么这些诗也都是悼亡了。

我说锦瑟果然是义山爱情纪念之物，《锦瑟》一诗也果然是悼亡之诗，不过所纪念所追悼的，乃是他所恋爱的宫嫔，和他自己的妻子毫无干涉。

我以为《锦瑟》诗应当这样解释：湘灵素女二人皆古妃，善于鼓瑟，义山所爱宫嫔亦善音律，曾以乐器相赠，故义山以锦瑟制题为诗。“五十弦”不过表明妃嫔所用之瑟，与义山夫妇年龄无关。

“庄生晓梦迷蝴蝶”，用庄子“不知庄周之为蝴蝶？蝴蝶之为庄周？”言昔日和宫嫔恋爱之快乐，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有如做梦一般，几乎不敢自信真有此种奇遇。故用“迷”字形容。如说悼亡，则当用鼓盆典才是。

“望帝春心托杜鹃”谓宫嫔冤死，魂当化为啼血之杜鹃，以诉不平。《燕台》诗中之“蜀魂寂寞有伴未？”《哀筝》诗中之“湘波无限泪，蜀魄有馀冤”，可以参看。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指义山赠宫嫔作为纪念品之玉盘而言。按《述异记》：“鲛人水居如鱼，不废机织，泣则皆成珠。”左思《吴都赋》注：“鲛人临去从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满盘以与主人。”义山的《碧瓦》诗有“珠啼冷易销”，更证以“谁将玉盘与，不死翻相误！”及“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二句，鲛人泣珠满盘影射“盘”字，次句用“蓝田种玉”点明“玉”字。二句含“盘”、“玉”二字，因为诗之韵律所拘，只有采用倒装。可以知道义山受宫人赠与锦瑟后，曾报以玉盘。清宫案发时，这个玉盘也被检去，二人恐推勘时供出义山，误他性命，因而投井以死，用以灭口。

玉盘和锦瑟都是义山恋爱史中极重要的关键，故都做在诗中。

末两句收足追悼之意。

我的《锦瑟》诗解释完了，读者若还不信，我可以更寻出几个证据，证明这首诗为追悼宫嫔而作。

要证明锦瑟为宫嫔所赠义山之乐器，须先要证明宫嫔是否善歌舞音律？飞鸾轻凤二人善歌舞，《杜阳杂编》已说过了。义山有《闻歌》一诗：“敛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动碧嵯峨。铜台罢望归何处，玉辇忘归事几多。青冢路边南雁尽，细腰宫里北人过。此声肠断非今日，香奁灯残奈尔何！”

又“歌从雍门学”（《碧瓦》），“珠串咽歌喉”（《拟意》），“歌唇一世衔雨看”（《燕台》），都足证明所爱宫嫔之善歌。“便是孤鸾舞罢时”（《破镜》），“空城舞罢腰支在”（《燕台》），“回雪舞腰轻”（《歌舞》），都足证明所爱宫

嫔之善舞。

《无题》：“八岁偷用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箏，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此诗亦为鸾凤二人作，“十二学弹箏，银甲不曾卸”，足知二人出身乐籍。末两句似言敬宗崩时，二人只有十四五岁，此外则《拟意》“佯盖卧箏篴”，《代应》“独映钿箏篴”，都可以证明所爱宫嫔善于弦索。

我们再看《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箏妓二十韵》：“冰雾怨何穷，秦丝娇未已。寒空烟霞高，白日一万里。碧嶂愁不行，浓翠遥相倚。茜裙捧琼姿，皎日丹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风吹白芷。回首苍梧深，女萝闭山鬼。荒郊白麟断，别浦晴霞委。长鞍压河心，白道联地尾。

秦人昔富家，绿窗闻妙旨。鸿惊雁背飞，象床殊故里。遂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徵。斗粟配新声，娉姝徒纤指。风流大堤上，怅望白门里。蠹粉实雌弦，灯光冷如水。羌管促蛮丝，从醉吴宫耳。满内不扫眉，君王对西子。初花惨朝露，冷臂凄愁髓。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

玉砌衔红兰，妆窗结碧绮。九门十二关，清晨禁桃李。”

这首诗不过是借题发挥，因箏妓而想到所恋爱的宫嫔，便将所有情史，背诵一遍。“白门”与“径从白门伴，不见丹山客”，及“白门寥落意多违”相通。无非应用卢莫愁典故。

此想系在开成三年赴泾原后作。彼时飞鸾轻凤尚未死，不过已返宫中，故有“九门十二关，清晨禁桃李”之句。义山将桃李喻卢氏姊妹，亦不止这里两句，《判春》之“一桃复一李，井上占年芳。”《嘲桃》、《赋得桃李无言》，都是他想出来的妙喻。

这诗里有一段，将文宗嘲骂得很利害。“鸿惊雁背飞”，说敬宗与文宗本是兄弟，敬宗中道摧折，如雁行之分飞，尚无不可，“象床殊故里”，将文宗比为傲象的“二嫂其治朕栖”就未免太过了。“斗粟”出《汉书·淮南王传》，亦谓兄弟二人之不相容。鸾凤本系姊妹，此言娉姝者，姊妹同嫁一夫，则成为娉姝也。二嫔本善弦索，惟既不能弹给文宗听，则弦索间亦生蠹粉，而文宗所乐听者乃杨妃之羌管蛮丝耳。“满内不扫眉，君王对西子”言满宫嫔御皆懒扫蛾眉，无意妆饰，惟文宗一人独对杨妃。“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连钱”为马。言情人临我上马，为歌一曲。此别等于死亡。即指赴泾原王茂元之幕。义山对于文宗的糊涂，讽刺最为刻毒，什么“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家。”什么“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闺情》）还有《屏风》诗的“掩灯遮露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措词极妙，恐怕也在嘲笑这个几为绿头巾压死而还睡在鼓里的皇帝！

话说得离题了。再来讨论这锦瑟的问题罢。

宫嫔赠给义山的纪念品，我们不必呆板地断定为瑟，不过是一种有弦索的乐器，说是琴可以，说是箏以及箏篴都可以，义山为诗中韵律所拘，故不得不改几种花样，但为我们行文方便起见，只好名它为锦瑟了，但总以“瑟”为宜。

义山与锦瑟关系独深者，因从前曲江幽会时，曾借此为暗号，后义山赴王茂元幕，宫嫔赠此以为别后之纪念。“箏柱镇移心”，不是已将缘故说明了吗？

二人亡后，义山将她们所赠之纪念品，置于房中，时常摩抚，以寄那永远的悲哀。“哀箏不出门”（《哀箏》），“锦瑟傍朱栊”（《寓目》），“归来已

不见，锦瑟长于人”（《房中曲》），可见他和锦瑟竟不可相离。

总之义山一生恋爱史虽有女道士和宫嫔二种人物，但女道士旋即负心，后虽重聚，对他仍甚冷淡。故义山也不甚眷恋，只有和宫嫔的一段爱情，真是非比寻常。请看他们的遇合是那样的离奇，聚散是那样的不常，情节是那样的顽艳，结局是那样的悲惨，可为千古以来文人中罕有的奇遇，情史中第一的悲剧，怎样能教他舍得不记述出来吗？但为了种种阻碍之故，只好隐约地，曲折地，将他们的一番情史，做在灯谜似的诗里，教后人自己去猜，又恐后人打不开这严密奇怪的箱子，辜负了他一片苦心，所以又特制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便是《锦瑟》诗。

何义门说玉溪以《锦瑟》诗自题其集以开卷（见《柳南随笔》），可见我们的诗人，已经亲手将钥匙摆在箱面上了！义山还有“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作》），这十个大字，是义山一生的缩影，也是他全集的定评。

后人也似乎有点明白《锦瑟》诗的重要，所以大家都将这首诗当作聚讼的焦点，都将这首诗代表义山的全集，都想由这首诗解决全集的诗，可惜他们对于钥匙的本身问题，先闹不清楚，也就没法去追寻箱中的宝藏了。

因为这个缘故，义山一生的奇情艳遇，竟埋没了一千余年！

我的第一本书

个人忝为文人，其实兴趣偏于学术，所以我写作的第一本书是学术性的。这本书民国十七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名是《李商隐恋爱事迹考》，抗战末期，改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便由我自己改书名为《玉溪诗谜》。

本书内容是研究李义山与女道士、宫嫔的恋爱史。义山诗镂金错采，璆丽精严，是一种最高级的唯美文学，而其内容则晦涩隐僻，难以索解，千数百年来笺注其诗者多逾过江鲫，始终不能得其真正意旨，我的这种说法，却是由无意间得来，也可说是一种幸运。

民国十六年间，我在苏州景海女师当中文系主任，同时在对面的东吴大学兼几小时的功课，教的是《古文选读》和《旧诗选读》之类，课本是东吴原编的讲义，仅有原文，并无注解，注解要靠教者自己去搜罗。我虽凭自修之力，读过一些名家诗集，也仅限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放翁。李贺的诗我也喜欢，对李商隐则从未问津，为的是他诗辞藻虽美，却不知其所说是些什么，自然教我兴趣缺缺。那个东吴诗选选了义山的《圣女祠》、《重过圣女祠》及《碧城三首》。记得梁任公曾说：“李商隐的《碧城》和《圣女祠》诸诗，讲的是什么，我理会不著，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著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著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这种文学，便不容轻轻抹煞。”我想也何妨抱著任公的态度来读李诗呢？

但原文的注解既须教者自去搜罗，我便从东大图书馆借得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和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来抄撮两首《圣女祠》的典故。朱氏书虽引了典故的出处，并未言其意义；冯氏则指为象征，说是义山巴望令狐**奥援的话，我觉得他牵强附会，不足采信。想还不如就原诗所用典探寻其本事为佳。这样一来，便触动我的灵感，新的见解便生出来了。

这两首《圣女祠》皆言仙事及仙人，仙人分男女两方面，而皆属于人仙非天仙。我知道天仙不同人仙，更不同凡人，天仙是住于天上或仙境，不假修炼，生而即仙的，如天朝列圣及西王母、上元夫人等。人仙则生于尘世，

得天仙汲引始成。而义山诗中之仙则皆生于人间世，甚至为凡人。他若专咏天仙，则他是在做游仙诗，与郭景纯诗等量齐观即可，无须寻绎其意义，今则不是。圣女祠指女道观无疑，唐代女道士行为多浪漫，我已久知，我们现在且来看诗中所叙男女事吧。先说女方：像《重过圣女祠》有“萼绿华来无定所？杜香兰去未移时”二句，注萼绿华自言南山人，未知其何南山？我想其实当是终南山，乃唐代首都长安东部大山，颇多隐士及修真之羽士。萼华曾悦男子羊权，一月中凡六过其家，赠权以珍玩及不死药，后相偕仙去。杜香兰家于青草湖畔，某年水涨，举家溺死，香兰时年三岁，为一渔翁所救，又云系西王母所救，长养之于昆仑山，后降男子张硕，与为夫妇，成婚后即去，久又来，与硕亦皆仙去。则这两位女仙皆为人间世的人物。

再说男的方面。《圣女祠》有两句：“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宁无刘武威”。注崔罗什乃魏时清河人，被征赴都，忽于朱门中睹一女子，自称乃刘府君妻，吴质（建安文士之一，文帝有《与吴质书》，论建安文学）女，与崔叙寒温，甚有相慕意，赠崔以指上玉环，崔则报以玳瑁簪，女约十年后再见。崔辞出，回顾乃一大冢。十年后，崔方在园中食杏，忽报女来，食杏未尽而卒。武威将军刘尚，名见《后汉书》，并无何故事。《神仙感应传》又有武林太守冠军将军刘子南，仅言子南受仙人务成子萤火丸，能辟兵，有一次临阵，四面矢下如雨，皆不伤他分毫，也不涉男女爱情事。但刘梦得《销失婢榜》，有“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张公子是汉成帝冒充与赵飞燕相欢。汉代民谣：“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即咏其事。刘武威不知何人，观梦得诗似系风流成性，惯于拐带人家妇女者。其事今失传，义山时当尚盛。

《重过圣女祠》结尾又有二句：“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仙家品秩，高者为道君、真人；小辈则为“御史”、“玉郎”。李义山曾在玉屋山学过道，仙籍即道籍；天阶喻王屋，言为升天之阶台；紫芝指修仙的结果。则“玉郎”当是义山自指，或是一种双关语，一面自谦在道籍中资格甚浅，一面自夸年轻貌美，皎然如玉树临风，惹人怜爱。

诗中两个女仙皆人仙，三个男性则皆凡人，而男与女皆有爱恋之事，则所叙必系女道士逾越清规，与人私通的情节，诗又把诗人自己也写了进去，则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是不成问题的了。

解释过这两首《圣女祠》，再来读《碧城三首》。这三首诗珠辉玉映，美的沁人心脾，无辞可赞，而内容之晦涩隐僻也与义山《锦瑟》相等。千古以来，聚讼纷纷，竟无一人能知厥旨。我解过《圣女祠》后，再来读此诗，竟迎刃而解了。原来这三首《碧城》并不难懂，第一首系叙女道士生活之奢华与居处之壮丽，第二首叙自己与女道士失和，第三首叙失和原因，是女道士怪他言语不慎，他引《汉武内传》自加辩护。我又发现义山所恋女道士姓宋名华阳，有姊妹共三人，皆在同一道观内修道。其姊妹原来爱永道士，华阳与他失和后，也倒向永道士那边去了。

在几首《圣女祠》及《碧城三首》，所叙道观建筑之宏丽，带著宫殿色彩，女道士服御之奢侈也极贵族化，似此种道观非普通道观，女道士也非平民性的女道士。诗中“沦谪千年别帝宸”及“寄语钗头双白燕，每期珠馆几时归”所用乃汉宫典故，知宋华阳等乃宫女之入道者。圣女祠并无其地，不过华阳等所居道观的代称。唐代公主多入道，这类道观当是入道公主的栖止处。公主入道，当然要带些宫女一同出家，以便侍奉。

我获得这些发现后，上课时便对学生宣称，学生疑信参半。张君鹤群首先赞同我说，经过几回讨论，他写了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发表于东吴廿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已见我正编自序文，不赘。

向来不爱李义山诗，视之为畏途的我，竟因东大《旧诗选》而获这种发现，实出意外，所以我称之为幸运。同时我对义山诗也引起很大的兴味。正课虽已讲毕，我仍抱著朱、冯笺注不放，又发现义山集中除与女道士相恋诗外，尚有许多恋情诗，分量更重。其恋爱对象似为宫廷中的妃嫔，我将这话于上课时对学生提起，学生个个摇头，便是张鹤群也反对，他们都说专制时代帝王何等尊崇，禁御何等严密，那容外人擅入？这是绝不可能的，我的话未免太无稽吧！我也不管他，借了许多书供佐参考，尽自钻研下去，又发现许多事实，即李义山所爱宫嫔，一名飞鸾，一名轻凤，是一对姊妹花，由浙东当局贡献给敬宗为舞女，敬宗遇刺崩，其弟文宗即位，收兄所遗嫔御于后宫，轻凤且为文宗诞一子，就是蒋王宗俭。

唐代宫闱本来不肃，而内廷关防则尚严密，义山之得入宫，系冒充羽士参与王德妃的醮祭，与鸾凤姊妹相识（事前当已经过介绍），其真正幽会处则在曲江避暑离宫，但潜行出入的次数也有限。义山许多最美丽最精彩的《无题》均作于此时。

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文宗为追理毁谤皇太子案，杀伶官宫女多名，其实一半是为了借此肃清宫禁，故可名之为“清宫案”，鸾凤二嫔久为杨贤妃所嫉忌，又因义山赠与的玉盘被检去，惧罪双双投井而死。义山悲悼终身，其以四十五岁之盛年即郁郁而逝，当与这一件重大精神打击有关。

我费了半年研究工夫即写成《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七万字，由张鹤群君带去上海，交北新书局印行，书出呈一册于那时正在上海开真美善书店的东亚病夫（曾孟朴先生）请求指教，蒙病夫先生大加赞誉而反对论调也有数篇于报端出现。因撰者多用笔名，我不知其为谁何。或者原是无名之辈，一派仍是旧时代宫禁森严，绝不容有此等事的老调；一派则谓李义山诗以隐僻晦涩为其特色，一千数百年来，笺注家林林总总，解释文字不下百十万言，从未得其要旨，你苏某何人竟自以为已于万丈深渊之下，探得骊珠，岂非狂妄？我自揣资望太浅，未敢作答，况学问之事，见仁见智，本难强其尽同，辩又何益？人家高兴爱怎么说，就由他们说去好了。此书改题为《玉溪诗谜》，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后，正值抗战末期，我们同日本人正打得火辣辣地难解难分，谁还注意这种小小学术问题，想此书必无销路。民国四一年，我自海外回到台湾，携我所著的《唐诗概论》及《玉谜》赴商务请求再版。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本有四五本书在该馆发行，而以《玉谜》销得最好。他书每年仅销一、二本或并无交易，而《玉谜》则十几本或二十几本，每年可得版税一、二百元。

我一生只出过三四十种书，大半以很低廉的代价售去版权，小半仅收版税一、二次，即无嗣音，书亦永远为书店所有，再也收不回来。尤其我自负颇有学术价值的《屈赋新探》，其中出版费皆由人资助，仅有《天问正简》自己以辛劳的教书薪俸和卖文所得数万元印行。

除托朋友代销者外，寄书店数年，半本也卖不出，书店倒闭，数百本书便消归乌有。看见别人著作动辄十几版或六七十版，只恨自己出世过早，这正所谓“老女蛾眉，不入时眼”，没话可说。于今我的《玉谜》每年可售十余本，可见尚有人爱看，版税虽微，细水长流，也颇足自慰。

我那本《玉谜》出版已将届一甲子，我自己并不看重，认为只是一件小玩意。不意这几年来探讨李义山诗者颇多，论文结集近九十万字，其中赞成我说少，反对者则多。有并不明言反对而各抒己见者，亦等于反对。于是我迫不得已而于玉谜正编外又有续编工作，那些文字逐期发表于《东方杂志》上，馆方答允将结集为《玉溪诗谜正续合编》，想不久即可面世。（下略）
选自《玉溪诗谜正续合编》

昆仑之谜引论

中国古代历史与地理，本皆朦胧混杂，如隐一团迷雾之中。昆仑者亦此迷雾中事物之一也。而昆仑问题，比之其他，尤不易董理。盖以其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甲乙互缠，中外交混，如空谷之传声，如明镜之互射，使人眩乱迷惑，莫知适从。故学者对此每有难于措手之感。而“海外别有昆仑”（晋郭璞语）；“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后魏酈道元语）；“昆仑无定所”（元金履祥语）；“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近代顾实先生语），种种叹息，腾于论坛。又有所谓大昆仑，小昆仑焉；东昆仑，西昆仑焉；广义之昆仑，狭义之昆仑焉。近代外国学者之讨论南洋民族及非洲黑人者，因中国古书有“古龙”及“昆仑奴”之说，遂亦堕入昆仑迷障，昆仑岂惟中国之大谜，亦世界之大谜哉！

考定昆仑在于阗者为汉武帝，然此事才一开始，便招致司马迁之怀疑。自汉至清，昆仑之所在屡易。今日情形又略改变，国人不言昆仑则已，言之则无不认为即坐落新疆西藏交界处之昆仑山脉。顾又安知此昆仑山脉者乃近代外国地理学家，附会中国旧说，自西藏高原各山中割取一段而强名之者耳，且山脉固非主山也。若问主山何在，则不知所答者，恐十人而九。笔者前以研究屈原《天问》，写有《天问里的旧约创世纪》一文，曾言昆仑在阿拉伯半岛西北大丛山中，昆仑所出白水等四水，即旧约创世纪伊甸园所流出之四水，亦即巴比伦、亚述等国建国处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诸河也。然此说过于新奇突兀，难以使人确信，故将历来有关于昆仑之档案，一概调来，作一详细之研究，其研究所得之内容，大约如下列各款：

- （一）昆仑一词何时始见中国载记？
- （二）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 （三）中国境内外之昆仑。
- （四）何者为神话昆仑？何者为实际昆仑？
- （五）昆仑与四河。
- （六）昆仑与中国。

兹将逐款加以推究，或可以阐明吾说，而释读者之疑。

一昆仑一词何时始见于中国载记

问昆仑一词果于何时开始见于我国古籍，则颇不易考定，盖我国最初文献，已无可征，而地底文化资料，则尚未完全发见。今日出土之甲骨铜器文字，其中似尚无昆仑字样。至于普通古书，则《夏书·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若《禹贡》果为大禹治平洪水以后，令其臣曰伯益者所作，则昆仑一词，夏初即见于中国文籍矣。但据历来学者考证，《禹贡》地理有秦汉以后之名。近代学者曾断定此文乃战国时产品。况本文昆仑一词，据郑玄注“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尚书正义》疏引）。又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同书）。孔颖达则谓渠与搜为二国，郑误一之。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故末以西戎总之云云（同书）。蒋廷锡云“西戎国盖附近昆仑山者，郑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用以为国号者也”（《皇清经解》，蒋相国《尚书地理今释》）。笔者按：清圣祖尝令人穷河源，初定巴颜喀喇山为昆仑，继定冈底斯。圣祖于其御批《通鉴纲目》云：“昆仑国名，昆仑山旁小国也；今西北别有昆仑都国，去中国甚远。”蒋氏《尚书地理今释》多采当时由实地调查得来之记录，故其注禹贡昆仑，亦曾采用巴颜喀喇山之说，其曰戎国盖附近昆仑山者云云，殆采取圣祖意见也。

近人卫聚贤先生谓织皮昆仑之昆仑即《左传》陆浑之戎（见《说文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吕思勉《西王母考附录》），丁山先生亦谓汉之乌孙、昆莫、即陆浑之音转，而陆浑即昆仑之音转，其说恐本之卫氏，而考证则更加精详（见《说文月刊》第四卷合订本，《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若此，则禹贡之昆仑，非地名，与本文主题无涉，此一份昆仑案卷惟有搁置一旁，本文以后虽偶涉及，亦不作主要论题。其次，则《尔雅》颇多昆仑字样：《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 伞！”《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者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

《释水》：“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

《禹贡》传为禹臣伯益作，故在中国学术界威权最高。《尔雅》亦相传为周公姬旦所作，故亦归入正统学派，而列为十三经之一，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然其书取之《楚辞》、《庄子》、《列子》、《穆天子传》、《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尸子》、《国语》之文者，不可悉数。盖战国时儒者所作。秦汉以来又有增益之材料。其昆仑各条，刺取《山海经》尤显然可见，故《尔雅》所言昆仑，只能与《山海经》所言者等量齐观而已。

其次，则有出于汲冢之三书，一为《逸周书》，二为《竹书纪年》，三为《穆天子传》。亦提及昆仑。《逸周书·王会解》：

“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鬲耳、贯胸、雕题、雕丘、漆齿。”此书虽相传为周时诰誓号令，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顾刘知几即讥其“时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史通》）。李焘亦谓其“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孔子亦未见。”（《汲冢周书序》）。陈振孙谓其“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依仿为之者”（《书录解题》）。其他怀疑之论，不可胜录。总之，此书所言文物制度，多同晚出

之周官，又杂以道家名法阴阳兵权谋之战国流行思想。即以《王会》一篇而论，周武王设朝之时，九夷十蛮，都来会聚，虽唐代“万国衣冠拜冕旒”无此盛况。此犹勉强可通也。乃至奇禽异兽，鬼怪妖魔，（如人面能言，状如黄狗之都郭生生，人身跋踵，食人之州靡费费，非鬼怪而何？）亦复济济一堂，则大远于情理。印度人描写帝王盛会，龙天八部，动辄数十万人，《王会》当受其影响而作。又《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敦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魔罗梵语，周代未翻，早有人指出，又战国伪书之一证矣。故即此一篇，便可断定其为战国时人所伪造。姚鼐《辨逸周书》谓其书过于怪诞，当“出之六艺，入之杂家”，宜哉。况其所云昆仑与贯胸、雕题、狗国、鬼亲相提并论，则亦如《禹贡》之国名或民族名耳。更不足与于昆仑问题之内矣。

《竹书纪年》：“十七年，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纪年》有古本今本两种。古本今已散佚，但古书引援其文，言昆仑王母者尚不止一条。如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史记·周本纪》裴驷集解引郭注文同。《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纪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卷七又引《纪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四库提要》于《纪年》之提要亦云“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人。’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云云，西王母与昆仑原有析不开之关系，言西王母即言昆仑也。然则《竹书纪年》之昆仑记载又增一条矣。

按《竹书纪年》古本凡十三篇，晋太康二年，盗发汲县魏安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蝌蚪书，《纪年》为其中一种。所纪事起自夏代，终于魏之安王二十年，盖为魏国之史书。其纪三代事则与经传颇异，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等等。正统学派颇认为荒诞，以野史视之。其书大约失于唐末五代之乱。明人抄合群书所援古本之文，又加以增益，且有沈约注解，是为今本。清人大辨其伪，如《四库提要》，如崔述《考古续说》、《竹书纪年辨伪》，论断精确，今本已无存立余地。朱右曾自酈道元《水经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所援《竹书纪年》文字，辑《汲冢纪年存真》二卷，王国维因其书，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所辑共四百二十八条，是为古本。

今本固不可信，古本则前人皆已认为战国时人所作。虽所根据者或有一部分真实史料，而关于昆仑及西王母，则无法证实其为周穆王时真实之记载，而为战国时盛传之神话。《穆天子传》专记穆王西征见西王母事，当然不能无昆仑字样。今皆录出如次：卷之一：“河宗又号之曰‘穆满，示女春山之宝，诏女昆仑口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赐女晦。’”

卷之二：“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衽口昆仑之丘。”

同卷：“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

同卷：“天子口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宝。”

同卷：“以三十口人于昆仑丘。”

卷之四：“自河首襄山川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

《穆天子传》不但言昆仑，言西王母，即与昆仑有关之河水、赤水、黑水、洋水、悬圃、群玉之山，亦无不有之。此书自古以来，皆以为伪，四

库且以入之小说类。然至近代乃大引学者注意，中外皆有人研究。顾实先生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数十万言，证明穆天子西见西王母皆为事实，穆天子游辙所至，且至欧洲。顾氏本地理学名家，其书萃半生精力为之，用力至劬，一切《穆传》研究中，当首屈一指。笔者于《穆传》尚未研求，见其文古字奇，穆王行程，亦历历可指，亦颇疑其系古代人一种西行实录，至升昆仑见西王母云云，则疑为战国人根据外国传入地理书如《山海经》之属所增饰者。穆王之西征动机，或亦为往见西王母。其游踪之远，则恐未必如顾实先生之所考。且得见西王母与否，则更未可知。盖笔者认西王母乃西亚最受崇拜之女神易士塔儿（Ish-tar）也，既为神矣，是乌得见？顾易士塔儿亦曾与巴比伦古代著名女王西美腊美斯（Semiramis）相混合，神虚而人实在，则又宜若可见焉。但此女王之时代为纪元前二千年左右，穆王之在位则为纪元前一〇〇一年至九四七年。时代相差千年之久，两人会晤，实无可能，则穆王见西王母，又羌无根据矣。或曰西亚女王以西美腊美斯名者固不止一人，庸讵知穆王所见者非一与穆王同时代之西美腊美斯耶？或里海一带国家之女王，钦慕西美腊美斯之为人，以其名自名，周穆王误以为西王母耶？且西亚人好以神灵名字与己私名混合为一名，其例数见不鲜。或者中亚一带国家有女王以金星神易士塔儿为己名。中国人固习知易士塔儿为西王母，则误以穆王所会晤者为真西王母矣。曰是亦非不可能之事，但皆须细考而后能定，今则宁从阙疑。

又次则为《山海经》。此书亦相传为禹臣益所作。然司马迁在汉初，即言“《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可见汉时人即不信为禹、益所作。书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秦汉以后郡邑之名，颜之推即曾以为疑。朱熹谓此书与《淮南子》乃附会屈原《天问》而作（见《楚辞辨证》）。胡应麟则谓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断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又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见《四部正讹》）。朱、胡固善读书，特亦一孔之见。惟《四库提要》议论为持平。其言曰“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诸暨下隼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事者又附益之欤？观楚辞《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辞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又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证，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小说之最古者尔。”笔者则断定此书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古两河人所作，而由战国时域外学者携之来中国者。中、东、南、西、北五山经所记为半岛西北阿美尼亚高原及其四境之诸山，海内外诸经则为黑海、里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内外之记载也。然已杂有不少神话。大荒诸经，则完全为神话地理。其中中国地理名词亦甚多，且形势间有与中国地理合者，则疑其曾与中国固有地理书混合，或当时译者以外国地名难译，遇中国地理之可附会者则附会之，真伪不分，中外糅杂，又加以秦汉人之附益，宜其难以探索。中国道教本出两河流域、印度混合之神话。则《道藏》收《山海经》，诚为适宜之举。

神话本与小说同源。《四库》谓为古小说而归之小说类，亦未为唐突，特此书并非完全神话耳。此书之《西山经》，《海内东经》、《西经》、《南经》、《北经》，《海外西、北经》，均有昆仑之记载，比前述诸书皆加详，实为昆

仑问题之总汇。因本文将大加援引，故此处从略。又有《禹本纪》与《山海经》相表里。《汉书·艺文志》有大禹三十七篇，疑即此书。王逸注《离骚》、郭璞注《山海经》，皆引其书，惜今已失传。

除此诸书以外，战国子书，亦颇有言及昆仑者。《庄子·大宗师》篇：“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司马注云：“堪坏神名，人面兽形，《淮南》作钦负。”《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吕氏春秋·至味》篇：“菜之美者，昆仑之蘋。”《列子·周穆王》篇，言穆王西征，宿昆仑之阿，观黄帝之宫，宾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云云，与《穆天子传》所言，情节相类。《列子》本非伪书，但亦不全真。此一段疑其剽窃《穆天子传》——不然，则《穆天子传》登昆仑，见王母诸情节，乃衍《列子》此文也。文学言昆仑者，首推屈原作品。

《天问》：“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离骚》：“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九歌·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九章·涉江》：“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最后为纬书《淮南》等。纬书虽汉人所辑，但其材料大部分为战国燕齐方士之所传。其中《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叙昆仑情况与《山海经》互有出入。《淮南》为刘安门客所编著，而此类门客固亦燕齐方士之苗裔。《淮南·地形训》之描写昆仑，文采瑰丽，记叙精详，比之《山海经》，已多渲染增饰之处。然其大体则离昆仑原来型式尚不甚远，非后来经过中国人夸大及受印度苏迷卢影响之《十洲记》、《西王母外传》、《拾遗记》等书比也。

昆仑名词，传入中国，固不知何时，而昆仑神话独盛于战国，则上述诸书可以为证。故吾人谓昆仑见于中国文字之记载，始于战国，谅不为大失（按泰山亦即昆仑，特不以昆仑名耳，见《自跋》之二）。

二 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汉武帝为我国历史上有名勤远略之帝王，亦迷信神仙最甚之帝王也。彼以欲断匈奴右臂之故，遣张骞使月氏。为匈奴所遮，而至大宛，遂得知河源形况。《史记·大宛列传》云：“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按《史记》集解：瓚曰，‘汉使采取将来持至汉。’张文虎校《史记》札记则云：‘采来二字，连上为句。采当为采色之采。来乃 之借字。《说文》：‘ ，琼玉也。《玉篇》：‘ 。玉属也。’采来谓采色之 其义比瓚说为长，今取之）。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武帝固为好神仙之君主，习闻昆仑为一大仙山。又习闻河出昆仑，闻骞言则大喜，以为由河源以索昆仑，则昆仑可得，仙人可睹，不死药可致矣。其后遣张骞使乌孙，必曾嘱其对此仙山，再切实探索。顾骞为诚恳之人，不善为谎语，觅昆仑不见，惟有据实回奏。司马迁：“今张骞之使大夏也，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可证也。武帝于心不甘，则另派他人往。所谓“汉使”必为其他使臣，而且不止一批。（《大宛列传》言：“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此类使臣之派遣虽为政治关系，顾亦必负有寻觅仙山之使命，渠等亦未觅得昆仑，惟报告于阗之山多玉，武帝谅以屡求此山不得，无以解嘲于廷臣，遂根据古图书所言昆仑条件，而指于阗之某山为昆仑。

然昆仑之最大条件为仙山，于阗之山，果如是乎？故司马迁于其《大宛列传》中，以冷笑的口吻言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后代学者于史公此种抗议，置诸不论，盖中国人于武帝所定昆仑，确在何地，实无所知，当然不能为左右袒也。然近代地理学者如顾实先生，则认定昆仑系今日后藏新疆交界处之昆仑山脉。穆王西征时，曾登此山，谓“司马迁腐刑之余，阳气消沮，信口开河，言不由衷，将上古累代相传之信史，付之一笔抹煞。”又谓“秦始皇之焚书为野蛮。司马迁造疑古之谣为野陋，厥罪维均”云云（《穆传讲疏》三页）。而张星 YR 先生亦谓：“迁以腐刑之余，对于汉武帝之措施，无处不表示其愤慨，因愤慨而讥刺，因讥刺而颠倒黑白……百家竞言黄帝登昆仑，稽《穆天子传》纪程，昆仑当在于阗，毫无疑问。故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武帝当时必与朝中博古之臣，共相考证，而后有此定案。惟未与司马迁议及耳。迁于《大宛传》后讥之……然则世间竟无昆仑欤？三代之书，悉为虚构伪作欤？武帝朝中群臣，悉为指鹿为马之徒欤？迁之颠倒是非，固有由矣”云云（《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六页）。迁以良史之才，于汉代诸帝之行实，一皆秉之直笔，竟被目为“谤书”，今又以反对武帝钦定昆仑一案，蒙“造谣”与“颠倒是非”之罪，甚矣良史之难为也！迁为汉初人，彼时伪史与神话根基初立，尚未为学术界所完全接受，一般学者犹有辨别是非之能力；而迁又为一富于学术良心之史家，不能因附和帝王意见，而改变其学术之立场。顾当时流行之政治势力，亦非其个人力量所能挽回，惟有在自己著作中，保留一小小抗议，以便后代之评判耳。谓其反对昆仑，乃由挟怀武帝私憾而起，则小乎其视迁矣。

然则武帝方面完全错误耶？曰：错误则诚错误，然于情于理，则皆大有可原。今使司马迁与武帝讼于法庭，则法官亦必难判其孰非孰是。盖司马迁所争者《禹本纪》所言之仙山也。今武帝所定于阗某山之昆仑，果高二千五百里欤？其上果有醴泉瑶池欤？果有《山海经》所言珠玉之树，凤鸾之鸟，九头之开明兽，虎身人面，虎文鸟翼之英招神及陆吾神欤？其下果有弱水之渊，炎火之山欤？其附近果有玉山为西王母所居者欤？曰张骞自言未睹，其他汉使亦未闻有所捏报，而武帝遽以西域一座凄寒萧索，一无所有之荒岭，硬指为楼阁万里，五云缥缈之仙山，其为司马迁所窃笑宜矣。然武帝所据者古图书也。古图书所言昆仑固有三大条件合于于阗山之情况。一曰“在西北”、二曰“多玉石”、三曰“河源之所出。”

今请言第一条条件。《禹贡》之“织皮昆仑，西戎即叙”，《逸周书》之“正西昆仑”，今日知为国名或种族名，与昆仑之山无涉，然武帝时代，恐尚不能辨别，见西戎与正西字样，则据以为定昆仑之方位之一条件。《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大荒西经》第十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之丘。”于阗亦有沙漠，且其西固有西海（即里海），则昆仑之在西北又得一证矣。且《穆天子传》穆王往见西王母，系向西进发。屈原《离骚》，貳道昆仑，亦言向西。其他如《禹本纪》及《淮南子》各纬书所根据由战国传下之昆仑传说，谅必一律言昆仑在西北。今张騫所通西域之于阗在中国之西，谓昆仑在彼中，又焉得为过？

今请论第二条条件。《西山经》第三“又西北（不周山西北）四百二十里曰臽山……丹水出焉。注流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飧。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黄帝乃取臽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飧，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又西（钟山以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彊幼水。……多藏琅玕平鹇瘳滴一壑 狡裕 楊(17)兴局 ……其中多玉。”自此而西南为昆仑丘，又西为乐游之山，多白玉。又西为羸母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又西为玉山，西王母之所居也。又西则符阳之山，槐山、天山、彊幼山、翼望之山，无不金多玉。然《山海经》所有之山，产玉者固居多数，而如昆仑一带，玉量尤丰。《尔雅》曾言璆琳琅为昆仑之美产。《穆天子传》则言钓于珠泽，得玉荣枝斯之英。攻玉于群玉之山，载玉万只而去。今于阗叶尔羌境内，所产玉量之富，甲于天下。于阗诸河皆以玉名，米尔岱山之五色玉有重至万斤者。此可考《新疆纪略》、《西域水道记》诸书而知之者。则与古图书所言昆仑之第二条条件又无不吻合。

今更请言河源，此为考定昆仑之最要条件。最先报告河源出于于阗者为张騫，已见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则有更详之叙述，其言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云。”

传所言南北两山，北山即今天山山脉，南山则今昆仑山脉也。中央之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之地，则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也。流于盆地中央之大河则塔里木河也。河有两源（实有四源），出葱岭者所谓葱岭河（今日喀什噶尔河）出于阗者所谓于阗河（今日和阗河）也。蒲昌海或盐泽者今所谓罗布淖尔或罗布泊者也。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后，即隐不见，潜行地底一千数百里，至青海之积石而复出，为中国河源，东流数千里而入渤海，则古图书又皆言之矣。《尔雅·释地》：“河出昆仑虚，色白。”《山海经·西山经》第二：“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西南又入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河出昆仑似无疑义。顾黄河出青海，乃系事实。今日河出昆仑，则非借重“潜流”之学说不可。“潜”之一字，亦出古书。《西山经》第二“又西北三百七十里，

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宗之山，东望滄幼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北山经》第三“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于滄幼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今张骞所调查而得之罗布泊，名曰盐泽，不名滄幼泽，当时汉廷君臣，睹一泽字，又安能不受其暗示。如此，则第三条条件，又俨然若合符节焉。

张星 YR 先生谓武帝之定昆仑，必与朝中博古之臣，共相考证，而后始有此定案，其言不为无见。故司马迁根据《禹本纪》之仙山，驳斥于阗某山之不成其为昆仑，固振振有词，汉武帝援引古图书，辩护于阗某山之实为昆仑，亦凿凿有据。公有公理，婆亦有婆理，试问聆取此案之法官，将何法以断其曲直，我意惟有挥两造出外，令其自行和解而已耳。

顾法官果有现代地理知识者，则武帝一败涂地无疑。今且将司马迁方面论据暂时搁起，但言汉武帝方面之论据。其第一条条件“在西北”，在今日地理学上言之，颇难成立。吾人若按地图经线，则西域全境，无论与战国时代之燕齐，抑与秦汉时代之长安，皆在同一经度以内，——即三十五度至四十五度——吾人仅能言昆仑在中国正西，不能谓为西北。惟古代对于地理之测量，决不如现代之精密，武帝之谬误实可原谅（昆仑在西北之真正理由，余将于后文解释）。次言河源，则诚二千数百年之大谜。帝王之遣使调查，固已至再至三，学者之研讨搜索，亦复殚精竭虑。然黄河源出昆仑，盐泽潜行，积石再出之谬说，盘据于国人脑海，蒂固根深，确乎其不可拔，今日科学学理，已将潜流重源之迷信，加以扫除，而于黄河源出昆仑，则尚有不惜百般曲解，以圆其说者，亦中国地理学上一至奇之现象也。今且不惜费词，将二千年来关于河源之争论史，概括叙述于下：自张骞报告河源出于阗，武帝据之以定昆仑，自汉至隋，未有异论。且汉以后史家，所得关于西域之地理知识，有时胜于汉人，黄河在于阗以上之上源，尚有比《史记》、《汉书》更为精详之叙述。如酈道元之注《水经》，利用当时传入中国之印度人西域地理书，记叙于阗河源，几达一卷之多。且笑张骞调查之粗略焉。

隋唐人常有事于西域，对河源不免重行注意。隋大业中，平吐谷浑，于赤水郡置河源郡，见《隋书·地理志》。又于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未几吐谷浑寇边……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遂逾积石山。”同书卷一百九十四《吐谷浑传》：“靖等进至赤水……遂历于河源。”同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及讨吐谷浑……与大总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历河源。”《新唐书·吐谷浑传》：“靖望积石山，望观河源。”同书《李大亮传》：“涉青海，观河源。”唐吐谷浑在今青海境。黄河出自积石，始为中国河，张骞、班固，久有此说。特发自昆仑者为“真源”，出自积石者为“重源”，斯又中国史地家所一致主张者也。隋人置河源之郡，及李靖与李大亮所观青海积石山之河源，在彼等心目中认为黄河真源欤？抑认为重源欤？史无明文，故吾人亦难确指。及长庆元年（公元八二一）刘元鼎使吐蕃还，而隋唐人对河源之真意，吾人始得明晓。《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下》：“是时元鼎往来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釜，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又其源西去吐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自沙洲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西。”《新唐书》卷二百十六《吐蕃传下》：“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河之

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西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唐之吐蕃，在叶谷浑西，即在今青海西藏境。所谓闷摩黎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在今青海东南。中国自汉谓昆仑在于阗，即今后藏新疆交界处，今乃被唐人移至青海，不可谓非地理学上一大革命。特黄河自源星宿海，阿尼马卿山所注出者乃另数源，刘元鼎所得之河源，实未真确，宜乎为元清二代人所讥。《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史录地理类，著贾耽《吐蕃黄河录》四卷。

耽乃唐代有名地理学家，著述甚富，今以吐蕃冠黄河上，殆已承认河源出于青海，惜其书今已不可得见矣。

至元而又有一番实地调查之举。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〇），命学士蒲察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是岁至河州。自杀马关以后，地势渐高，行四阅月而达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地位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元史采其说入《地理志》为《河源附录》，又采其说入《宋史·河渠志》。其说之梗概曰：

“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斯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为二巨泽，名阿刺诺尔。自西而来，连属吞噬，行一日，迤迤东鹜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名也里出，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兰，又水东南，名也果木。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又一二日，歧为八九股，名也孙斡论，译言九渡，通广五七里，可渡马。又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自是两山峡束，广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测。朵甘斯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也。自八九股水至昆仑，行二十日。”

元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得帝师撒思加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其言与潘昂霄所记，互有详略。书既出西藏喇嘛，想亦实地调查之结果也。

至清代而黄河源又被人实地调查，且不止一次。清圣祖曾遣使穷河源，仍得之于星宿海，御制文以纪其事，乾隆四十七年，以有事于河工，特命侍卫弥弥达，祭告青海河神，因西溯河源，绘图具奏，言星宿海西南三百余里，有河名阿勒坦郭勒，其水色黄。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郭勒为河。此河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曰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为北极星，“齐老”为石。此巨石壁作赤黄色，壁上有池曰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酳为百道，皆作金色，流入阿勒坦郭勒，实为黄河之上源，其位置更在星宿海上。凡此诸说，皆见于高宗命儒臣所撰之《钦定河源纪略》中。高宗所得黄河之源不过比星宿海更推进三百里。且星宿海四周数百里，河流亦多，阿勒坦郭勒河之通星宿海，想系水大时现象，平时则未见其通，故谓其河为黄河上源，想亦不过使臣迎合帝王好胜心理，故为之说耳。乃清高宗竟矜为不世之发现，既御制诗歌以纪其事，又作《河源纪略》颁其说于天下，一时言河源者无不采此新说，儒臣之颂扬圣功者，极一时之盛焉。

唐元清三代实地调查之结果，黄河源出青海，与于阗境之昆仑毫无关系，今已成定论。

夫“伏流”、“重源”之说，在地理学上并非不能成立，惟“伏流”必

由较高地带渗入较低地带，反之，则无渗入可能。今新疆为一大盆地——即塔里木盆地——海拔不过千公尺左右，而星宿海在西藏高原，高达四五千公尺，谓新疆罗布泊之伏流，可以潜行地下一千余里，至星宿海而重源再出，以为中国黄河之源，则现代地理学，决不能容纳此说。

今黄河“伏流”之说，稍有现代地理常识者已不敢再道。然有人谓昆仑有狭义，有广义。凡西部高原之山皆可为昆仑，则黄河出青海，亦可谓出于昆仑。又有人谓甘肃西之疏勒河，距新疆罗布泊不远，如塔里木河水大，则未尝不可以流入疏勒河，由是亦可流入黄河，故主黄河发源昆仑，固不必借助于“伏流”说也云云。疏勒河所流系塔里木盆地，然至祁连山麓，则地势又渐高，无论水之大小，皆无可以流入星宿海之理。即能流入，亦必先假定水大之条件而后可，绕此大弯，以圆河与昆仑之关系，则亦“潜流说”之变相耳。名之为“河源之迷信”，殆无不可。

于是笔者对于此种迷信，不禁大感兴趣，而认为值得一番研讨。自汉至唐千数百年，对此无异词者，犹可诿之未曾实地查勘也。唐元清三代，则皆有探索河源之事矣。唐人将昆仑由新疆移至青海，仍维持河与昆仑之关系，特不信潜流重源耳。元人置昆仑于黄河源东，相距且二十余日程，不信河发源昆仑者，惟有元人而已。清人一再履勘，知黄河源实在青海，然而河发昆仑，罗布泊潜流，齐老峰重出之说，决不肯放弃，主张更较前代为热烈，考清人一代朝野之地理书可知也。嘉道间地理权威魏源，已吸收甚多之西洋学识矣，而**为此说张目焉。同时代人徐松谪居新疆十余年，躬自查究西域水道，所得至为翔实矣，而亦殷殷为此说辩护焉。一种迷信，着于国人性灵，胶固如是，必有其特殊之原因，吾人试一探究，当有甚奇之发现。

今且返笔，更叙《史记》、《汉书》之文。《史记·大宛列传》：“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汉书·西域传》：“河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此二“潜”字，来源颇怪，值得吾人注意。前文固曾言武帝之考定昆仑，于潜流一节，必曾受《山海经》“东望₁幼泽，河水之所潜也”、“而西流于₂幼泽，实惟河源”二节文字之影响。顾此特武帝与群臣之所考耳，蹇、固则实得之于西域。盖张蹇为一探险家，为一军人，一生岁月消磨西域，当无暇于读中国书。班固亦为一极严正之历史家，于屈原《离骚》中之昆仑玄圃，尚以为非经义所载，置诸不论，宁肯注意于离奇荒诞，神话百出之《山海经》？彼二人，一先一后，异口同声，谓黄河潜行地下者，余谓盖得其说于西域人耳。蹇奉使西域，前后数次，居大夏尤久，于于阗情形，当然熟悉。班固之弟班超，居西域三十一年，于西域之地理必有极详之记录，固奉命迎北单于，亲至私渠海，故其《西域传》，言西域情形最详，至今尚不失为极有价值之西域地理史。彼对于河源之说，实由其弟班超实地调查得来，并非抄袭《史记》张蹇之说，吾人读其《西域传》，便可知之。夫黄河潜行地底二千余里，而后重源再出，又潜行地底千余里出积石为中国河源，此为何等奇异之地理现象，若非西域人本有此说，张蹇岂敢以此奏之于武帝，班固又岂敢入此语于其著作中乎？

或者将曰：安知此非张蹇迎合武帝好仙之心理，虚造此说耶？则吾人应知张蹇携此异说而回朝，亦不过偶为谈助而已，此外则并无其他企图，武帝闻此说而引起其寻觅昆仑之野心，则实非蹇之所料也。蹇果有心迎合武帝，则明知武帝决不能纡尊降贵，亲至西域调查，何妨竟捏造一昆仑以报；又何必坚言“未睹”，大煞武帝之风景乎？吾人读《史记》于此而犹不知，则亦

可谓太不善读书者矣。

吾谓西域人相信河源潜行地下，直接可由鞞固二人实地调查之结果相同证之，间接可由印度人之谈西域地理者证之。酈道元《水经注》卷一引释氏《西域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又引《凉州异物志》：“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又言“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出岐沙谷，东流经无雷、依耐、蒲犁、疏勒、皮山、莎车各国为河源；一西径循休，难兜、罽宾、月氏各国，至安息而注雷翥海。”按释氏《西域记》今虽不存，而观古书所援引之文，与唐代玄奘所译《大唐西域记》颇同，知为六朝时传入中国之印度人西域地理。《凉州异物志》或系中国人所撰，而据《水经注》所援文观之，则中亦多翻译之印度地名，知其亦必根据印度地理知识而写成者。释氏《西域记》言“河自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云云，必非剽窃中国《史记》、《汉书》，而实为印度人所得于西域历古相传之说。《凉州异物志》谓“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则与《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则水皆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又若合符节。

葱岭为亚洲最高分水岭。以岭水之东西分流，而西域人竟疑岭东西水可以互通。《水经注》卷一：“《汉书·西域传》又云‘犁靬条支临西海，长者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地’，或者河水（黄河，笔者注）所通西海矣。”中国古所谓西海，有时指地中海，有时指里海。《水经注》此节所言乃里海也。夫黄河乃能逾八千尺之高峰而通于里海，其不合事理，实倍于潜流。顾酈道元又乌从获此绝奇之观念者，盖亦闻之印度人，而印度又闻之于西域人而已。

或者又将曰：中国人之翻译事业欠严肃，今安知释氏《西域记》等语，非中国人所增饰乎？又安知酈道元之河通西海，非彼一人之臆测乎？则吾人又将引一证，以证其非然焉。按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教士马黎诺里（M a r i g n o l l i）游历印度，得地堂之传说，谓地堂在锡兰东，名科伦白姆（C o e u m b u n）流出四河，其第二河曰肥逊河，入中国境则为黄河。又言河流至喀发对岸，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塔纳，而潴为巴库海。张星 YR 先生谓“巴库海即里海之别名，马氏何以误将黄河与里海相连，则诚百思不得其解矣。中国自昔即有黄河发源于葱岭，流经喀什噶尔，成塔里木河，入罗布淖尔，再地下潜行，复出于青海，而成黄河之说。新疆之人亦有喀喇沙尔附近诸水，来自西海者（即里海）。马黎诺里经过诸地时，得此异闻，故有此误会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一六五页）。马黎诺里固非能读中国书者，此说又得之印度，然则吾人能谓黄河通西海之说，酈道元竟无所受而云然哉？然而西域人偏好为此不近事理之潜流说，又为曷故？曰：吾人之所谓奇事，盖在是矣，余前固言《山海经》乃古两河流域人之地理书，而“潜流”之语乃出此书，故知“潜流”学说实为两河人所倡，由里海而东，辗转而至于西域。以其源流古远，故其势力积久弥雄，西域、印度、中国之人受此学说之支配而摆脱无由，俨同一种迷信，岂无故耶？——关于此说，后文当更论。

综上所述，武帝第二条件又不能成立。惟第三条件于阗多玉，勉强可以凭藉而已。故曰审判此案之法官，若有现代地理知识者，武帝之失败无疑。

三中国境内外之昆仑

史言汉武帝定昆仑，而昆仑究为于阗何山，则史无明文，历来亦无确指。近代始有学者加以考求，而其结论则亦未必正确。此非吾国人研究学问不求甚解之态度为之害也。盖清以前西域未归版图，道路又绝穹远艰阻，勘察为难也。唐元清三代皆有事于西域，而昆仑之所在，乃大成问题，其故可知矣。且昆仑本不在中土，无其地而强指一山以名之，则人之意见必不能尽同，于是昆仑乃成为任人呼唤，信手成采之臬卢，此神秘之仙山，竟随地涌现焉。

又有印度传来之神话，海外国族之同音，映射缠纠于其间，更使吾国之谈昆仑者，有耳乱八音，目迷五色之概，昆仑问题之成为中国地理上之大谜，盖由于此，今吾人若企图解决此谜，则必须将历来昆仑所蒙之面纱，层层剥去，而后昆仑之真相可得。故吾人不得不再翻昆仑档案，计算中国境内外，究有若干昆仑。(A) 中国境内之昆仑清以前，中国本部之昆仑，则有安徽潜山县东北六十里之一山，福建惠安县东北三十里之一山。广西邕宁东北一百二十里之一山，而广西昆仑山上之昆仑关为宋狄青元夜破依智高处，亦抗战以来，常见于报章之要塞也。顾此皆为昆仑之模制品，一望可知，素亦无人措意，故余对此亦不愿再言，今则言昆仑之在中国西部者。不问考定时代之后先，拟议之人之贵贱，但以地段由东向西之顺序为断。

(一) 在青海西宁《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仑山祠。”临羌者汉置临羌县，赵充国曾于此屯田。今为青海省会。城濒湟水南岸，青海额鲁特蒙古及阿里克等四十姓土司，与汉人互市于此。为西边一大都会。临羌之地，原为羌人所居，后慕汉威德，愿献地内属。王充《论衡·恢国》篇：“孝平元始四年（公元四年）金城塞外羌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以为西海郡。”郑玄注《禹贡》之织皮昆仑，谓为西方之戎人，马融则谓昆仑在临羌西，盖为种族之名。汉志仅言西王母、弱水、昆仑祠，而未尝言其地有何山足称为昆仑。然境内既有弱水，则亦必有一小山名为昆仑者在，西王母石室当即建此山上，故汉志名之曰“山祠。”

(二) 在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塞外险要之处，可筑防御工事者，皆以障名。《史记》“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又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置城障，列亭”可证。必山岳丘陵乃足称为险要，故敦煌之昆仑障，料亦必筑于山陵之上。此山即名为昆仑者是也。(三) 在酒泉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引）。

(四) 即阿尼马卿山《禹贡》：“道河积石，”盖本之《山海经·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入禹所导积石山。”中国遂以黄河重源再出处，指一山名之为积石。积石有大小，小积石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即唐述山，当黄河曲处，其地有积石关；大积石则在今青海东南境，番名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又曰阿弥耶玛勒津木逊山，又曰阿木尼麻禅母逊阿林。蒙古语则曰木

素鄂拉。今地理书则作阿尼马卿山。刘元鼎使吐蕃谓得河源于莫贺延碛尾，曰闷摩黎山，即此山也，闷摩黎盖与阿木奈，阿弥耶、阿木尼为对音，特吞其尾音耳，黄河发源星宿海，流入札陵、鄂陵两湖，又数百里，至阿尼马卿山西部，容纳一河；又蜿蜒曲折行数百里，抵山之腹部，纳一河流；沿山东南行，至梭宗贡巴，陡折而北，于是行于西倾及阿尼马谷中，凡入六七河，其出于阿尼马北者三焉。刘元鼎探河源仅至于此，遂以为黄河发源于此山，而名之为昆仑。然此亦非刘元鼎之误，恐其受蕃人之欺骗而已。盖阿尼马卿高达海拔六千公尺左右，实为吐蕃境内之圣山。徐松言西蕃语谓“阿弥耶”为众山之祖（《西域水道记》卷二）。则西番人盖视之为群山之祖，恰值此山又有数河注入黄河，乃对中国人自炫为昆仑。元鼎不察，信以为真，遂有此误。

元代都什所觅得河源以东之大雪山，亦即阿尼马卿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谓大雪山在朵甘斯之东北。按元置朵甘思宣慰司以统蕃羌。青海之东南至西康之境，皆其地。今阿尼马卿山在青海东南，西康西北，则地望恰合。都什之报告录，谓“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朱思本所译之帝师梵文记录，谓“此山高峻非常，山麓绵亘五百余里。黄河随山足东流，过萨斯嘉库济克持地，”均与阿尼马卿情况相合。然元人似不知其所得之亦耳麻不莫刺山，即刘元鼎所得之闷摩黎山。清人亦似不知元人所得之亦耳麻不莫刺，即其常所称道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如魏源、徐松皆以为两山是也。

（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卷三中说：“大积石在克俦渡口，距阿弥耶玛勒津木逊山一千六百里，”在其《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则又谓：“河……经阿木奈玛勒占未逊山南麓，即大积石山，”一人之言而自相矛盾至此，不亦可怪欤？）（五）即巴颜喀喇山清圣祖尝遣使穷河源，以其时西藏未归版图，仅至青海星宿海而止，遂以巴颜喀喇山为昆仑，记之于《大清一统志》。其言之大略曰：今黄河发源之处，虽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为真源所在者，巴颜喀喇也。东北去西宁边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约千余里，山不极峻，而地势甚高，自查灵、鄂灵二海子之西，以渐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脉自金沙江发源之犁石山，蜿蜒东来，结为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层冈叠嶂，直抵嘉峪关，东趋大雪山，至西宁边，东北达凉州以南大小诸山。并黄河南岸，至西倾山，抵河洮阶诸州，至四川松潘口诸山。河源其间，而其枝干盘绕黄河西岸，势相连属，蒙古概名之为“枯尔坤”。“枯尔坤”华言“昆仑”也。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援其说以释《禹贡》之昆仑云：“昆仑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坡齐禽，一名巴尔布哈，一名巴颜喀拉。总名枯尔坤，在积石西，河源所出。”

（六）即天山洪亮吉曰：“昆仑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自贺诺木尔至叶尔羌，以及青海之枯尔坤，绵延东北千五百里，至嘉峪关以迄西宁，皆昆仑也。华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葱岭，或名于阗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仑，小昆仑，昆仑丘，昆仑墟诸异名。译言则曰阿耨达山，又云闷摩黎山，又名腾乞里塔。又名麻琫刺山，又名枯尔坤，其实皆一名也。”（孙璧文《新义录》卷八引）又《皇清通志》及松筠《西陲总统事略》皆云：黄河近源在星宿海西三百余里，远源则为回部极西之葱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四千余里。蒙古谓天山冰岭皆名曰昆都仑，急呼则曰昆仑（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引）。（七）即于阗南山《汉书·西域传》：“西域……南北有大山……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

又曰“于阗在南山下。”《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皆言骞“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为匈奴所得。”此为南山二字见于中国记载之始。南山果为何山乎？《史记正义》曰“南山，即连终南山，从京南东至华山，过河东，北连延至海，即中条山也。从京南连接，至葱岭万余里，故云并南山也。”《通鉴注》：“南山在于阗之南，东出金城，与汉南山接。”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肃兰州府西界），见《汉书·地理志》。汉南山即终南山，在长安西南五十里。所谓终南者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终也。

以上所言者为南山山脉，属广义。

至狭义的南山，则为于阗南山，在和阗额里齐城南五百八十里。历代异其名称，《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南山，《魏书·西域传》称之为冻凌山，

《水经注》称之为仇摩置（置者驿义），《大唐西域记》称之为瞿室鸢伽山。清徐松谓谚称为密克玛克曲底雪山（《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西域水道记》卷二）。今称蟒依尼山，蟒依尼者回语雪也，即雪山也。山有东西二谷，西曰桑谷，东曰树雅。近代地理学家丁谦先生著《汉书西域传考证》，谓此即汉武帝所定之昆仑山，顾实先生赞之云，古今言昆仑者纷如聚讼，丁谦之考证，则“洵乎同符古今，大要不谬矣”（《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六七页）。然顾先生仅许丁氏之言为“大要不谬，”似言其尚未达于完全正确之境也。顾氏本人则认托古兹达坂附近为昆仑山，隐指阿勒腾塔岭为昆仑，以释氏《西域记》言阿耨达山为中国之昆仑，阿耨达与阿勒腾塔音相近也（同书六九页）。

（八）即喀喇科龙山英人夏德（E. Hirth）尝言和阗南部有喀喇科龙（Karakorum）山，其音俨与昆仑相近。似乎昆仑山之外，尚有他山亦名昆仑，于上古时代见知于中国也（见氏所著之《中国古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张星 H. YR《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按喀喇科龙山为喜马拉雅山脉中之高山，绵亘中国、阿富汗及印度之间，一名木斯他喀拉科龙岭，四时皆通行旅。其山口为新疆南部与印度北部交通之要道。

（九）即冈底斯山《大清一统志》：“西藏有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四面峰峦陡绝，高出乎众山者百余丈。积雪如悬崖，皓然洁白。顶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地中。前后环绕诸山，皆摩岩峭峻，奇峰拱列，即阿耨达山也。”康熙中，西藏有大喇嘛来京，侈言昆仑实在西藏境，即冈底斯。其山所出诸水，有狮泉、马泉、象泉，诸名目，与佛经阿耨达银牛口，金象口，玻璃狮子口，琉璃马口名目相合。清廷特命理藩院主事胜住偕喇嘛往，绘西藏青海地图回奏，认为与昆仑相合，故清圣祖特定此山为昆仑。然圣祖固曾定巴颜喀喇山为昆仑，今则何以处该山乎？于是前话只有不提。而学者则认冈底斯为大昆仑，巴颜喀喇为小昆仑，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即此论之代表者焉。

（十）即葱岭清魏源主此说最坚。但六朝人已先有言者，如酈道元《水经注》卷一，借助于印度人之地理书，考订昆仑之所在，已隐约指其即为葱岭，特未明言而已。元常德《西使记》（一名刘郁《西使记》）中有过亦堵，盖契丹故居，过亦运河，土人云此黄河源。又过塔喇寺，过赛蓝城，过忽牵河。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山等语。按记所云契丹，为西契丹，在今伊犁境。亦运河即葱岭东喀什噶尔河源。塔喇寺即今塔刺斯河。赛蓝城即《明史》之赛兰，为元时往返西域必由之路。忽牵河即霍阐河之音转，今敖罕境内之纳林河也。纳林河出葱岭，则南大山即葱岭也。魏源据此，

谓元人似知葱岭即昆仑矣云云。

魏源又在其释昆仑上下，列举十余证，证明葱岭即昆仑，非冈底斯，词甚雄辩。大旨谓儒言昆仑，释言阿耨达，皆居大地之中，今冈底斯偏近南海，绝非域中。二则昆仑为黄河所源，今冈山距青海重出之河源五千余里，距于阗初出河源亦三千余里。又冈山广袤不及二百里，高才五百丈，是其高大不及葱岭十分之一，安得为宇内最高之山。又据《西域记》，葱岭据两雪山间，川中有大龙池，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回语谓之哈喇淖尔，此即释典之阿耨达池。番语黑曰哈喇，池曰淖尔。以水色青黑得名。黑龙池之称阿耨达，与称哈喇淖尔，华梵翻切皆同。知阿耨达池则知河源，知河源则知昆仑据大地之中，当万国孔道，且汇巨浸于万仞峰颠，分注四大海，宇内断无其匹云云（《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又《书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后》曰：“昆仑之为葱岭无疑，其地多产玉，又上有龙池，故玉山瑶池之说，尚非无因”（同书卷三十一）。

（十一）即兴都库什山之大雪山《元史·太祖纪》：“十六年……太祖历大雪山。”“十七年春，诏封昆仑山元极王，大盐池惠济王。”《元史·郭宝玉传》：“帝驻大雪山前，时谷中雪深二丈。诏封其昆仑山为元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青藏高原，山之在雪线以上甚多，山之以雪山及大雪山名者亦不一。元太祖所驻之大雪山果为何山，不可不考。按元太祖成吉思汗用兵讨伐回回，亲驻西域凡数载，常屯兵雪山以度夏。长春真人《西游记》云：“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辞朝，帝将兵追算端汗，至印度。”又云“是年闰十二月将终，有侦骑回报言：上驻辟大雪山之东南，今则雪积山门百余里，深不可行。”真人于次年四月间达太祖行在于大雪山，时为太祖十六年辛巳。次年从车驾于雪山避暑。其地则八鲁湾也。八鲁湾（Feruan）属兴都库什山系（Hindukush），山极高峻，雪终年不消，故有大雪山之名。太祖封此山为元极王，认为昆仑。五十七年后，世祖又命都实探索河源，以阿尼马卿为昆仑。不知当时元廷何以处置太祖所封之大雪山？然中国人固有大小昆仑之说，但须别以大小，则问题便可解决矣。元人之处置此二昆仑或即用此办法。

（B）海外之昆仑

今援前例，不论名见中国载籍之先后，但以自近及远之地段，而为叙述之序。

（一）普罗康多儿岛此岛西名Pulo Condore在南洋七星洲。张星YR先生云：据近代西人调查，此岛实为七星洲群岛之最大者，长十二英里，又稍次则为两岛，长各二三英里。其余五六岛，则小不堪言。普罗康多儿港口颇良，有淡水，树木丰茂，居民约八百口，皆交趾支那种，隶法国西贡长官治下（《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五三页）。

此岛唐人名之为军突弄山（见《新唐书·地理志附录》贾耽通海夷道），又名军徙弄山，又名军屯山。其最初讹为昆仑者，元人也。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云：“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洲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又自真浦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所谓七洲洋即Paracels也。昆仑洋即Pulo-Condore也（根据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八三页）。明初费信著《星槎胜览》，有云“其山节然临大海中，与占城及东天竺鼎峙相立。山高而方，山盘广远，海人名之昆仑洋，凡往西洋贩舶，必待顺风七

昼夜乃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明黄衷《海语》，有云“昆仑山在大佛灵南，凡七屿七港，是谓七门；其旁洲屿，皆翼然环列。适诸国者，此其标也。”又论岛之物产，有“海上无人之境，产物皆硕大。予客朱岩，令人采何首乌、天南星二药，皆三倍于常品，气味自别，固知有枣如瓜，非诞语也。”但黄衷有时呼此昆仑山为昆屯山，《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宾童龙国与占城接壤，气候风土大类占城。有昆仑山，节然大海中，与占城东西竺鼎峙相望，其山方广而高。曰其海即昆仑洋，往西洋者，必待顺风七昼夜，始得过。故舟人为之谚曰‘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无异产，人皆穴居巢处，食果实鱼虾，无室庐井灶。”清初陈炯《海国见闻录》：“昆仑又呼昆屯，非黄河所出之昆仑也。七洲洋之南，大小二山，屹立澎湃，呼为大昆仑，小昆仑，尤甚异。土育佳果，无人迹，神龙盘踞……红毛……就海立浦头，以昆仑介各洋四通之所，嗜涎不休……”徐继畲《瀛寰志略》：“昆仑，南洋必由之路。山产佳果，幽寂无人迹，神龙所宅。”

越南亦有一昆仑山。《越南地輿图说》：“北圻太原省有昆仑山，其源自上国而来，经高平而至太原，横峰壁立，峻岭摩空，人迹所不到。”论者谓是乃广西昆仑山一脉所延，盖越南高平地接中国广西。

（二）东南亚昆仑国及昆仑奴以昆仑为国族名者，有《禹贡》、《周书》所言西戎数部落，及清圣祖所言之昆仑都国。至海外昆仑见知于中国者则始于唐代，而昆仑奴，尤脍炙今日中外学者之口。

唐义净《南海寄归传》：“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河陵洲，咀咀洲，盆盆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洲，少有大乘耳……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馀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卷鬘？），总是其式。”此文所言之掘伦洲，据法国沙畹教授（Prof. Chavannes）考证，谓即《唐书》之林邑与真腊，今暹罗及麻拉甲半岛也。又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至佛逝国，解骨仑语，颇学梵书。”张星 H. Y. 先生云：“佛逝国为今苏门答腊岛渤林邦港（Polém lang）。真腊林邑今皆属马来种，然唐时似为内革罗种。《旧唐书·林邑国传》：‘自林邑已南，皆卷发黑身，号为昆仑。’《真腊国传》：‘真腊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可证。参以义净之言，‘唯此昆仑，头卷身黑，自馀诸国与神州不殊。’更可知矣。”

又有谓昆仑系国王姓氏音为古龙者之说。《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盘盘国在南海曲，北距环王，限少海，与狼牙*接；其君曰勃郎索滥，曰昆仑帝也，曰昆仑勃和，曰昆仑勃谿甘，亦曰古龙。古龙者，昆仑声近耳。”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洼，与环王同俗。有城郭宫殿。王姓古龙，居重观栅城。閤叶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卷发，裸行。”古龙之易讹为掘伦，为昆仑，固矣。然凡姓古龙之南洋群岛王族，皆为黑种又为何故，是则值得吾人之探讨者。费琅谓昆仑即吉蔑语之Kumn，暹罗之Krun，占婆之Klun；复据阿剌伯作家之说，谓古有Komr民族，与中国人为兄弟，居其地之西方，后因不和，迁徙于海岛。其国王号曰Kamrun。遂作结论云：昆仑（Komr）民族，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初，由亚洲高原，

遵伊拉瓦底江 (I r a w a d i) 潞江 (S a l w e e n) 湄南江 (M e n a n) 澜沧江 (M e k o n g) 等流域,徙居恒河以东各地。并谓非洲东岸之昆仑,亦即由此民族之移殖云 (冯译《昆仑南海古代航行考》)。丁山先生素主陆浑乌孙即昆仑之音转,遂谓南洋、非洲之古龙与昆仑亦为乌孙之演绎 (《炎帝方岳与昆仑》),是则为费琅所欺矣。盖义净所言倭伦与唐书所言古龙乃内革罗种人,而亚洲高原之 K a r m 及乌孙,则决非黑种 (西北地气高寒,非黑种所能生存与繁殖)。故费琅丁山所言之 K o r m 与乌孙,未尝无移殖南洋之可能,而与倭伦古龙之为倭伦古龙,则实为二事。或者将谓人类肤色可随天气改变,西北高原之民族迁居南洋,受热带阳光之薰灼,则亦变为黝黑矣。人类肤色固可随气候土壤而改变,然必积数十万年,或数百万年而后,可,非千年间事也。故费琅丁山之说,余所不取。或谓唐人所谓昆仑奴乃南洋马来种,是又不然。马来种人近似棕色,并不甚黑,发亦不卷。唐人之昆仑奴当是真正之内革罗种 (其称皮肤黝黑者为昆仑,则用于嘲谑而已,不可不辨)。

然唐人称所买黑奴为昆仑,此语何来?余请先考之印度。慧琳《一切经音义》:“昆仑语,上音昆,下音论,时俗便作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行,能驯服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有僧祇、突弥、骨堂、閼蔑、皆鄙贱人也。国无礼义,抄劫为活。爱啖食人,如罗刹恶鬼之类也。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慧琳所举僧祇、突弥、骨堂、閼蔑,当为真正之内革罗种。盖印度古为黑人之国,自雅利安民族由喜马拉雅山迁来,与土著苦战多年而征服之,驱之至东南海边及南洋各岛,掘伦洲尤为黑族聚居之地。

是以义净谓“唯此昆仑,头卷身黑,自馀诸国,与神州不殊。”然印度黑人文化固高于南洋各岛土著,故遗留印度者,被视为鄙贱之族,而至各岛者,则往往能为之君长,《唐书》盘盘扶南之王族,多姓古龙,或即由此。今南洋不更闻有何占政治势力之黑人,盖唐以后黑种愈益式微,同化于马来种中矣。近代地理学者,亦谓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岛内格里托斯 (N e g r i t o s) 种人,其形貌与非洲黑人无异,然人数甚少,被马来人驱匿深山,不可多见,此殆即印度骨伦之遗胄欤?慧琳谓南洋黑人能驯服猛兽犀象,善入水,竟日不死,皆与唐人所言之昆仑奴条件相合。然则印度人谓黑人为“骨伦”,又属何故?则余又疑其与《旧约》之“古实”(C u s h) 有关。希伯来人称非洲黑人为“古实。”《旧约·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云:“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耶和華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于你。”《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第十节“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说……我必使埃及从色弗尼塔直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旧约》“古实”一词,有时写作“俄梯亚皮亚”(E t h i o p i a),义犹黑人之国。在《圣经》常用以指埃及国境之东部,余意希伯来称黑奴为“古实”,而波斯人则或转其音为“古仑”,波斯商人自非洲携黑奴售之各地,携此名以俱来。或亦至于印度南洋,转辗而至中国。印度人得之,则名其本国被征服之黑人为“骨伦”。中国人得之,则译以昆仑二字。昆仑奴之语源,或由此而来。

(三) 非洲之昆仑层期国或谓昆仑奴之策源地曰昆仑国或层期国者,其地则在非洲。

《新唐书·西域传》：“疏勒……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朱俱波，甘棠贡方物……甘棠在海南，昆仑人也。”《册府元龟》卷九七：“景龙三年三月，昆仑国遣使贡方物。”《慧超往五天竺传·波斯国》条，言波斯人常往狮子国（即锡兰）取宝物，又往昆仑国取金。所言昆仑国皆为非洲黑人之地。非洲所产黄金固有名世界也。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基国”条“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物而擒之，卖为蕃奴。”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条“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产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张星 YR 先生曰“僧祇及层期国，皆科斯麻士《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之青几（Jing）。今代汉文地理书及地图，有译作桑西巴者，又有作桑给巴尔者，皆 Zanzibar 之译音也。《马可孛罗游记》卷三第三十四章，作 Zanghibar，其义犹言黑人国（The Region of the Blacks.）。阿拉伯人称东非洲大陆自克力满栖河（Kili-man-chi R）迤南，以至赤道南十一度余之德耳加多角（Cape Delgado）皆为桑给巴尔。阿伯尔肥达（Abulfeda）谓青几（Zinj）王驻蒙巴萨（Mombasa）。近代欧洲人则将桑给巴尔之名仅施之于一小岛……层期为青几，或桑西，或桑给之译音，毫无疑义。桑给巴尔之原义为‘黑人国’，故层期国前所冠昆仑二字必黑之义，似为阿拉伯文或为波斯文黑字之译音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五五页至五七页）。唐人富贵家所需黑奴颇多，未必皆来自非洲，或为印度与南洋土著，乃真黑种。再者印度、锡兰岛东之科伦白姆（见前）音近昆仑，印人谓为地堂之所在，则更足称为昆仑矣。唐人遂以南洋、印度间所买“骨论”、“掘仑”之黑人，名之曰“昆仑奴”。

如此，则“古实”、“昆仑层期国”，皆可不论。盖谓奴来自非洲，究竟太远。

综上之考证，中国西部山之可以名为昆仑者，共十余处，而无一可确认为《山海经》、《淮南子》所言之昆仑焉。顾实先生地理知识亦极洽博矣。在其《穆传讲疏》中，用种种科学方法，将昆仑之四至八到，全数划清，只能测出一座昆仑之丘而已。其主山则似隐指阿勒腾塔岭，然又未敢明言。此虽顾先生之取巧乎？此神秘之仙山，其实亦难于坐实也！近代学者谓昆仑为混沌，为囹圄，然哉！然哉！至海外昆仑不过音近而讹而已。然中国人未尝不误认其与西北昆仑有联带关系，不然，翻译地理之名，并非儿戏之事，何将古龙，掘仑，骨仑一概译以昆仑二字耶？如普罗康多儿岛之原音，与昆仑固风马牛不相及，乃亦必讹之为昆仑二字，而后始快于心。幸鼉尔小岛，一览可尽，无能傅会以幻想，不然，几何不谓仙人不死药即可求之是中哉？又马黎诺里所闻印度、锡兰岛东之科伦白姆谓为地堂之所在，其音宛与昆仑相近。汉时，交趾乃我国土，三国时受孙吴保护。孙权数遣使往海外求所谓夷州鞍州者。曾命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觅之。以所在绝远，卒不可至，但得夷州人数千还。卫温与诸葛直等，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死。其后又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海外诸国。事见《三国志·吴志》卷二，《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孙权之远规夷州及朱崖，乃出于扩充土地，增益人口之政治企图，然权晚年亦颇好神仙丹药之事，楼船浮海，其副作用当亦为求仙耳。秦皇、汉武屡次为大规模之求仙运动，不意三国时尚有

如此之一尾声焉。吾不知孙权所求者果为此音近昆仑之科伦白姆耶？抑其他之仙山耶？观于酈道元“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则三国、六朝之际，南洋、印度间必有一昆仑，人于中国人之耳鼓可知也。此等仙山，本属想象，何从寻觅？秦皇、汉武为此已不知酿几许悲剧，卫温、诸葛直亦以此诛死，不亦冤哉！又如前文所述，近代外国学者研究昆仑奴问题者，亦往往从中国西部之昆仑着想，有谓昆仑奴为西域昆仑山之居民者，有谓南洋、非洲之黑人皆中国西北高原之K o r m民族移殖者。昆仑二字，迷尽中国帝王，今又开始蛊惑外国学者，其威力亦诚惊人矣。余谓昆仑为世界大谜，岂过言乎？

（A）神话的昆仑

（一）昆仑神话之来源原人初能运用思考能力时，幻想至为丰富。彼仰视天空，见其广大无垠，高不可攀，以为必有一种超越吾人之种类，居于其间，名曰神明，或曰精灵。其能力至为伟大，且又青春永驻，长生不死。顾其形体及其感情意志，则亦同乎吾人。人类之宗教心理，固要求神之与人相通，故有人神同形说，天人交感说，转劫说之发生；原人思想简单，则又想象天神必常居地面，以便与凡人接触，是以建立庙宇及神坛，以为神明税驾之所。然神固不能长溷凡尘，则又想像崇高之山岭，为神地面之栖止处。我国有僊仙二字，仙字，从山从人，像人在山上。见《说文》。《韵会》：“仙，轻举也：从人在山上。”《玉篇》：“仙，轻举貌，人在山上也。”至僊字，从人迁声，《诗·小雅·宾之初筵》：“屡舞僊僊。”《庄子·有宥》：“僊僊乎归矣。”成玄英曰轻举貌，实与神仙之仙无涉。后人以其同音以代仙字。《说文》轻举之义，当由僊字来。实则仙字之义，非轻举所能括，以人在山上为主。仙字之产生或在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大入之时。后世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之说，以海内之名山，为神仙之洞府，尚系人在山上观念之衍化。希腊称神为“奥林匹司人”或“居于奥林匹司者”（O l y m p i a n）。印度古神话，诸神亦居山上。喜马拉雅山则为神人常居之地。凡思登天者，须登此山。特山为万神之王因陀罗所主，每以疾雷暴风雨阻止登山之人，故能登者罕。其后衍为须弥山神话，此山乃为得道者超凡入圣之阶云。

关于昆仑仙山之想象，不知始于何时，今日文献之约略可徵者，惟有文化最早之两河流域，故吾人亦惟有姑定两河流域为昆仑之发源地。考西亚远古传说，即谓有一仗山曰K h u r s a g K u r k u - r a，其义犹云“大地唯一之山”（M o u n t a i n o f A l l L a n d s）或曰“世界之山”

（M o u n t a i n o f t h e W o r l d），为诸神聚居之处，亦即诸神之诞生地（T h e b i r t h p l a c e o f t h e g o d s）。关于此山详细之描绘，今日西亚出土之砖文，尚无可徵，良堪惋惜——吾人愿望之满足，或将待之他日地底文化资料之发现而已。但西亚若干庙宇与七星坛之建筑，皆为此山之缩型。而中国之昆仑，希腊之奥林匹司，印度之苏迷卢，天方之天园，亦为此山之翻版。吾人根据此类材料，以揣测“世界大山”之景

况，亦未尝不可十得八九，此则吾人尚可引为差堪自慰之事者也。

笔者固不解西亚语文，以意测之，K h u r s a g之一字或指“世界”，或指“大地”，而K u r k u r a之一字则或为“大山”，为“高山”。中国之昆仑，古书皆作昆仑。说文谓昆为古浑切，仑，卢昆切。以今日粤音读之，与K u h u r a相差不远，殆音译其后一字也（且此仙山实为阿拉拉持（A r a r a t），波斯人呼阿拉拉持山为K u h - i - n u h则音与昆仑更近）。夫西亚与中国古代之语音，一则几经转译，一则屡有变迁，而尚能保存此项对音，使昆仑之真源不昧，终能互证于数千年后之今日，此则非可喜可庆之事耶？

（二）昆仑神话之分布西亚仙山神话分布之广，几遍全世界。埃及相传亦有大山，为群神诞生及聚居之所，惜今亦莫考厥详。至菲里士坦人之喀密（C a r m e l），希腊人之奥林匹司（O l y m p u s），北欧人之阿司卡德（A s g a r d），印度人之苏迷卢（S u m e n u），殆无不由西亚“世界大山”之演化。（1）希腊之奥林匹司希腊人所想象此仙山之景况，考之荷马史诗《依里亚德》及《奥德赛》，再考之希腊诸神话，则亦殊为奇丽。

大概谓：此山最高处为天帝宙士（Z e u s）所居。宙士召集群神会议亦在其处。有云母石之宫殿，宏峻无比。殿中梁柱，巨壮异常，瑰采琦光，互相映发；所有宝座，皆黄金白银所成。宙士高踞中央之座，称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亦称为诸神之父，万神之王。其他诸神，则各按其品级之高下，列坐于两旁。宫廷四壁，铺满凡手不能描绘之图画，谲诡奇幻，万态千形。其色则或浅绛，或殷红，或金黄，或深紫，睽e皇绚丽，炫人心目，有似夕照西沉时之一天霞彩。结璣 颢 募窘匀诤腿绌骸

自山巅至山腰为“云区”（T h e r e g i o n o f c l o u d s），为仙境与凡尘之分界。荷马史诗谓此云区为“天门”（T h e G a t e s o f H e a v e n），有女神曰霍莱士（H o r a e s）者守之。女神者或谓为宙士之女儿，或谓为宙士之近侍，为数不止一人。宙士常至此云区，麾云聚散以为乐。奥林匹司本为大丛山，故其他诸神，散居他峰，或居山谷，与宙士不共一处。希腊人想象天空之上，乃是神域，此山之高，既直通于天，则可为登天之阶梯。故O l y m p u s者义犹天人两界之渡口云尔。（2）印度之苏迷卢即常见于佛经之须弥山也。有苏迷楼、修迷楼、须弥留、弥留之异译，但以苏迷卢（卢一作口卢）为比较正确。苏迷卢译言“妙高”。《秘藏记本》曰“苏者妙也，迷卢者高也，故曰妙高山。”此外则有“妙光”、“安明”、“善积”、“善高”诸异译。佛氏言此器世界之最下为风轮，其上为水轮。其上为金轮，即地轮。地轮上有九山八海。九山者即持双、持轴、担木、善见、马耳、象耳、持边、铁围及须弥。而须弥居八山之中，故称为“须弥山王”，为此器世界之中心。

须弥山之高度，据《世记经阎浮提品》，则为“入海水中八万四千由旬，出海水中高八万四千由旬。”据《华严经》，则云“凡约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临处，以苏迷卢山为中，高三百三十六万里。”

据《楼炭经》及《大智度论》则出巔为诸鬘天，楼迦足天，三笠篋天，四大天王之所在。山腹为四大天王居处，山以上则三十三天也。此山仙圣济济，不可计数，而大妙天亦居于此山中。

其城池宫殿，则如《正法念处经》所描写：“复次见须弥山王，首有三十三天。住在山顶，所受行乐，不可具说。城名善见，纵广十千由旬，七宝

庄严，因陀青宝，金刚，车渠，赤莲花宝，柔软大宝，以为庄严。有善法堂，广五百由旬，毗琉璃珠，以为栏~J。真金为壁，一切门户，亦复如是。”“四天王所居宫殿，七重宝城。栏~J 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诸宝铃乃至无数。”

此山本身为四宝所成。如《智度论》所写，“东面黄金，西面白银，南面琉璃，北面玻璃，四边绕山半，有游乾谷山谷……四天王各居一山。”如《长阿含经》及《正法念处经》所写：山南向阎浮提之一面，为毗琉璃宝光所映射，使阎浮提人仰望虚空，皆作青色。东向瞿陀尼之一面为黄金，令瞿陀尼人仰望虚空，皆作赤色。西向弗娑提之一面为白银，令弗娑提人仰望虚空，皆作白色。北向郁单越之一面为玻璃，令郁单越人仰望虚空，皆作清淨白光明色。

此山之守护者则如《顺正理论》所写：“三十三天迷卢山顶。其顶四面各二十千，若据四周，数成八万……山顶四角各有一峰……有夜叉神名金刚手，于中居住守护。”此山之树林鸟兽，则如《正法念处经》所写：“于此山上，有如意树，随天所念，皆从树生。一切禽兽，身皆金色。多有众花，曼罗陀花，拘赊耶花，于山四陲，有四大林：一名欢喜林，二名杂殿林，三名鲜明林，四名波利耶多林。欢喜园中，有大树王名多波利耶多。于此树下，夏四月时，受五欲乐。戏游自娱。四天王天，于欢喜园，游戏受乐，故名欢喜园。”又如《世纪经阎浮提品》所写：“其山直上，无有阿曲，生种种树，树出众香，香遍山林。”

(3) 中国之昆仑古言昆仑之书以《山海经》、《淮南子》为详。《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寿，大五围。面（此字上疑夺一方向字）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此字上疑夺一方向字）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载蛇践蛇，臂有赤蛇。”

“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 魖螯2.凰朗螯7 锳鸾鸟皆载盾。又有离朱，木禾、甘木、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

“服常树（三字下有脱文）其上有三头人伺琅 螯！”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蜺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鶡、视肉。”

《西山经》第二：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

《大荒西经》第十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载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此外如《海外南经》第六，《海外北经》第八，《海内北经》第十二，《海内东经》第十三，皆提及昆仑，暂不引。《淮南·地形训》：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

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

“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

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倾宫、璇宫、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闾阖之中，是谓疏圃。疏圃之池，浸以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又次，则汉人所辑纬书言昆仑者亦多。如《河图括地象》：“地面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祇之地，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纵横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乐也。出五色云气，其白水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绕之。

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河图始开图》：“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地有三千二百轴，犬牙相举。昆仑之墟，有五城十二楼，河水出焉，四维多玉。”《河龙鱼图》：“昆仑之墟，五城十二楼，河水出四维。”其他如杂书等亦有涉及昆仑文字，从略。

综合上述奥林匹司，苏迷卢，昆仑诸山形况而比较之，则相同之点实不一而足。试论列于次：昆仑之最上为悬圃，人能登此，则成为灵体，能使风雨。由悬圃再上，则登于天，成为神人。奥林匹司之巔即为天界，苏迷卢以上为三十三天。同点一。

昆仑为“帝之下都”，为禹之“下地”，可见帝之正都在天上。希腊万物主宰宙士本居天上，特以奥林匹司为其地上离宫，以便时到大地，与人类相接触。苏迷卢亦为大妙天之居处。同点二。

昆仑除天帝外，尚有西王母居附近之玉山，又有许多神灵，散居昆仑附近各山曰昆仑之墟者。奥林匹司诸神散居此山之丛峰或山谷。苏迷卢四大天王居山腹，尚有诸天，居山之四近，同点三。

宫殿城郭，众宝庄严，瑰奇美丽，不可名状。三山之景况，大概仲伯之间。同点四。

昆仑四近之山多玉石，苏迷卢为琉璃、玻璃、黄金、白银四宝合成。又有所谓金刚、车渠，因陀青宝，赤莲花宝。奥林匹司未言多玉多宝，然宫殿为云母石所筑，梁柱皆闪宝石之光，宝座皆为金银。同点五。

奥林匹司有四季不断之仙葩。昆仑有珠树、璇树、绛树、碧树、又有不死树及木禾等。

苏迷卢有四大林。又有如意树，能随天人之愿而供给其需要。又有大树王名波利耶多，使天人于树下享受各种娱乐。同点六。

昆仑有开明兽守九门。苏迷卢有金刚守护山顶四角。奥林匹司有霍莱士守天门。同点七。

昆仑之神陆吾，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郭璞解“囿时”义曰：“界天帝苑囿之时节也。”奥林匹司女神霍莱士监守“天门”。然此神之职司亦管理四时之顺序，及花开果熟之时节，与陆吾之职责相似。同点八。

特此为目前之例耳，若再研求，同点当不止此。故三山之神话同出一源，万无疑义。

然则中国之昆仑由奥林匹司来乎？抑由苏迷卢来乎？有人谓希腊距中

国远，难生干涉，故昆仑之来，不由奥林匹司，可以断言。谓中国昆仑即印度苏迷卢，则昔贤久有此论，特谓之为大昆仑而已。近丁山先生乃坚主中国昆仑由于苏迷卢之衍变（《炎帝方岳与昆仑》），似乎除此以外，别无来源者，则窃期期不以为可。笔者之意，认为中国昆仑之一词及其神话皆直接来自两河流域。其证有二：奥林匹司，古希腊语为天人渡口，可见系译义。苏迷卢，古梵语为妙高，为善积，可见亦系译义。惟中国昆仑之音，与西亚K u r k u r a相近，则惟中国译音，非直接来自两河安能若此？此第一证也。《山海经》对昆仑之描写，文字尚颇朴质，言昆仑之高度，不过万仞，广不过八百里。昆仑墟内诸山之相距，亦不过百里或千余里。汉初司马迁所见《禹本纪》，言其高二千五百里。《淮南·地形训》，言其高一万一千余里。而印度苏迷卢高乃至八万四千由旬（佛经言由旬有三类，大者一由旬八十里，次者六十里，下者四十里），OE 竟傲指咧寥 偃 蛭裳 苏迷卢与阎浮提各洲相距之遥远，往往至数十万万里，俨同今日天文数字。虽印度人原有喜大喜多之天性，顾一时之间，亦未必能夸张如此之甚。故苏迷卢在印度，历史之古，恐略过于中国昆仑，然如《世记经》、《楼炭经》、《长阿含经》之所言，反比中国昆仑为晚起。盖故事流传愈久，则增饰愈多，放大之倍数亦愈巨，自然之理。此第二证也（《禹本纪》、《淮南》所记昆仑，恐已受印度若干影响，故知战国末及汉初，印度人对苏迷卢山之想象，尚不过尔尔）。

昆仑既系人类想象之仙山，故若问昆仑究在何处？吾人正可诵白傅《长恨歌》一句以答之曰：“山在虚无缥缈间！”

（B）实际的昆仑

上述各处仙山固属虚无，而仙山所凭藉者则固存在，此即本节所叙之主题。

古时人既设想仙山系在地面，则非认知其处不可，欲认知其处，而实际又无其境，则惟有指定一山，姑名之以仙山而已。传之既久，信者愈多，此山乃真成为“欲界仙都”、“地上天堂”矣。基于民族之自尊心，此山必在本国境内，不得已乃可在他境。为增加境地之神秘性起见，则山必极高极大，人迹难至。若有传统之灵迹，则条件之构成，尤为容易焉。

西亚之“世界大山”初属想象，后乃变成实际。其实际之山，果在何处，本难考知也。

顾希腊、印度、中国之仙山，既皆由西亚所衍出，则希腊、印度、中国所有仙山之景况，亦即西亚“世界大山”之景况矣。且希伯来人之伊甸园，有四道圣河之说，中国昆仑亦有四河及河源，印度阿耨达山亦有四大水之说。而伊甸之四河，其二即两河流域之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有此显明之线索，则西亚实际的世界大山在于何处，不难探索而得矣。按阿拉伯半岛西北为阿美尼亚高原，其间丛山峻岭，蜿蜒磅礴，北连地中海北岸之士鲁山脉（T a u r u s C h a i n），东接伊兰高原及高加索山脉。相传为人类之摇篮，人类生于此，而后散布四方。其间有一大山曰阿拉拉特（A r a r a t），为半岛最高之山，其位置恰在两河流域之西北。中国载记一律言昆仑在西北，自汉至清，帝王觅昆仑者，亦必苦索之于西北，其真正原因盖在此矣。（希腊之奥林匹司正当雅典西北，印度阿耨达山正当印度全境之西北，巧合如此，诚为可怪。是必希腊、印度人皆受阿拉拉特之暗示，以为仙山必于西北求之，故产生此相同之结果欤？）

此山处阿拉伯斯平原（P l a i n o f t h e A r a p e s），有两圆

柱形之高峰，大者高海拔之五五〇〇公尺。小者海拔四二〇〇公尺。两峰相距约七哩。其中间为一平谷，相传挪亚避洪水时方舟所搁处。山之斜坡有村曰阿尔歌（Argur），相传为挪亚之葡萄园地，今则湮没于地震。更下为拿雪特谢温（Nachitjevan），在阿拉伯司（Arapes）平原，为以色列族列祖列宗之葬地，皆有名于《旧约圣经》。

西亚洪水故事主角纳比西士顿（Utnapishtim）之方舟搁于尼特西山（Mount Nitsir）顶上。另一洪水故事之主角曰西苏鲁士（Sisuthrus），其舟则搁于阿美尼亚之一峰曰古色伦（Corcyrean）者。《旧约·创世纪》挪亚之方舟则搁于阿拉拉特（中译《圣经》作亚拉腊）。是三山恐即为同一之山。此即西亚实际的“世界大山”，亦即《山海经》、《淮南》所介绍之昆仑也。

《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敦丘或指阿拉伯斯平原，陶丘非挪亚葡萄园，则以色列族人葬地。融丘则当指最大之峰，融字有火义，殆因其曾为火山（见后）。三成相合，为昆仑丘。“丘”与“墟”大有分别。所谓昆仑墟者则殆指阿美尼亚高原（Aménia Plateau）而言。《山海经》言昆仑之墟八百里。今阿美尼亚东西长约六百哩，合华里约一千二百，古里大于今，宜略有出入。张华《博物志·志水》：“汉使张骞渡四海，至大秦。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丈，方八百里。”中国古书之所谓西海，可指里海，亦可指地中海。阿美尼亚靠近地海，又张华八百里云云，亦与古书相合，则小昆仑所滨之西海，实指地海而言。张华熟闻《汉书》大秦与西海之关系，遂有至大秦之说，张骞何尝至大秦乎？小昆仑之名亦似始于此时，盖晋时殆已以《伪十洲记》之昆仑及印度苏迷卢为大昆仑矣。张华之记述小昆仑原属无心，而吾人竟由此而得悉地海之滨，果有山名为昆仑，见知于古代之中国，非至有趣味之事哉？

《河图括地象》言昆仑有柱，其高入天，即所谓天柱，今阿拉拉特两峰皆为圆柱形，则天柱之说，殆由此而来。阿拉拉特昔曾为喷火山。阿尔歌村之湮没于地震，未始不由火山爆裂之故。顾实先生谓《穆传》之温山即为阿拉拉特，周穆王曾登之云（《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六九页）。

《大荒西经》第十六“……有大山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当指此矣。伊兰高原及黑海、里海、地中海四面之山，盛产金玉宝石及银铁。

顾实先生谓《山海经》沃民之国，有璇瑰、瑶碧、琅ā 椎あ(3)嗟あ6.喊 产凤卵。《隋书·西域传》亦列举波斯产真珠，颇黎、珊瑚、玛瑙、水精、火齐、金银、铜铁等物。并产大鸟卵，即今鸵鸟卵（同书一三五页）。则《山海经》言昆仑多玉石之属，又相合矣。西王母所居为玉山，殆其山所产玉石之属更丰。考里海之南，有大山曰查各罗斯（Zagros），其山盛产五色玉石（Lapis-lazuli即琉璃），其山所在地，恰如顾先生所考西王母邦，则《山海经》所言玉山，殆即查各罗斯山也。《创世纪》之伊甸（Eden）当亦即阿拉拉特。伊甸与昆仑，其音固有依稀之似矣。所谓亚当夏娃所居之乐园，当亦在是山之中。乐园称为“伊甸园”（Garden of Eden），或称“地上天堂”（法文为Paradis terrestre，英文为earthly Paradise，然英文常省称之为Paradise。中国天主教通译地堂）。以前地堂在于何地，西洋学者，亦复聚讼纷纷，莫衷一是。阿甫郎谢（Avranches）主教曰胡爱忒

(Huet) 者著有专篇，研究地堂之所在。略谓古来学者有谓地堂在北极者，有谓在鞑靼境今里海附近者，有谓在极南火地者，有谓在东方恒河畔者，有谓在锡兰岛者，有谓在中国者，有谓在日出处无人居住之东方者，有谓在美洲者，在非洲者，在东方赤道下者，在月球中之山顶者。

多数则谓在亚洲，然亦无确定地点。有谓在阿美尼亚者或美索博达米亚者，或在亚述者，在波斯者，或在巴比伦者，或在阿拉伯者，或在叙利亚者，或在柏雷斯丁者，甚或有谓在欧洲之某一小地点者（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张星 YR《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一六六页引）。然费立坡神父（Father Filzoppo）之考证，则谓伊甸园系在阿拉拉特山之腹地（同书），与余之推断，可谓不谋而合。但费神父若知挪亚方舟系搁于中国人最所艳称之昆仑山顶上，斯则更足称为佳话矣！

希腊之实际的奥林匹司，为一大丛山。介在马其顿尼亚（Macedonia）及柴刹莱（Thessally）之间。奥林匹司山东临爱琴海。出自平地拔起，直透天空，瘳削斩绝，希腊从无人能攀登至于山顶。山麓树林绵密，弥望青苍。山腰以上，则终年埋于云雾。天气晴朗之时，阳光穿射，仰望积雪之山巅，皑皑一白，奇光照眼，有如无数琼宫玉阙，参差其间。希腊人幻想其为神人栖迟之地，固无怪其然矣。

印度实际之苏迷卢，则阿耨达也。余固言印度人接受两河文化或早于中国，恐已久知阿拉拉特之名，盖阿拉拉特乃今日欧洲人所呼之名，以前阿美尼亚人则呼之为Massis，波斯人则呼之曰Kuh-inuh，或曰挪亚山Nach's Mountain。突厥人则呼之为Aghridagh，义犹“高陡之山”（Steep Mountain）。阿耨达之与Aghridagh音之切合，乃无伦比（但印度今日称阿耨达为Anavatacpta，与古音不合矣。家六叔继卿先生云：阿耨达疑为巴利文Anutatta之译音，则与古音尚相谐焉），而印度之苏迷卢义犹云“妙高”，则一译其音，一译其义耳。《起世经》：“佛告比丘，雪山……黑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舞唱妓乐之声。山有二崛，一名为尽……二名善尽，七宝所成，柔软香洁，犹如天衣，则又俨然阿拉拉特两峰之况。《俱舍论》十一曰：“大雪山北，有香醉山，雪北香南，有大池水，出四大河。”《南山戒疏》一上曰：“四河本源，香山所出。俗云昆仑者，经言香山。”《西域记》一曰：“赡部洲之中池者阿耨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瓦里。”香山梵文为Gandhamadana，称为阎浮提世界最高中心，一切条件与阿拉拉特山无不合。岂印度剽袭中国昆仑传说耶？余谓盖受之西亚耳。

三国六朝时人，已知阿耨达即昆仑，顾昆仑之所在，中国人自己尚捉摸不定，何能知阿耨达之确址？印度僧人来中国，亦曾助中国人解决此问题，如《水经注》卷一所言佛图调，以《山海经》所言昆仑所在，合之阿耨达山是也。又有来华印僧据《山海经》及《康泰扶南传》：“恒水之源，乃在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知阿耨达即是昆仑山，为《西域图》以语印僧法汰，法汰以常见为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昆仑之所在也。”惟郗道元脑中横梗一《山海经》、《淮南子》所言之神话昆仑，及汉武帝所钦定之于阆昆仑，遂云“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阆二水之限，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轻轻一笔抹煞，遂使阿耨达与昆仑关系垂合而复乖，殊为可惜。然此事亦不

能怪道元，盖印度阿耨达亦非真正之昆仑，且中国昆仑传说，乃直接得之西亚，非得之印度，本属二山，何能强傅为一乎？

阿耨达果在何处耶？曰即清圣祖所定为昆仑之冈底斯山是矣。清《一统志》言此山高仅五百余丈，故魏源卑之，谓不及葱岭十分之一，安足以当昆仑？然西藏高原，除埃佛拉斯峰之外，以冈底斯为最高，达海拔六千公尺以上。西藏喇嘛对清圣祖侈陈冈底斯之形势，谓天下三条四列之山，皆祖于此，故番语“冈底斯”，译言“众山水之根”，魏源又谓西蕃语谓雪为冈，梵语谓山为底斯，冈底斯三字乃合番梵语而成，义犹“雪山”耳，何“众山水根”之有？其狮泉、马泉、象泉之合于佛经阿耨达者，一律为喇嘛所伪造。其言皆太过，下文再辩。

五昆仑与四河

昆仑构成之条件，珍木异兽，琼楼玉宇，仙灵神怪等等尚非重要，重要者厥维发源昆仑而各自流入大海之四条大河。此为探讨昆仑所在地之关键，而亦笔者此文研究之中心也。希腊奥林匹司山实际无河，OE 叩佑谱么纒酏猓泄酥予兀度人之阿耨达，希伯来人之伊甸，皆有四河之说，巧合若斯，即欲强证其非同出一源，亦不可得。兹分别论述如次：(A) 中国昆仑之四河《山海经·西山经》第二：“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是多怪鸟兽。”《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淮南·地形训》：

“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隅，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于海。洋水出其西北隅，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黄河为四大河中最重要之一水，但黄河并不发源昆仑，前文已有详论，然则黄河与昆仑之关系已完全宣告断绝。今日四河会议场中，灵源公（唐人所加黄河封号）决无参加之权利，吾人惟有请其退席而已。

首论洋水。《禹贡》、《尔雅》皆不载此水之名，仅见于《山海经》、《淮南子》。惟《穆天子传》有二条记载：“己卯，天子北征，赵口舍。癸辰，济于洋水。”又“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人戏觴天子于洋水之上。”

《水经注》无洋水而有漾水。《水经》卷二十：“漾水出陇西氐道县绑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酈道元注曰：“酈驩云：‘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汉水。’”盖《山海经》、《淮南子》皆言洋水出昆仑西北，南入海羽民南，又与黄河相提并论，可见必是一条大水，

故阼駟附洋于漾，意似谓其音近而讹者，又附漾于汉，意似谓其形近而误者。汉水至湖北汉阳注长江而入海，下游则姑认其是，然绑冢山距昆仑极远，既曰漾水导源绑冢，则其上流与昆仑无关。于是又有“重源”之说，以勉强结合之。酈道元亦知其说之多窒碍，惟为之解辩曰“然川流隐伏，卒难详照，地理潜门必，变通无方，不可全言阼氏之非也。虽津流派别，枝渠势悬，原始要终，潜流或一。”顾实先生则谓洋水即今新疆疏勒府之喀什噶尔河，其上流为乌兰乌苏河，为玛尔堪苏河，……其下为塔里木河，东入罗布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〇一页）。然《山海经》、《淮南子》之洋水皆须入海，若洋水入罗布泊重源再出，而东注于海，则洋水与黄河何别？然洋水与黄河，实是两水，顾先生亦知其然，殆以罗布泊在佛经名牢兰海，即以此当《山海经》、《淮南子》之羽民南之大海欤？按羽民为海外三十六国之一，区区长广不过三四百里之罗布泊，四围果有羽民等国家否？且黄河如此之长，洋水又如此之短，亦搭配不上也。

次论弱水。《禹贡》“弱水既西”，又“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删丹县，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水经注》：“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唐贾耽亦以张掖郡之张掖河当《禹贡》之弱水，见程大昌《禹贡论》。按今宁夏居延泽，有两水合流至甘肃东北境，名曰弱水，通过合黎山脉，又分两股，一股入酒泉为白河，一股经张掖而入峡口。发源既非昆仑，又未入海，当然非《山海经》、《淮南子》所言之弱水。此外中国境内外水之以弱名著，不下八九处之多。顾实先生谓昆仑弱水即今西藏雅鲁藏布江，其上源即今后藏札什伦布至阿里一带之陆海，下流为雅鲁藏布江（《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六五贡）。按雅江入印度而注入孟加拉海湾而入大海，实为中国西南部一条大河。但顾先生认昆仑在新疆境，而雅鲁藏布江则发源于西藏拉萨之北，顾其尾则不能顾其头，亦未免遗憾。

更论赤水。此水之名不见于正经书传如《禹贡》、《尔雅》者，故古人亦不重视，《水经注》有“赤水在西北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流入于河”之说，盖指今陕西宜川县北上之一水耳。惟《穆天子传》有关于赤水文字二则：“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天子口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瑶。”《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顾实先生引董祐诚之言曰：“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河，曰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曰喀齐乌兰木伦河，蒙古语谓赤色曰乌兰，盖却赤水”（《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六〇页）。又曰：“流沙即今蒙古大戈壁，西连新疆东境，赤水即金沙江”（同书六六页）。金沙江发源地诚近昆仑山脉，然顾先生并未连其下游长江以言，则未入海。

《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华阳黑水惟梁州”、“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因黑水见于《禹贡》，古来地理家、经学家关于此水之辩论，积稿亦复盈尺。清廷曾遣使臣，远适西域，穷探原委，写图以志，乃谓《禹贡》三个黑水字样，实为不同之三水。

一为雍州黑水，出陕西甘肃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积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一为梁州黑水，源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即今云南之金沙江。一为大禹导川之黑水，其源亦发于西番诺莫浑五巴什山，即云南之澜沧江，南流至阿瓦国而入南海。以上皆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所引。蒋氏又辨之曰：“按此三黑水，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真正黑水之源，去澜沧之西

三百余里，番名哈拉乌苏色禽，经蒙番怒夷獠獠界，由缅甸入南海，即佛书所谓黑水出阿耨达山东是也。禹迹之所不至。盖中国在阿耨达之东，……所入大水唯黄河一支。黑水出阿耨达之东，实在中国之西南，未尝流入内地，故从古无人知其原委也。”顾实先生谓“黑水即新疆叶尔羌河”（《穆传讲疏》六六页）。叶尔羌河源出葱岭，与顾先生所认为昆仑山脉或托古兹达坂无关，且河身太短，不称四大水之实。顾先生又谓新疆喀什噶尔河为洋水，西康境之怒江上游喀喇乌苏河为青水，均见《穆传讲疏》六三页至六六页。

黄河以外，洋、弱、赤、黑、各水与今日昆仑山脉亦均不能发生关系。古今学者，于此四水，牵之、挽之、揉之、搓之，望其与昆仑山脉，打成一片，而顾此失彼，总不自然。赤水之名，仅见野史，既难捉摸，只有付之不论。黑水、弱水名见经书，安敢不为探讨，而迷离恍惚，依然闷壶卢一个。故宋代毛晃废然叹曰：“史志及诸家言黑水弱水互有异同，率多牴牾，姑撮其梗概，辨其误而阙其疑，以俟博达君子而折衷焉”（《禹贡指南》卷二）。魏源则直指弱水为荒诞（《释昆仑》上），近人蒙文通先生亦归黑水于神话（《古史甄微》），是岂无故而然哉！夫竭二千数百年学者之聪明才力，不能解决此区区四水之问题，言之可笑而亦可哀矣。使《山经》、《淮南》所言昆仑果在中国，四水果为中国之地理，又乌得有此现象耶？

中国古人于昆仑四大水印象颇深而除借重潜流，勉强牵合之黄河外，其他三水之所在，则苦于无法证实。乃为“四渎”之说，以为慰情聊胜之计。

《尔雅·释水》：“江、淮、河、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应劭《风俗通》：“江、淮、河、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淮水发源河南桐柏山，济水发源河南王屋山，其长度比江河不及十分一，济水尤细微，与江河并称四渎，实为不称。唐太宗即曾以为疑，问许敬宗曰：“济甚细而在四渎，何哉？”对曰：“渎之为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者也。济水潜流而屡绝，状虽细微，其实尊也”（见《唐会要》）。是言亦甚矫强，今淮夺于运，济夺于河，中国四渎仅存其二而已。

（B）印度阿耨达山之四河《长阿含经》：

“雪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澈，无秽，七宝砌垒。其池底金沙充满，华如车轮，根如车毂。华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南海。池南有新头河，从狮子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南海。池西有缚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西北海。

池北斯陀河，从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东北海。”《释氏西域记》（《水经注》卷一引）：“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即昆仑山……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幸头河……”《华严经音义》：

“香山顶上，有阿耨达池，四面各流出一河：东面私陀河，出金刚狮子口。南面恒伽河，出银象口。西面信度河，出金牛口。北面缚叉河，出琉璃马口。”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原注：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余里，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峰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大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冷水，给赡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殳伽河（原注：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原注：旧曰幸头河，讹），绕池一匝，入西南海。

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乌河（原注：旧曰博叉河，讹），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狮子口，流出徙多河（原注：旧曰私陀河，讹），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河源。”

诸释典所言四大水，有似出于想象。幸而其中有殳伽河，即恒河（Ganges R.）也。有辛头河，即印度河（Indus R.）也。但须觅得此二河之策源地，便知阿耨达山何在？而二河实出西藏阿里之冈底斯山，故知冈底斯即阿耨达也。按喀喇昆仑山脉至西藏阿里境，与喜马拉雅山脉相合，成冈底斯山脉。其最高峰为僧格喀巴布山，次高峰为冈底斯山。冈底斯山者，非所谓“众山水之根”，亦非所谓“雪山”，乃由恒河原音Ganges而得名。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旋又分离，并行而东，其中为雅鲁藏布江谷。冈底斯之东南有二大池，一曰拉葛池，一曰玛那萨罗沃池——《大清一统志》称之为马品木达赖池，今西人称之为麦那萨落瓦湖（Manasarornar Lake）。其名与《大唐西域记》之阿那婆答多池相近，知即中国人所译之阿耨达池矣。印度雅利安人本居喜马拉雅山，故以此山为圣山，此湖为圣湖。神话与佛经，道及此湖者，实不一而足。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谓此山分为四干，东出者曰克喀巴布山，藏语为“马口”。其水曰崖鲁藏博楚，义犹“马泉河”，即雅鲁藏布江也。南出者曰部沁喀巴布山，藏语曰“象口”。其水曰狼楚，义犹“象泉河”。西出者曰玛布佳喀巴布山，藏语“孔雀口”，其水曰麻楚。北出者曰僧格喀巴布山，藏语“狮子口”，其水曰拉楚，义犹云“狮泉河”。狼楚、麻楚、拉楚三河相会，始名冈噶江，即恒河也。会雅鲁藏布江，东南注孟加拉湾而入大海。拉楚河又西北流，会狼河那古河为印度河，西北入印度境，折而西南流入阿拉伯海。徐说盖根据《大清一统志》而又参以西域见闻而成之者。

笔者按：冈底斯诸泉与佛经所记同，特名目略异（魏源谓皆喇嘛所伪造，未免诬喇嘛太甚。天下惟作伪之事最为容易，喇嘛果有心作伪，何不依据佛经以立四水之名？又何必留孔雀之异？故笔者宁谓此四水之名实自来所有）。又四方之方向不同耳（然《大唐西域记》与《长阿含经》、《华严经音义》，即相互牴牾）。察西藏地图，诸水所出，并不如徐松所云之整齐，若如佛经所云之东西南北四面各出一水，各绕池一匝，各从五百河，分注东西南北四大海，则更无其事。印度人强实际之冈底斯，为其理想之苏迷卢（其黄金、白银、琉璃、玻璃之四口，即影射苏迷卢之四宝合成之四面），故描绘得异常热闹。吾人若信以为真，按图以索骥，则非上印度人之大当不可。

然则康泰《扶南传》谓恒河有五大源，奈何？余于西藏地理不熟，殊不敢强为解释，疑康泰五大源之说，实指印度河彭甲伯（Panjab）一带之五河，误以下流为上源耳。

《梁书》五十五：“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五江总名曰恒水。”新陶即辛头，亦即印度河。印度河上游分二支在中国人口中，称东西恒河也。或曰殳伽即恒河，辛头即印度河，二大水，今闻命矣。其缚乌徙多二河，果即狼楚、拉楚诸河乎？曰：此又不然。狼楚，拉楚乃河源耳，而缚乌、徙多则与恒河、印度河并列为四大水，且其末流均注海者也。《大唐西域记》谓“徙多潜流地下，为中国河源”，则当系指塔里木河而言。《西域记》又云：“大龙池……东面一大水东流，东北至疏勒国西界，而徙多合而东。”此大水者指塔里木河之上源喀什噶尔河，汉疏勒国，唐时为法沙国、清为喀什噶尔。其地正当此河流也。又云“西北（指大龙池之西北）一大流，与缚乌河

合而西，至达摩帝国。”达摩帝国为今葱岭西之什克南部地。魏源谓缚乌即《水经注》之妫水，即《元史》之日者布河，亦作阿梅河，亦即南怀仁《坤輿图》入咸海之阿书河。今则曰阿母河。阿母与阿书，乃缚乌之音转云云（见《释昆仑》下）。近代中外地理学者，亦多作此说。

惟塔里木之下游黄河，虽云入海，而其上源喀什噶尔河源出葱岭。阿母河源更在葱岭以西，与冈底斯皆全无干涉。阿母河未流入咸海，不过一大湖而已，非大海也。强此二河与冈底斯发生关系，则非借重“潜流”、“重源”之学说不可。笔者固言此种学说，不但中国人信仰，印度学者亦非常信仰。彼对黄河既屡作此论矣，今更请徵之《水经注》。《水经注》卷二，言妫水与蜺罗跋谿水同注雷翥海。又引《释氏西域记》：蜺罗跋谿出阿耨达山之北，西经各国，至安息注雷翥海。据魏源考证，妫水即阿母河，蜺罗跋谿水即乌浒河，雷翥海则为里海。阿耨达（即冈底斯）在帕米尔高原以东，里海则在帕米尔高原以西。今出阿耨达之妫水与蜺罗跋谿水能注于里海，则非利用潜流学说，如何可通？魏源拥护此说，但尚以里海为非大海，而谓其竟注于地中海，言阿母河潴于咸海，潜行地底而注里海，再由里海以西，潜行地底，重源再出，而为大乃河，长二千四百里，分三道入墨的湖而达地中海（见《释昆仑》下）。

总之，印度仅恒河与印度二河，真发源冈底斯。徙多缚乌，发源及入海，均须借重“潜流”。

（C）阿拉拉特之四河今言及本题矣。举世仙山，既皆出西亚阿拉拉特，则阿山固举世仙山之祖也。惟此仙山传衍及他国，皆变为神话之境，且传合之以本国河流（如印度阿耨达），探索殊为不易，幸《旧约》伊甸，同产小亚细亚，四河皆有主名，而其中有两大河尤为地理上真实名字，举以为证，问题便易解决。至伊甸故事在阿山前？抑在其后？《圣经》学者或可言，浅学如余，安敢置喙？按《旧约·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河名叫比逊（P i a o n），就是环绕哈腓拉（H a v i l a h）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C i h o n），就是环绕古实（E t h i o p i a 法文译本作C o u s c h）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H i d d e k e 法文译本作T i g r e），流在亚述（A s s y r i a）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法文译本作L . E u p h r a t e）。以《山海经》、《淮南子》所言四大水，合之中国昆仑山脉及印度阿耨达，凿柄龃齬，百无是处。合之阿拉伯半岛，则如断符裂契之相投，泯然无复痕迹。谓余不信，请徵之希伯来人伊甸之四河。中国昆仑印度阿耨达，希腊奥林匹司皆在国境西北，而伊甸独东，是伊甸在阿拉拉特丛山之第一铁证。盖从建国于半岛西部之希伯来人言之，阿拉拉特固在其东也。上帝造亚当夏娃于伊甸，而阿美尼亚高原，相传为人类之摇篮，挪亚方舟又搁于阿拉拉特山顶。凡此种种，皆可证明阿拉拉特与伊甸之关系。

今且论伊甸四河之一即第三道河曰希底结者。所谓希底结（H i d d e k e）本非希伯来人语。但《创世纪》明言此河在亚述东边，故《圣经》学者知此河即构成两河流域最重要之一条大河替格里斯（T i g r i s）也。此河长一千一百四十六哩，为亚洲大河之一，发源于阿拉伯半岛阿美尼亚大丛山，亦可谓出阿拉拉特之东北群山，引而东南流，经过尼尼微等大城，一

路沟渠无数，灌溉处皆为沃壤，东南入波斯湾而达阿拉伯海。伊甸第四道伯拉河即幼发拉底斯河也。幼发拉底斯河，发源于阿美尼亚丛山，其源近阿柴（Arze），近代则曰奥柴龙（Erzeroum），在阿拉拉特之西北。初为甚细之泉源，流而向东，遇喀巴图亚山（Coppadocia）阻其道，折而南流。会自阿拉拉特山南部流来之大河曰阿刹尼亚斯（Arsanias）者，又纳玛纳特河（Mannert）遂成洪川。一路所入运河亦无数，最后与替格里斯相合而入波斯湾，以达阿拉伯海。河长一千七百八十哩，比替格里斯尤长。

希腊人名此河曰佛拉特（Phrat），义犹云土地肥沃，产殖丰硕也。希伯来人则名曰伯拉（Perath）（即《创世纪》第四道伯拉河），波斯人则称之为幼佛拉透（Ufratu），或西里阿克（Syriac），或奥发拉特（Ephrat），或幼拉特（Eurath）。

我国古人，谓黄河之源为二，其源指罗布泊所注之塔里木河也。然塔里木河之源实四（酈道元《水经注》谓为三源，已纠正其误），故深滋后世疑议，然若知彼等所闻者实为西亚幼河，则涣然释矣。幼河确有二大源，一曰卡刺特（Karath），一曰慕刺特（Mureth）。黄河并不出昆仑，而幼河则确出阿拉拉特之东北隅。《尔雅·释水》谓河并一千七百渠。黄河在战国时，虽有沟渠，恐不如此之多，而幼河则运河纵横如织。《山海经》曰：“河水……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淮南地形训》：“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可见此河出海以后，始入积石，两书之言，非常明白。但中国黄河则先入积石，后乃入渤海，与两书之言正相反。《山海经》亦有两积石。《西山经》第二：“又西（轩辕丘西也，距西王母玉山七百八十里）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海外北经》第八：“博文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文。禹所导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二积石一在国中，河水冒以西流，一在海外，为禹所导，河之所入。则二积石截然不同，于此可见。中国大小积石之辩，始于魏王泰，然中国地理上，确有两积石。《山海经》今多佚文，但初入中国时，疑有两积石之明文，故中国人受其暗示而仿置焉。西经所言轩辕丘西之积石，当是西亚之小积石山，距阿美尼亚丛山不远。北经所言河水所入之积石，当是西亚之大积石山。河水贯渤海，即阿拉伯（Arab）海也。

“渤”与rab盖为甚切之对音矣。出此海外，即西而北，始入禹所导积石山，则此积石山当在印度洋中。惜聂耳、博文、邓林之所在，皆恍惚难明，不然，固不难考得其处耳。

替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斯今日同流入波斯湾，再流入阿拉伯海，但古时两河各有其入海之道。

第一道河比逊，《创世纪》谓其环绕哈腓拉全境。《圣经》学者不知哈腓拉为何地，故亦不知比逊究为何水？有以哈腓拉系在波斯湾以东者，有以系靠近里海西岸之地者。笔者则以比逊河当是流入黑海之大水，在《山海经》、《淮南子》书中名之曰洋水，又曰黑水，又曰敦薨之水。注入黑海有两大河，一名吉瑞尔伊拉马克（KigilIrarak）；一曰萨卡耶（Sakarya），而吉瑞尔河较长，其发源亦较近阿拉拉特，以此河为黑水，比萨河为合理。笔者尚有一证焉。前文曾言，中世纪时意大利天主教教士马黎诺

里游于印度，闻地堂之说。所谓地堂即伊甸园，印度人谓伊甸园在锡兰岛之东名曰科伦白姆（其发音宛与昆仑相近，已见本书《海外之昆仑》条），其间流出之水，其名与《创世纪》一一吻合。至其言第二河（《创世纪》为第一河）曰肥逊（Phison），流经印度，环绕爱威拉克（Eviloch）全境，抵契丹（中国之谓）境，河乃名喀兰摩兰（Caranoran）义犹黑河也。马氏肥逊原文Phison，与《创世纪》比逊原文Pison仅一字母之差，印人名之为黑河，岂非《山经》、《淮南》之黑水（洋水）哉？然马氏又谓此河流至喀发（Caffa）对岸，没于沙中，后乃再出，过塔纳（Thann）而瀦于巴库海（Sea of Bacu）云云。巴库海乃里海也，设黑河流抵契丹（中国）为黄河，又流至喀发、塔纳，而瀦于里海，则黄河居然又由东向西回流矣，有是理乎？或将曰此则是矣，《创世纪》所言黄金、珍珠、玛瑙之事又如何？曰前文因曾举《山经》沃民之国有璇瑰、瑶碧、琅玕（3）、榘（3）、嗟（3）、啍（3）、鋹（3）、端迨、楞、饕蛇、芬、噤、忒波斯以产真珠、颇黎、珊瑚、玛瑙、水精、金银、铜铁并大鸟卵，盖里海、黑海、地中海一带古时皆然。或古时黑海一带所产更丰，故《创世纪》加以特举。

《创世纪》第二道基训河，究为地理上何水？则今日最渊博之《圣经》学者，亦莫能解答矣。马黎诺里游记，有一段关于此河之语。其言曰：“吉昂河（Gyon）环绕依梯俄皮亚洲（Ethiopia即非洲），洲中居民皆为黑种……埃及国之尼罗河相传与此水相通，中隔阿拔斯梯（Abastry即今日阿比西尼亚）一带之地云云（同上书）。按苏彝士运河未凿通以前，非洲与阿拉伯半岛，原自相连，然未闻半岛西部有何大河流入非洲，环绕非洲东岸之全部，并牵至阿比西尼亚，果如此，则此河非长万里不可。且马氏地堂四水全同《创世纪》，又谓幼、替二河，构成两河流域，曰“米索博达米亚”，并列举尼尼微、巴比伦各大城市，谓皆二河之所经，则其地固为阿拉伯半岛矣。乃又谓地堂在印度锡兰岛东之科伦白姆，距锡兰不过四十里，水流之声，锡兰岛居民闻之了了。竟不知此四水如何流法？除非地堂真在月球中耳。印度接受基督教甚早，将伊甸园强移至锡兰岛东，马氏又不仔细考察，遂有此种荒谬可笑之记载。张星 YR 先生已痛驳之。故其所言基训河流至非洲，似亦不必重视。

但《旧约》“古实”本指非洲黑人国，前文已举例以明，错误亦不始自马氏。但“古实”有两解，一指非洲东岸，一指阿拉伯半岛南部沿红海边之一带。《旧约·民数记》（Numbers）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者古实女子为妻，就毁谤他。”古实又转音为古他。《列王纪》（Kings）第十七章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迁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圣经》学者谓：此之古实与古他，所指实半岛西南红海边一国，名曰古珊（Cushan），非非洲也。如此，则《创世纪》之基训河仍在半岛境内，于事理较合。

笔者主张《创世纪》第二道河基训乃阿拉斯河（Araxes）也，亦发源于阿美尼亚高原之北部丛山，其源有二，其一在阿拉拉特之西，绕过其前，其一在阿拉拉特山之北，东流曲折而北，迎北来之库拉（Kura）回而南趋，卒入里海。

或者又将问，然则《创世纪》古实问题奈何？曰此则不知，特谓为红海边古珊，亦未必。或古时里海一带多黑人耶？《圣经》古实一语亦未必指

非洲，前文已言。

《创世纪》四河顺序系自北起，历东南至西而止，即北——吉瑞尔河；东——阿拉斯河；南——替格里斯河；西——幼发拉底斯河。

前引《山海经·西山经》第二，四河排列顺序与《创世纪》正相反，乃反时钟方向，乃系从西算起，即西——河水；南——赤水；东——洋水（当是青水之误）；北——黑水。

《淮南·地形训》四河顺序同，即西——河水；南——赤水；东——弱水；北——洋水。

余以前曾作一假设，谓《山经》弱水常与青水相连，洋水常与黑水相连，知弱与青为一水，洋与黑亦系一水。弱、洋乃河本名，青、黑则河别号，乃注文之误为本文者也。《淮南·地形训》帝之四神泉，叙述明白，而赤水之东曰弱水，斯足证矣。设以弱、洋为二水，则昆仑有六水矣。安得曰“帝之四神泉”？

至环绕昆仑之弱水则指大瀛海。昆仑代表大地，弱水犹死水，言瀛海难济。弱水三千亦同，与此异。至前引《山经·海内西经》第十一，四河顺序则自南算起，至东而止。即南——赤水；西——河水；北——黑水；东——青水。四水排列之顺序，无论顺起算，逆起算，或从中间起算，青赤白黑之四色，必与东南西北之四方相符，若谓其非同出一源，其谁能信？

以上《山经》、《淮南》所言皆为西亚地理上之水道，至于中国实际地理，夏商前苏末之一支迁来中国，以山东半岛为根据地，虽将泰山当作世界大山，黄河当作幼河，而黄河自大陆西部流来，其源极远，决不能附会其策源于泰山，唯有姑置。印度恒河最大而长，久视为圣河，无奈恒河源出西藏冈底斯至印度东面入海，地理形势如此，无论如何不能强改，故《华严经义》，《长阿含经》及《大唐西域记》皆直言其为东，其他三河所流之方向皆与我国《山经》、《淮南》异。

印度亦有五色河说，想其颜色已不能代表方向矣。

至希腊地下之四河，回教天国之四河，均未言及如何流法，只有不论。

现请将四水颜色，再为一论，以颜色代表五行，亦西亚人首创，七星坛之色余已有介绍。颜色又象征春夏秋冬四时，东南西北方向。今请再言四水之颜色。余于两河流域地理不熟，未知其河流颜色究竟如何，我国黄河作黄色，长江水色亦殊混浊，凡长大河流经历之地多，多夹泥沙杂质，固难求其莹澈也。闻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两大河系作咖啡色，度其他河流亦然。乃《山经》竟有青水、赤水、黑水之名。印度阿耨达山乃西亚阿拉拉山即世界大山之翻版，宋陈善《扞虱新话》谓：“昆仑即须弥，亦即阿耨达，彼中又名之为雪山。有四天下，东弗子伐，西瞿耶波，南阎浮提，北郁单越，雪山在中天竺国，正当南阎浮提之中。

山最高，顶有池，名阿耨达池。池中有水，号八功德水，分派而有青黄赤白之异色，今黄河盖其一派也。”陈氏喜览佛书，其言必有所本。“黄”之一色，疑其涉黄河而误，佛经或为黑色。

昆仑传至我国，四水亦随之而来。凡昆仑所在处，赤水、黑水纷扰不已，已见前文。今言半岛水道，请按《创世纪》四河排列之顺序更言之。

（1）黑水黑水为北方之水，以其地为幽都所在，而幽都之色本为黑。《海内经》第十八：“北海之内，有山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又曰“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

之国，有赤胫之民。”《河图始开图》曰：“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按北海，即黑海也。其位置在半岛北。有数大河注入，其中以吉瑞尔河为长。当以吉河为代表。（2）青水为东方之水。阿拉斯河注入半岛东部之里海。（3）赤水为南方之水。《创世纪》言明其在亚述之东，即替格里斯也。替河与幼发拉底斯两河古时各有其入海之道，前文已言。《山海经·西山经》言赤水注于汜天之水，《海内西经》则言注于南海炎火东。《淮南·地形训》则言赤水南注南海丹泽东。余曾在某外文书上见替河所注之海有红赤色字样，则替河必为赤水矣。

（4）白水白水即幼发拉底斯河也。《创世纪》称之为伯拉河，已见前。《淮南·地形训》：“疏圃之池是谓丹水，饮之不死。”王念孙云：“丹水本作白水，此后人妄改之也……《楚辞·离骚》‘朝吾济于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文选·思立赋》“斟白水以为浆”，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览·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则旧本皆作白水明矣。”洪兴祖引《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也。”洪氏注《九歌·河伯》章曰：“授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河。’《山海经》云：‘昆仑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其东北隅，屈而东南流，为中国河。’”今本《山海经》无“白水”“白河”字样，宋时则尚有之，可见《山经》散佚之多。古人指河为誓，曰：“有如白水！”黄河色本黄，今曰白水，则其指神话的河可见。西亚幼河色如咖啡，亦曰白水，盖白者西方之色也，实际河色，在所不拘。

余按埃及巴比伦神话“生命草”以外，均有“生命水”，饮之永生。印度人之“不死甘露”，殆混合生命草及生命水而成者。《新约·启示录》（Revelation）第二十二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疑此语与西亚河之传说有关。希伯来文化固受两河流域之影响者也。既曰“明亮如水晶”，则此水色白无疑。

余前固曾疑“潜流”“重源”之说皆创自古西亚人。前人竟谓中国黄河源于黑海，斯真奇事也（《山经》既为西亚地理书，则所言“河”者乃彼中圣河也，但古人竟误为中国黄河）。《山海经·西山经》第二：“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宗之山，东望之幼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北海经》第三：“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枏，其下多茝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于之幼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史记》、《汉书》皆言于阗大河入盐泽，并言其西域之名为蒲昌海，但未曾言盐泽即《山海经》之之幼泽。混二者而一之者，殆始自郭璞。璞注《西山经》第二：此条文字有云：“河南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出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流，注之幼泽，已复潜行南出于积石山而为中国河也。之幼泽，即蒲泽，一名蒲昌海，广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去玉门关三百余里，即河之重源，所谓潜行也。”

郭注除加“之幼泽即蒲泽，一名蒲昌海”二句外，其余皆袭自《汉书·西域传》。故知此注并无任何新资料，足资其根据，然则之幼泽即蒲昌海，乃郭璞之臆说耳。彼轻轻一笔，竟扭之幼泽与盐泽而一之。酈道元注《水经》，又采其说云“河水又东注于之幼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从此之幼泽成为

罗布泊之别名，至今言地理者，尚无不宗其说焉。

笔者谓𡿨幼泽即黑海也。中国古有黝字，孟子有北宫黝之名。《尔雅·释器》：“黑谓之黝。”《释宫》：“地谓之黝”，注：“黑饰地也”，疏：“以白饰墙谓之垩，以黑饰地谓之黝，《周礼·守祧职》云：其祧，则祧守黝垩之是也”

（阮刻《十三经注疏》）。《周礼·夏官·牧人》“附祀用黝牲”，注：“读若幽，黑也。阴祀祭地，北郊乃社稷也。”《说文》于黝字，亦云“微青黑色”。𡿨幼字则最初见于《山海经》，郭璞注《西山经》第二，𡿨幼山之𡿨幼云“𡿨幼音𡿨幼黑之黝。”余于是知我国古人本译黑海为“黝海。”特《山海经》虽为两河流域正式地理书，而译笔则异常拙劣，恐有牟利之商人，浅学之方士，参与译事。“𡿨幼”者乃译书人所写“黝”之别字耳，不然，则当时之简笔字。《说文》于此字但言“泽在昆仑之下，”至《唐韵》、《集韵》始注其音为“于纠切，音黝，水黑色也，”皆后起之音义。

故知𡿨幼字不见他古书，乃《山海经》译人所特创者。古人谓黄河源于黑海，自幼发拉底斯变为西亚圣河后，殆亦谓其发源黑海。所以然者，殆以生命水故。余按西亚神话女神易士塔儿情人旦缪子（Tammuz）遭不幸而死。易士塔儿上穷碧落下黄泉，求所谓“生命水”（Water of Life）者，以返其夫之魂。闻此水在幽都（Nether），为女神亚兰豆（Allatu）所主。乃下冥界以乞之，而为亚兰豆所囚，受尽挫辱，几至不免。太阳神侠马修闻之，帅诸天神问罪幽都，威胁亚兰豆将易士塔儿释放。亚不得已，乃出女神于地狱，还其冠冕珠饰衣裳，登之黄金宝座而沃以生命水，且任其费水去，救旦缪子而活云。埃及女神埃西奔走大地，而觅其夫奥赛里斯之尸，亦曾探访地狱与此殆为同源。

意大利教士马黎诺里旅印度而得锡兰岛东地堂之说，前文已屡言之矣。地堂，其黑河流至契丹，即中国。《大唐西域记》亦言香山太仙池，分东南西北流出四大河，其北方流出之徙多河，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中国河源。徙多河即黑河也。河源即我国黄河之源也（洪兴祖引《河图》及所见《山海经》佚文白水入中国为河，恐中国人所改。彼等能知黄河代表之色为白，已难得矣）。吉河流入黑海后，再东潜万里而为中国黄河，凡我中国人闻此说后，对于西亚之吉河安能不产生其极深之情感耶！

古两河之人不但信河水能潜行地底，且信其能潜行海中，如河出渤海而后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则入南海而穷于汜天之山，黑水则穷于不姜之山（《大荒南经》第十五），青水则穷于丽涂之山（同上）。度此类大山皆在大洋之中，距离各河出海口处不知其几千里，而河流海中，居然能保持原来状况，一波不乱，而各归其应归之山。此种地理观念，宁非奇异之极？

吾意山脉与地脉观念，亦肇自两河。惜今《山海经》尚无可考尔。

回敬之天园亦伊甸之衍化也。《古兰经》形容天园，辄有“诸河流在其下”之语。全经屡见不一。则与“潜流”之说不能无关。又回教天园河流之数似亦为四。《古兰经》卷二十六第四十七章：“天园的情形……内有常久不浊的‘水河’，滋味不变的‘乳河’，在饮者感觉味美的‘酒河’和清澈的‘蜜河’，他们在那里享受各项果实，并蒙其养主的饶恕。”希腊奥林匹司山无河可以附会，遂将四水安置于冥界：一曰司蒂克斯（Styx），此河为诸神所敬惮，凡起誓必用之，指河为誓之后，无论如何，不能翻悔。中国人亦有指河为誓之事，印度则指恒河，似为同一渊源。二曰Acheron，为“悲苦之河”（River of Woe），支流甚多。三曰Phlegeth

on, 为“火河”。四曰Gocythus, 为“哭河”(River of Wailing)。

然则诸地之实际昆仑果皆仅有四支大水欤？我中国仿制之昆仑在西域者即有于阗南山、巴颜喀喇、冈底斯，所有之水大小皆不止四数；印度有六大水（见前引《释氏西域记》），即昆仑正身所在之西亚大河亦不止四，强名之为四者，不过以代表东南西北之方向耳。兼地理乃天然的，各种文化观念乃人为的。人为与天然岂能完全合拍？只有勉强扭捏以言之而已矣。四水发源未必皆出阿拉拉特，但彼中国有潜流学说为之解决，不必深究，而四大水果皆入海则不误。余坚主《山海经》乃西亚古地理书，不其可信哉？

六昆仑与中国

我国自称“中国”，盖闭关时代，本部与四裔相对待之名词。顾此语亦受两河文化影响。今日西亚楔形文字发现于地底者，尚不见自称其国为“中国”之语。然观乎昆仑号为地中央，及冀州齐州之号为中国，吾知“中国”一词亦来自西亚矣。今请观《淮南·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河图·括地象》：

“地中央曰昆仑……”

“昆仑之墟下洞，含有赤县之州，是为中则。”

“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昆仑居地之中，其势四下，名山大川，皆有气相承接。”“昆仑地之中也，其外有五色弱水，横绕三千里，深十三寻。”

次则请究“冀州”、“齐州”。中国所谓九州者，自《禹贡》（宋王应麟《玉海》，古帝如伏羲等亦有分州之说，当然不足取）。禹所分者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尔雅·释地》，则为冀、豫、雝、荆、扬、兖、徐、幽、营等九州。《周礼·夏官·司马》所分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等九州。此三书皆中国之经书，代表正统文化者也，而其所记九州之名，便已不能一致。然此尚可推诿为夏商周三代制度有异，故州名亦不同。至《淮南·地形训》及纬书之九州，名目与经书亦有参差。《地形训》：“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吉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河图·括地象》：

“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吉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信土。”今但论冀州。《周礼·职方氏》“河内曰冀州”，孔安国曰：“舜分冀州之城为幽州、并州。”孔颖达曰：“据职方氏，幽、并山川皆冀州之城，故安国知之。”冀州为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黄河以北之地。《尔

雅·释地》“两河之间为冀州。”而中国古时冀州实在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三河以内，与《尔雅》不符。毛晃解之曰：“案《禹贡》导河积石，自积石而下南河谓之西河，至于华阴，折而东，经底柱山，又东径孟津，东过洛水以北，皆东流，谓之南河。至于大怀山，折而北流，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谓之东河。《尔雅》言两河者，举其二，则三可知也”（《禹贡指南》卷一）。

又有为望文生义之解者。《晋书·地理志》：“《春秋玄命苞》云：‘昂毕散为冀州。’”

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释名》：“冀州地有险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也。”杜牧《罪言》，“《禹贡》九土，一曰冀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重十一二。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弱，冀其复强大，因以为名。”此种缭绕曲折之解释，乃吾国文人惯技，实不足道。

吾人须知《淮南》与《括地象》所言者乃邹衍之大九州也，观其与东南神州对举便可了然。彼之冀州与《尔雅》、《禹贡》小九州之冀州本非一地，何能强合？《淮南》、《括地象》皆有“正中为冀州”之语不容忽视。高诱注《淮南》此语云：“冀州，大也，四方之主。”宋均注《括地象》此语云：“冀州，昆仑之山也”（疑原语为“昆仑山之所在也”）。郭璞注《尔雅》“两河之间为冀州”，曰：“自东河至于西河。”诸人或为汉人，或为魏晋六朝人，彼时纬书及道术之类，尚未尽灭，其语必有所本。郭璞所谓自东河至西河中间为冀，谓其非指东之替格里斯，西之幼发拉底斯中间之米索博达米亚（Mesopotamia）而言，岂尚有他哉！屈原《九歌·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楚怀王大祭诸神以祈胜秦，屈原为作祭歌。楚国之地，战国时，当《禹贡》扬荆诸州，不及冀州。今屈原舍眼下风光之荆扬，而使神远览河北之地，亦殊可怪。前人虽有种种曲解，余皆不取。余以为云中君亦是西亚传来之神，为屈原根据外来神话而创作。“冀州”一语乃屈原无意留于歌中者，观其与四海对举成文，知歌中冀州，实指中国，乃西亚人所自命之中国。

《淮南·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高诱注“冀九州中，今谓四海之内”，不失为佳注。盖古人言洪水之祸，遍及中国，女娲所济者，不应独为区区河北之地，则此冀州者又实指全中国而言，特非吾曹之中国耳。

道家书除冀州指中国外，齐州所指亦然。《列子》书中，此例尤夥：

《黄帝第二》：“黄帝……游于华胥氏之国，在吉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张湛注：离也）齐（张湛注：中也）国几千万里也。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周穆王第三》：“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汤问第五》：“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张湛注：齐，中也。）

《杨朱第七》：“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籍其先贤，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所产育者，无不致之。犹藩墙之物也。”以四海与齐对举，可见齐为中国。按端木叔为卫国人，不言卫土而言齐土，又以齐土与殊方偏国对举，可见乃指中国而言。

《尔雅·释言》：“殷，齐，中也。”《释地》“九夷、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

日所入为大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四极。”以齐州为地理中心，而推论四海四极，则此齐州者，果为何地耶？《尔雅疏》“齐州”二字，则曰“齐，中也。中州为齐州，中州犹言中国也。”唐李贺《梦天》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此齐州则为邹衍之大九州矣。此乃唐人之误，大九州不能总名齐州也。若谓为中国之小九州，则中国九州本系连接之大陆地，安得为九点烟形？

观《淮南·地形训》言东南神州曰农土，《括地象》则谓为晨土，形近而讹而已。邹衍谓中国曰赤县神州，则此农土者，必中国矣（全部），乃又以冀州为中国，其安可哉？余谓“冀”、“齐”音近，当系一音之转，且为西亚人指其建国地点而言者。所指当即是两河流域之美索博达米亚。

夫亚洲文化固以两河流域为最古，当全世界尚在草昧未开之际，而苏末文化已高，巴比伦、亚述诸国继起，其天文、历法、诗歌、美术，已灿烂光华，尤盛极一时。且名王辈出，武功亦极辉煌，属地之广，史家谓其几遍全亚，其王每自称为“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则其侈然自负其国中阿拉拉特山处大地之中；且自负其建国地两河流域为九州正中之一州，亦人情之常耳，易足为怪？

回教源于阿拉伯半岛，其承继之文化亦与两河有关，故亦称回教策源地之天方为大地之正中。刘智《天方典礼择要·原教》篇谓真宰“造人祖于天方，降圣贤于中极”，自为解曰：“中极，天方之地也。天方处六合之极中，故命曰中极，乃圣贤丛会之地，人民首出之乡。”又自为考证云：“《天方輿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相合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面自东至西，分为三大土，东曰东土，在西曰西土，东西之间，则中土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两极等，为地经中线，自北极至南极，作一横线，距东西海岸等，为地纬中线，两线相交为十字形，天方当其十字交处。西谚曰：大地如磨盘，天方盘之脐也。其形四面皆下，因其地为天地之枢纽，故万方引向焉。”

希伯来民族亦谓耶露撒冷为世界中心。但丁《神曲》言之极详。大概主张地为圆形，居天体正中。自东至西画一横线，剖地球为南北二部分：北部为陆地世界，南部为海洋世界。

自魔鬼领袖露齐弗尔反叛上帝，被驱出天庭，摔于地上。魔头穿南半球而入，而达于北半球。但为地心吸力所牵，至地之中心不再进，上半身在北半球，下半身在南半球，其脐恰当南北分界线之正中。耶露撒冷在魔鬼所居之地狱顶上，《神曲》屡言此事，不一而足。虽耶露撒冷在魔鬼顶上，不在其脐，然以魔脐为南北分界则亦疑其沿袭古代以地球之中心称为脐之观念。但丁《神曲》对于地球之界说，与传统神学已略有出入，庸讎知传统神学不言耶露撒冷恰位置于魔脐哉？希腊人则谓阿坡罗预言圣坛所在地迭尔腓（Delphi）为世界中心。神殿中有大圆石称为Omphalos，译为“脐”，意即大地之脐（Navel of the Earth）也。印度古时称Benares为圣城，谓其处大地正中，为“世界之脐”。南太平洋复活岛，弹丸黑子地耳，乃古来自称为“世界之脐”。秘鲁古印加帝国之象形文字，亦自号其国为大地脐焉。

中国古代对于冀州之“冀”字有若干望文生义之解释，而于齐州之“齐”字，则解释较确。《伏生尚书大传》，言璇机玉衡，以齐七政曰：“齐，中也。”马融注《尚书》亦有此语。张湛《列子注》，邢昺《尔雅疏》，于齐州之齐，

一则曰：“中也。”一则曰：“犹中国也。”固不失为佳注，然犹以未能道出所以为恨。清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言》第二，于“殷、齐、中也”引《玉篇》云：“中者，半也。《丧服小记》注：‘中，犹间也。’”隐有齐（脐）居人体之半，及中间之义，而亦惜其未彻。惟《史记·封禅书》“始皇祠天主于天齐”曰：“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苏林曰：“当天中央齐。”索隐曰：“顾氏案：解道彪《齐记》云，‘临前城南有天齐，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脐也。’”而后乃将齐字真义完全达出矣。盖古时文字简单，腹脐之脐，作齐。《左传》“后君噬齐”，犹言“噬脐”也。泰山古名天中，言其居天下之中，是则泰山在古时盖亦居于昆仑地位。中国、希腊、印度、希伯来、阿拉伯、古南美洲，均以其宗教策源地，大神圣坛，政治中心之京都为世界中心，且不约而同均有“脐”之一语。天下无心暗合之事，固亦不鲜，而此种情形，则实堪奇诧。

此世界中心之观念由阿拉伯半岛而传于全世界。除希腊之外又有中国、印度焉。今请先言印度。印度称其苏迷卢为器世界之中心，而印度摩揭陀（Magadha）以文化较高，国威较盛之故，亦自称为中国。东汉时牟融已知此说。其《理惑论》有云：“佛……所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土未必为天中也。”（《弘明集》）

吴孙权时，遣使康泰等使扶南，见其王范旃，具问天竺风俗，返国作《扶南传》，今佚。赖《水经注》等常引其文，故今日尚得知其梗概。《水经注》卷一引《扶南传》：“昔范旃时，有**d* 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人到天竺，辗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其所欲。左右天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几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往还可三年，逾行及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

《梁书》卷五十四：

“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嘉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使人苏物使其国……其后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流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奢侈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百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

《南史》卷七十八，关于天竺一节，所语略同，想均从康泰《扶南传》采摘而来。所言之国，皆摩揭陀也。《水经注》卷一又引竺（印度也）法维之言曰：“迦维卫国，佛所生天竺国也。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是则又以释迦牟尼所生之国度为天地中央矣。

总之，当时印度各国，皆自名为中国，而摩揭陀则尤为“中国中之中国”焉。盖摩揭陀地势本在印度中央。阿输迦王（Asoka）于纪元前三世纪顷大张国威于全印，其首都华氏城（即《大唐西域记》之波吒厘子城 Pataliput্রে）成为政治文化中心。阿输迦又为佛教大护法，声名洋溢，远及万国，中国人不言印度则已，言则无不首及此国者。

晋法显《佛国记》可觐一斑：

“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甚盛。过河，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

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需，待之如法。”

“法显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夷，其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定处，怆然心悲。众僧出问显道言：汝从何自来？答云：汉地来。众僧叹曰：善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到此！”“南下一由延，到摩揭提国（即摩揭陀），巴连弗邑（即波吒厘子城）。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庶，竞行仁义……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得至佛所，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顺恒水东下……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此中国指印度摩揭提）停六年，还三年。”

晋时中国佛教本甚幼稚，法显游佛教母邦，得接其学人，读其经典，事事皆胜于中华，因而瘖然自失，而生出一种“自卑心理”，情亦可原。惟印度僧人，不问中国全盘文化如何，惟以佛教为标准，居然以中国自居，动辄以我国为“边地”，为“边夷”，见有求法往其国者，叹息以为难得。彼时印度人之视我国，竟不啻我国人今日之视非洲黑人、美洲红人。印僧之夜郎自大，亦可晒已！

六朝时喧腾于学术坛坫，有所谓夷夏之论者。中国学者鄙佛教为夷狄之教，佛教徒则谓印度实乃真正之中国，而中华反为边疆。前者如顾道士所作《夷夏论》，后者则为驳论，皆见《弘明集》。如宋释僧愍作《戎华论》以抑顾云：“君言夷夏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戎华者东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都，北则吊于溟表，南则极乎牢閼。如来扇化中土，故有戎华之异也。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又宋释慧通驳顾云：

“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自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肃，五教之齐严。”

诸如此类言论，六朝时实不胜其多。直至唐时犹有此说。《大唐西域记》卷一：“索河世界（原注，旧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诃世界）三千大千国土，为一佛之化摄也。今一日月所照临四天下者，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诸佛世尊皆于此垂化。现在现灭，导圣导凡。”

我国之自称“中国”不知起于何时，我国古时对外自称为夏，为华。《论语》：“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荀子》：“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夏。”《左传·襄公十四年》传：“戎子驹子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定公十年》传：“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昭公十三年》传：“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帝国，夏、秦、汉、唐是也。后虽亡灭，而其名深印于外国人脑海，历久不忘，每以呼易代后之中国人，中国人亦即用以自名。

如今美国尚有“唐人街”，华侨回国曰“回唐山”，而我民族至今自命汉族。汉时诸外国称中国为秦，或谓China一字，亦由秦字之转。则春秋战国时，我族尚自称为夏，为诸夏，宜矣。至于华者，或谓乃夏字之音转。然《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声子曰：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华夏连用，则音转之说殆有不可通者。证以《左传·定公十年》传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二语，裔为边地，夏则指中原，夷为蛮族，华则文明开化之

族矣。

商人对外自称为“我”，如卜辞“贞勿合我更步”、“（侵）我图（鄙）田”“土方 我田十人”皆其例。周人自称为“王国”，《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或称“有周”，《大雅·YA 民》：“天监有周，昭假于下。”或即自称为“周”，《周颂·维清》：“迄用有成，维周之桢。”《左传·隐公六年》传“我周之东迁”。对外自称亦常为“我”，《大雅·召瘳》：“我居圉卒荒。”《大雅·皇矣》：“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但对外又自称为“中国”，如：《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逯。”“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颁榜于中国，斂怨以为德。”“内 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或谓中国，乃国中之意，非谓中原全部。且《民劳》有“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语，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语气相同，更可知中国二字不过指帝都而言。但商、周称本国以外之国家皆曰“方”，今以“四方”、“鬼方”与“中国”对举，其以本族根据地为中国，意识甚为显明。《左传·昭公元年》传：“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祐机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咨也！”《诗经》与《左传》尚无作伪证据，而其中居然有“中国”一词，是可见中国一词，传入我国甚早。

至战国之世，“中国”一词，其用始更普遍。细析其作用，凡有三种。第一种指中原，即夏商周三代政治活动之中心地，黄河流域是也。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兽蹄鸟**之迹交于中国。”

《滕文公上》：“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

第二种指齐鲁等文化先进国家，秦楚不得与焉。如：《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莫之或先也。”《离娄下》：“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第三种指与外国相对待之中国本部而言，如：《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史记·孟荀列传》：“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除居八十一分之中国，指齐国外，赤县神州之中国，则指中国全部国土。《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貉。”所指亦为中国全部国土。

日本古时，亦有天孙族降居苇原中国，而为之主之说。日本以山阳为中国。其观念殆皆得自我中华，惟为时当甚早耳。较此范围更广者，则有“四海”、“天下”二词。《诗经》中多“四方”、“四国”之语，亦有“四海”字样，如《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亦有“天下”一词，如《大雅·皇矣》：“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凡在天之所覆之土地，皆可名天下，故诗曰：“普天下之，莫非王土。”此种观念，可以自然产生，不须外来启示。至于“四海”则非有来源不可。盖中国乃大陆民族，活动于黄河流域，尧舜夏商时代，或曾与海外有所交通，然所知者不过中国东部之太平洋，南部之印度洋，名之曰“东海”、“南海”，

至于北海、西海，则中国民族足迹，从未曾涉及，何以竟有“四海”一词，见之中国载记乎？印度民族亦好言四海，如四大海水纳之毛孔，摄取四大海水等等，与中国皆有所受而然。所受者何，则古两河流域也。

《山海经》山经分为五，而海则四，为东西南北四部分，非其明徵欤？

战国以前，中国载记之有四海诸词，乃由西亚辗转传来，运用颇觉生涩。至战国时，外来学术大量输入，而“天下”、“四海”亦遂成为中国人之口头禅。以孟子为例，则如《公孙丑下》：“夫天不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滕文公上》：“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欤？……天下之通义也。……天下犹未平……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离娄上》：“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其他子书，证例从略。

我国历代人自称，皆以国号，如汉也，如唐也，明也，清也皆是。即与外国相对待，虽常用中国二字，但仍以国号为多。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史书之文大率类是。及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更国号曰“中华民国”，且日与世界万国相接触，自我意识非常觉醒，而后“中国”之观念乃开始明朗化焉。西人每谓地球本属圆形，无处不可为大地中心，即无国不可为中国，何中华独自号以此？彼又安知“中国”一词，渊源之古，及其所涵之深邪？今两河流域文化久沦地底，种族亦凋零渐灭。印度凌夷非一日，更无中国之称。独我中华文化种族，依然无恙，绳绳继继，四千余年，犹能保存此古色古香，光荣无比之国号，吾人又安能不引为自傲，而永永宝爱拥护之哉？

馀论

夫昆仑为世界大谜，数千年于兹。余此区区考证，安敢自命已得昆仑底蕴，亦不过发其端绪，期与海内外学者共相商榷而已。余尝谓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均是一篇糊涂账。古史方面，已有某某先生等工作多年，路线异常正确，成绩亦极其彪炳，余今日敢为此学术界之探险者，盖诸先生实导夫我之先路也。惟窃以为伏羲、女娲、虞舜、夏禹及夫黄帝、共工诸人根源，似不能完全索之故纸堆，若觅之于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印度、希腊古史与神话，必有惊人之发现，而我国古史整理之成功，亦可提早若干年代。一得之愚，未知整理古史者以为如何？地理方面，则《尚书》、《禹贡》，必系战国儒家删削外国传入之禹本纪传合以中国地理而成。渤海、积石、黑水、弱水等地名，必皆彼时始有；且恐尚有无数量山水名目皆缘《山海经》而生。若有地理学者，于古籍中考证中国地名发生之先后，则或可证实余之此言。若更就《山海经》而考证古两河流域地理，则亦必有重大之收获以贡献于世界焉。故以夏禹为中心，而中国古史问题可以解决。以昆仑为中心，而中国古代地理及中外交通史问题可以重新估定。以屈原《九歌》、《天问》为中心，

而中国天文、地理、历法、神话及战国整个学术史问题亦可迎刃而解。三者并合之结论，首要者为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次要者证明为“中国古史混有外来神话及历史之成份”，及“战国学术思潮乃外来文化刺激所产生”，由是则先秦史地与文化史皆将全部改观，其关系岂不诚重且大哉！

余兹于昆仑问题，议论暂止于此，愿就今日中国普通地理图书所谓“昆仑山脉”者，更一饶舌焉。今日初中学生略习地理者，叩以昆仑，亦能就地图检取新疆西藏间昆仑山脉以对，且谓全国诸山均发源昆仑，昆仑实为中国山祖云云。再考普通地理辞典及坊刊地图，则作此论调者比比皆然。有谓昆仑分中东西三支，其山脉之所延绵，不但括尽全国诸山，且渡海而为舟山群岛，为台湾，为日本。有谓昆仑分阴山、北岭、南岭、句漏四大山脉，亦将全国名山，尽隶属于昆仑系统。是盖由于历古相传“昆仑为地中央”、“昆仑为山首”之神话而来，实为一种地理之迷信，不可不辩。

中国人往时虽不知昆仑究为何山，但坚信其在西北。虽无“山脉”之专词，而有山脉之观念。“三条四列”之说谓出《禹贡》（《禹贡》实无此明文，乃后人附会《禹贡》而起），其说殆甚早。唐开元间僧一行倡“山河两戒”之说（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山脉之观念乃更明了。唐益《松筠龙经》之歌曰：“昆仑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心为巨物；如人骨脊与项梁，生出四支龙突兀。四支分出四世界，南北东西为四脉，西北崆峒数万程，东入三韩陷冥查；惟有南龙入中国，分宗孕祖来奇特。”（《正觉楼丛书》）至明王士珍遂衍为“昆仑三龙”之说，谓昆仑据地之中，四旁丛山各入大荒，入中国者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为三支，名为北龙、中龙、南龙。亦以全国名山归之昆仑一系（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固主葱岭即为昆仑，遂倡“葱岭三千”之说（见《小方壶地理丛书》，魏源《葱岭三千考》）。唐人之说，多杂以天星分野之说及堪舆家言。明人惟言山脉而已，清人条理更为明晰。惟分别山脉，皆以分水线为重要根据，今日中国中小学校采为教科书之地图，大略皆沿袭此说。

所谓“昆仑山脉”四字实乃外国地质学者代我所撰，此人即十九世纪初德国地质学家洪博德（Avon Humboldt）也。彼分亚洲山脉为四大山系，一曰阿尔泰山系，二曰天山系，三曰昆仑山系；四曰喜马拉雅山系。盖十七八九世纪西洋地理家言中国地理者，多根据中国地理书，震于昆仑之大名，不敢不为其留一位置。且按武帝定于阆某山为昆仑，彼中人士亦复耳熟能详，故惟有自新疆南部丛山，割取一段，强名之为“昆仑山脉”，顾自此而后，西洋谈中国山脉者，亦不敢竟遗昆仑。中国现代地图，本皆以欧俄日本所制者为蓝本，自是而昆仑山脉之在后藏新疆，俨然成为定案矣。夫山脉之名，无非随人而定，设全国诸山果皆导源昆仑山脉，吾人亦何妨竟认昆仑为中国山祖。然今昆仑山脉实分自葱岭，葱岭高度又远过昆仑，吾人不祖葱岭而祖昆仑，果有何等理由乎？且根据地质学定理：山脉之成因有所谓“剧烈褶曲”者焉，有所谓“拗褶”者焉，有所谓“断层”者焉，有所谓“火山喷发”者焉，有所谓“侵蚀作用”者焉，而分水线则殊不关重要。山之质素与构成之年代相同者乃可为一脉，否则不能强一之也（以上皆引自《中国山脉考》，《科学》第九卷第九期）。中国山脉，究有几系，今日尚未完全考定，要之非皆导源昆仑，则可断言。且“山脉”（Orography）之语，今日地理学家已置诸不论之列，而中国言地理者，至今犹以“山脉”二字津津挂诸齿颊，且信全国诸山出于昆仑山脉之说，不太缺乏现代地质常

识欤？昆仑神话，今已无人肯信，而昆仑山脉之迷信又起而代之，诚不知昆仑之魔力何以竟如斯之巨也！余深愿我国地理学家，以后制图立论，于此谬说，必须力加纠正。而彼盈千累万之坊刊地图，各校采为教科书者，教部亦宜取缔。盖昆仑为中国山祖与黄河之发源昆仑，同为不合科学之事实，河源之迷信，今日已无人肯言矣，昆仑山脉之迷信，岂可独容其存在耶？

夫昆仑神话之发生，实不知其已有若干千年之历史，其传入中国，亦有二千余年。凡传说与信仰之久者，其支配人心之力必厚而且雄，所谓“民族心”者盖亦由此而成者也。昆仑之在彼西亚，在希腊，在印度，皆已成为神话宗教之渊源，文学艺术之宝库，其在我国亦颠倒鼓舞二千年之人心，化为民族性灵之一部分，今忽闻此可爱之大山乃非中国实际地理所有，于心又宁能恹然？我知吾说一出，攻余为立异骇俗，丧心病狂者必大有人在。或者则认为昆仑山存在，乃我地理之荣光，若去此山，则舆图或将减色，则当知昆仑“正身”固在西亚，希腊之奥林匹司，印度之阿耨达山，及中国西南所有纷纷藉藉之昆仑，皆昆仑之“影子”耳。瞻望西亚，彼久湮沙漠之尼尼微、巴比伦古城，固我文化之策源地也，而彼屹立阿美尼亚高原之阿拉拉特，固挪亚方舟之所搁，我先民周穆王骏足之所经（？）也！吾民族若果能奋发为雄，扩张我之国威及于全亚，则彼真正之昆仑何尝不可收入版图以内，区区一昆仑影子之有无，何关中国之荣辱哉！

自跋一

余去夏幸获休假，本批从事屈赋之探讨。乃忽撓胃病，更苦目昏，数月间，未览一书，未写一字。冬间倏氛紧急，人心惶惶，更无意于研究之事。及战局稍定，感于乱世生命之无保障，草木同腐之非素志，发愤取是题而写作之。武大图书馆书籍虽亦不少，然研究一专题，则参考材料必嫌不足，而外文方面缺乏尤甚焉。本文参考书之未举书名者为《法苑珠林》、《翻译名义集》，《佛教大小辞典》，丁福保《说文诂林》，北平研究院《中国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丁文江所制《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华分省本图》，童世亨所制《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及坊刊中国与世界全图数种。圣经地图数种。因所采之书不同，故文中地名新旧不能一律。此外则为中、英、法文新旧约各一部，次则为。The Universal Bible Dictionary, by the Rev. A. B. Buckland, M. A. and The Rev. A. Lukyn Williams, D. D.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Harper'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Antiquities, by Harry T. Norton Peck, M. A. F. H. D. (American Book Company, New York) 及伦敦 George G. Harrap and Company Ltd, 所出原版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度神话丛书各数本而已。自去冬十二月七日起草，历时一月而脱稿，缮写修饰者又半月。

而全文告成。嗟乎，古人著书，博览万卷，覃思十年，而余乃竟以月余之功，数十种之参考书籍，便思解决如此一大问题，唐突学术尊严，吾知罪矣！虽然，抗战以来，吾曹学人不啻陷身死海，求书既难若登天，问道又苦无其人，即再研求，所得亦不过如此。故惟有作为初稿，强颜付诸披露。若海内学者，不鄙其浅陋，进而教之，使昆仑之谜，终有豁然揭露之一朝，是则余区区发表此文之意也夫！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自跋于四川乐山寓庐

自跋二

昆仑四水问题，以《旧约·创世纪》伊甸四河，最难解决。学者虽知有二河，一曰替格里斯，一曰幼发拉底斯，其他二河，则聚讼纷纷，迄无定论。以替幼两河为据，古人已代我等觅出，其他二水果何在乎？余初以河水为替格里斯，弱水即青水，为幼发拉底斯，黑水则拘泥于《圣经》学者之研究，谓为阿拉斯河。不知阿河注里海，而黑水则必注黑海始可。又觅赤水不得，以《创世纪》有环绕古实之言。古实古时指非洲黑人之国，虽半岛境内亦有古实而必须西邻非洲或靠近红海。非洲及红海古称炎区，余以为赤水必在此等炎热之地。又以屈原《离骚》西行路线，系初济白水，至西极乃至流沙赤水，过此即可达于西海，乃以长仅二百哩流入死海即不再流之约但河当之。盖余彼时尚不知青赤白黑代表东南西北方向，竟以代表南方之赤水 OE 叫 氲褐钶 鰯 湮策矣。民国四十三年以昆谜稿视师范大学同仁程旨云先生，先生于约但河问题曾有疑问，谓两河流域境内自有大河何必求之红海之上，岂非舍近图远云云，余于该时，已获颜色与方向关系观念。又知《离骚》流沙赤水乃指红海，亟欲改正，而书已付梓，荏苒又廿年，不安日甚，今趁此书收入论丛之便，于伊甸四水一章大加修改，屏去约但，代以注入黑海之吉瑞尔河，自觉远胜于前。惟旨云先生已归道山，念及昔日切磋之乐，不可再得，至为凄怅！

昆仑之传入我国，未知何时，余以为必较西海仙洲为早。山东半岛之泰山在远古时即居昆仑地位，泰者大也，泰山者大山也，殆取西亚“世界大山”之义。又居大地脐上，天门在其顶，幽都处其下，与西亚世界大山条件无一不合。幼发拉底斯在西亚称为“大地之灵魂”(g o u l o f l a n d)谓天地间万物皆由其创造，尊称为R i v e r而不名。我国黄河亦称“河”而不名。幼河称为公平正直，审判人类善恶之水，故西亚每掷罪人河中以沉浮验有罪与否。我国亦有指河为誓之俗。则黄河与泰山神话殆同时传入者。余固主张域外文化曾两度入我中国，第一度尚在夏商前，此当属之第一度。彼时仅传白水，青赤黑诸水，恐尚未附会成功，以当时域外移民，脚迹未能出山东半岛，能在半岛境内置一世界大山并建立八神祭坛，其魄力已不小矣。惜此类高级文化之移民，日久势衰，竟为土著人民所消灭或被征服而同化。至战国中叶，域外文化又大量涌入，由《山海经》一类地理书，昆仑问题乃得复活，顾以新兴之西海仙洲魅力太大，中国人之注意力集中于仙洲，对昆

仑殊为冷淡。昆仑之成为热门问题者系在汉武之世，此事余已在本书中汉武帝钦定昆仑公案诸章，及封禅论中详言，此处可以不赘。

六十五年八月自跋于台湾古都春晖山馆选自《屈赋论丛》

